

美国研究

季刊

1990年第4期

AMERICAN STUDIES

第4卷

12月5日出版

不连续的挑战

李国友(4)

——美国和世界格局的演进

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张曙光(14)

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透视

黄椿、胡阳(28)

论九十年代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战略

肖炼(37)

论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王春法(45)

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

陶文钊(57)

——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

杨玉圣(67)

——回顾与思考

本期责任编辑：金灿荣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1.75 元

国际版 2.50 美元（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Winter 1990

Vol. 4, No. 4

CONTENT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AND WORLD PATTERNS

Li Guoyou (4)

The microcosmic development of quanta and genes led to tremendous changes vis-à-vis enterprises,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asic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has started to focus o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the suppression of the drug trade,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pollution and destruction.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 is being challenged. The rise or fall of a nation is decided by its ability to self-regenerate. In this new pattern Americ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nd leadership ability retain their advantages.

THE THEORY OF DETERRENCE

Zhang Shuguang (14)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the predominant power after World War II. She wa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her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technology advanced with tremendous strides. These factors became the domestic social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for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deterrence in America. In general the theory of deterrence is still "a young discipline".

PERSPECTIVES OF AMERICAN STRATEGY OF THE WEST PACIFIC REGION

Huang Chun & Hu Yang (28)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vis-à-vis the basic premises of America's strategy of the West Pacific region as the cold war comes to an end and the Soviet threat mitigates. The strategic interest shared by China and America has decreased in importance and the status of Japan in America's overall strategy of the West Pacific has become complex. The underlying objective of America's economic interest in this region; and maintain a balance of power and guard against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hegemonism.

THE NEW STRATEGY ADOPTED BY AMERICA IN IT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1990'S

Xiao Lian (37)

The contradiction, coordination, and operat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structure of three poles (America, Europe and Japan) with multiple 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world economic patterns will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ffect the trend of world economy, especially the American economy. America's absolute economic strength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nineties. With the rise of Japan and Europe, America's relative economic strength will somewhat decline. With the cold war at an end America will be able to devote increasingly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She will thus be abl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structure of three poles with multiple ties all over the glob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MERICA'S WEST

Wang Chunfa (45)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merica's West was that on the basis of massive population migration, fully makes use of the material means and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created by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to develop the economy of the West according to a pattern of regional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whole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was very successful.

AN EPISOD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Tao Wenzhao (57)

Towards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joined hands in imposing an unequal treaty on China seriously damaging the country's sovereignty.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ontinue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was the only way to safeguard the peace and security both of them required. This was the general background when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determined their respective China policies and when America decided upon the position she was to adopt towards Sino-Soviet negotiations. Pressured by both America and anti-communist considerations,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ccepted the Sino-Soviet Treaty which infringed upon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CHINA'S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EIGHTIES

Yang Yusheng (67)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in China during the eighti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associations nationwide; the training of young professions in this field; and the outpour of scholarly works. Ideological prejudices was on the decline and objective academic attitudes were being promoted. China's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years to come should tak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China and East. It should embody the careful and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when looking at America.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不连续的挑战

——美国和世界格局的演进

李国友

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急剧显示出两个时代交替中的不连续性。然而，旧格局的解体和新格局的孕育，均非始自今朝，并将延续演进。发现和掌握导致这类变化的因素和规律，趋利避害，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人类的命运。

本文试图通过对处于当代发展前沿的美国的某种‘立体’式研究，即不仅从美国本身，并且从美国对当代发展的作用，从美国和某些国家的关系和对比中，从中国和日本对美国的不同交往方式和效果，来探本求源。

微观对宏观的效应

体现在美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军拿、社会以及和全球的相互作用中，在理论基础，发展特征和方式上，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微观基础是建立在量子理论、基因理论揭示的物质深层结构上；和牛顿定律和化学元素不同，无法直接感受和观察到，并且其存在和变化往往是随机的、概率的。量子是不连续的，在能级间的转换是跃迁式的。基因是“跳动的”，会对不同因素作出灵活反应；当50年代麦克琳托克发现这一帆理时，被遗传学界认为是“疯了”。索洛打破了经济学传统增长理论的局限，在50年代就发现：1909至1949年美国私人非农部门每人小时GNP的增长中，87.5%来自技术进步，而其中头10年的增长中，1/3仍归于资本密度的提高[1]。实践的发展超过预期，索洛被授予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50年代的发达到80年代被世界高度评价，说明在新的微观和经济理论上，新的生产力硕果已经展现。当西方传统的经济发展在70年代陷入滞胀、石油危机和环境污染的困境中时，新的产业革命却从美国向亚太和西欧悄悄地飞速扩散、渗透[2]。当人们觉察的时候，学者们还在争论如何定义和命名的时候，它已经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对企业、地区、国家，顺者兴，逆者衰，势不可当。这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法的科学性，显示了发展的不连续性对传统意识和方式的冲击效应。

第二、技术向微观深入一个层次，会导致宏观某些方面成万倍的效应变化。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前沿，提供边际附加价值、边际效用、边际收益最主要的部分，已从基于牛顿定律和上次产业革命的规模经济，转向基于量子理论、基因和信息革命的微观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Microscale)。经济的发展从外延转向内涵，从依靠投入的有形生产要素劳力，自然资源，资本的增长，转向挖掘内在潜力，人的智力，机体的免疫力，自然资源的深层效能。从大规模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转向大规模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从满足共性转向个性。创新成为企业的生命线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源泉。整个过去的产业革命使生产率增加了约100倍，而微电子革命已经使基于信息的技术的生产率提高了100万倍，并且还远未到顶[3]。这种微观的，‘跃迁’所导致的对宏观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产业界的

代表性人物预计，今后到世纪末的12年的技术进步，将比过去已经使人眩目的12年，还要大10倍[4]。

第三、这种基于量子 and 基因的微观进展，导致了企业、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不仅超出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也超出了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家们的预料，使他们措手不及，陷入困境；使工场、市场、战场都出现了和预期不同、甚至相反的变化。增强国力的关键已转向智力开发，不论对发达国家保持领先地位，还是发展中国家缩小差距。稀缺自然资源的替代、选择余地上升，而需求的增长率或绝对量下降。对领土扩张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支持率下降。国家安全的重点在转移：从军事转向经济；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从弹头当量、数量，转向在目标、控制、选择、反应的自由度和实用效应。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地理位置，而是荧光屏上的信息。计算机的发展导致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中更大的集中和分散，但却是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层面。信息革命大大增强了政治和外交的透明度。

国际关系基础的位移

上述特点，导致国内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影响国家安全、国力、主权的因素和作用的程度发生位移，导致国家争夺和控制的重点、层次和方式发生偏转。

1. 国家安全的基点

美国感受的威慑的主要方面在转移：从大规模毁灭的核威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全面战争，局部常规战争，转移到恐怖主义活动，贩毒集团，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小虽然核威胁、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但是比重在下降。

一方面，大规模毁灭的核威慑，由于只有失（军事、政治、经济、环境），没有得，失去了实用的价值。另一方面，核武器的精度、小型化提供了有限核战争的可能；进一步又提供了防御有限战略核进攻的可能，这就是美国星球大战（SDI）的目标。对重点目标的核袭击比大规模核袭击的可能性大得多，提供保护是可能的，代价小得多（提供最后1%的保护比前99%的代价大得多）。但是，这种大国间的有限核战争的代价和利益相比仍然大得难以接受。

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威胁大于战争的威胁。日本对美国的威胁不再是“珍珠港式”的军事袭击，而是谁也不曾料到的经济的，特别是制造业的效率。

恐怖袭击和毒品对美国的安全显示出更大的威胁。先进器材的小型化和扩散使恐怖行为具有更大的潜在威慑力量。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可能从核武器转向生物武器，后者更有效，成本更低，对财产的破坏几乎不存在，监控更加困难。美国联邦调查局近几年介入80年代以前几乎从未涉足的反毒品行动；美国以诺列加贩毒为借口对巴拿马进行军事干涉，得到国内的支持，都表明基点的转移。

技术进步的不同方面对国际事件影响的最终结果，往往出乎预料。越南战争是突出的例子。从军事技术看，战争不会那么快结束。灵巧炸弹使得破坏交通线的代价大幅下降，成效大幅提高。新的传感器和发送装置使得“胡志明小道”的隐蔽性降低，轰炸的针对性提高。武装直升机提高了在丛林战中的机动性。但是这一切都远远抵不上现场采访通过电视所起的结束战争的作用：一tkrt 外干涉战争的血腥面目，活生生地展现并进入每个美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和通过广播和报纸的效果大不一样，其震撼作用有如雪崩。因此，从美国内部来看可以说，电视和现代传播技术结束越南战争的作用压倒了把战争打下去的现代高超的军事技术；是软技术唤起的人的觉醒，压倒了硬技术的军事机器；导致了历史上罕见的结局：一个处于稳定时期的强国的人民成功地结束了本国政府的对外干涉战争。

这显示了什么？

2. 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信息向广大人民的扩散和传播正导致国家、企业甚至家庭的权力结构的变革。对国家主权的性质和定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有如为早期工业革命开道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把拥有圣经和对圣经的解释权从主教手里转到教民手里所引起的巨大变化。

信息革命迅速增大了透明度，美国政府进行战争的权力、进行秘密外交和秘密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战争的权力，都受到制约。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质量、数量、速度、途径也在改变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美国的代议式政府在变化。政治家往往绕过传统的政治结构，面向公众。精心筹划的长期战略计划往往会被打断，政府往往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应付引起公众注意的突发事件。

政治家的隐私和个人品德更易曝光，引起政局的动荡和力量的重组。党派的纪律和界线趋向模糊，信息的高度扩散促成了多种层面的价值判断和错综的组合。

在相当程度，政府和公众在信息共享上更趋于平等。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和不少国家的政府首脑、政治家，都大量通过民办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CNN）的广播网来获取世界大事的最新消息。这也使政府应付公众的超前准备期缩短，政府领导优势的下降。政府实施上权的方式在趋向更多的协商，反应及时和恰当。几年前还属于少数国家和政府独占的卫星情报，现在已经在商业市场公开出售。原来属于国家机密和主权的信息正在被国内外公众分享。现在已经具备的技术基础，即将使卫星直播图像大量进入千家万户，内政和外交交错的部分将更多。某些内政会在国内外同时引起反响，特别是在生态保护和污染方面，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到巴西雨林中的开发项目，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到中东的人质，都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政府的国内政策往往在几小时之内就被转换成国际间新的市值，新的股票指数，新的投资流向。世界市场已成为经济上的“世界警察”，对政府政策严加约束，对行为优劣予以奖惩。即使美国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也效力大减，不能越轨。其实，国际化、信息化越高的国家，传统主权受到的侵蚀越大。但同时，又要求对世界事务更多的参与、协调及合作，以趋利避害。

这一挑战不仅对国家的上权，并且对美国人视为神圣的隐私权。个人的特征、行为、财产和活动被置于政府、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专业服务机构以成百万就业人员和超级计算机、传感器等高新技术组成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天罗地网”之中，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

实际上，国家、企业、个人的透明度都在提高，原有的“上权”都在受到制约，但同时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手段，扩大了自己的“主权”。和20年前设想的相反，计算机和数据网络的迅速扩大，并不是有利于国家包罗万象的统一计划和控制，而是促进了各界创新人士的活力，不仅对政府，并且对传统的行业、企业、工会以至学术界的权力和权威都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对个人传统的习惯和“自由”，也提出了挑战。同时，又赋予了各方以新的手段和新的自由度。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恢复正在削弱和失去的老的上权和权力结构，而在于适应当代技术进步去建立并扩展新的主权和权力结构，才能获得新的主动。

3. 国内基础在转移

当代技术进步导致国家发展、发达所依托的关键要素在变化，特别是变化的速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无与伦比。因此，国家的兴衰，特别是发达程度的提高，首先取决于内部的更新能力，与适应当代技术进步的新陈代谢能力。这也决定了美国是否会步大英帝国衰落的后尘。

发达的定义，按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的说法，是“更成功地开发和挖掘了增长潜力”，“在区分发达与不发达社会时，将它们解释成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创造力不同，而非人力不能控制的自然条件差别所造成的经济成就的差异，是十分重要

的。”[5]因此，第一，这里尽量排除了自然界赋予的突出的损益因素，更能反应基于技术进步的发展。所以，因石油致富的中东国家，虽然人均国民产值很高，但发达程度并不高。第二，如果发展仅依靠资源、资金、劳力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发达程度提高缓慢。第三，如果发展仅靠类似产品量的增长，生活质量的提高必受到严重局限。按照斯但福大学技术—经济教授罗森伯格的定义，财富是选择的幅度，财富的增长就是扩大选择的幅度[6]。可见，在人均产值相近的国家，生活质量，发达程度却可能有相当差距。技术进步使增长的潜力和选择的幅度，迅速扩大，已难以用传统的指标加以反映。信息革命就突出显示出这类基础的转移。

当代技术进步提出的挑战首先是对人，对各阶层的人。即使在传统产业中留下来的职工中，技术、职能、工作方式也往往“面目全非”。只有依托各阶层中的创新力量，才能提高国家的更新能力。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有代表性，即说明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国家的更新可比。该公司1988年销售额596亿美元（相当中国同年财政总收入551亿美元，或京、沪、粤工业产值之和675亿美元，均按美元比5.5元人民币换算，下同），资产730亿美元（相当中国全民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50%或运输邮电的2倍），利润58亿美元（相当中国国营企业所得税的50%），80年代以来投入建设新工厂的资金达165亿美元（相当中国同期运输邮电基建投资额的75%，或1988年工业基建投资额的150%）。

该公司在80年代中期以前，管理体制高度集中，总部决定一切：从广告到研究发展经费的分配；重点在提高生产率和质量，对付日本制造能力的威胁；拳头产品是计算机主机；自成系统，是该行业的世界主干。但是却没有抓住技术进步的新势头，发展大幅度减速。近三年实现了企业史中仅见的高速全面更新：权力下放到自治单位的总经理，但他们经常互相磋商；适应计算机和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加强微机、工作站、服务和维修；实行“开放体制”，在设计和推出的阶段就吸收用户和多家软件公司参加，一改过去对新产品的保密惯例。总裁埃克斯（John Akers）把这一更新概括为，解决“忽视了人”的问题：首先就是把使客户满意，放在最优先位置，甚至可以用别的产品配套，维修其他牌号的计算机；同时，使本公司的2万多名职工从技术和行政岗位转移到推销和程序编制；扭转了他们的态度，从习惯于告诉客户什么最合适，转为“提供一切帮助”；还改变了奖励的办法。该公司的科技力量很强，但前些年推出的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差，因为着眼于解决公司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客户方面的问题。在把这些优先顺序颠倒过来后，该公司扭转了局面。在不到10年的时间，经历了从兴到衰到兴的过程，说明了当代技术进步对企业和国家的更新能力，要求多么严峻。

世界格局变化的动力学

正是当代技术进步促成了世界新格局。日本和东亚的崛起，突出地显示出，人口密，人均自然资源贫乏的东方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以提高发达程度，并且可以把富裕水平提高到一度认为达不到的西方标准。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权威美国的库兹涅茨在60年代中期都不曾料到的：“这些国家尽管对其增长潜力的利用率高于其他国家，但它们的人均产值水平仍然比其他国家低很多，日本也许就属于这一类。”[7]那么为什么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差距扩大了？

这可以归结到当代世界发展的动力学：发展的不连续性，世界市场的加速度，有效竞争。

“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存量所提供的增长潜能，在不同的国家有相当的差异。”[8]这是现实，但是为什么？原因很多；至少有以下因素。

科学发现的扩散没有国界，技术开发却出现在适宜的“创新小天地”中；技术的商业化是全球性的，市场的渗透超越国界，但是，技术进步的增值和效益梯度，却是国界分明的。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转让只是一个起点，要取得对经济；社会的相应推动，才称得上技术进步，即技术导致的国家发达程度的提高。

不连续的连接

发展往往通过不连续的层次实现。得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所在的企业和国家不一定能获得由此而引起的附加价值，这要取决于技术开发的环境是否适宜；继之，创造出一种新产品，并不能保证取得足够的收益，这又取决于商业化链条、或价值链条的各环节，是否得以连接和转动[9]；加之，要获得新技术导致的社会进步，要靠不同领域创新的合成效应。而这不同环节的“创新小天地”，在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都可能相差悬殊，往往只得跨越国界相连。

不连续的不同层面如何跃迁推进，美国的硅谷是一个典型。因发明晶体管于1956年获诺贝尔奖的肖克利，到硅谷办公司并不成功，但是他聚集的8名“叛逆”分裂出去，成为硅谷半导体的“无勋”。1955年制造晶体管的魁首休士公司(Hughes)到1965年在半导体领域中消失，而领先者之一是费尔柴德公司(Fairchild)。但是到1982年，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该公司已退居第10位，而1965年还不见经传的5家日本公司已跻身于前10名。到1985年该公司几乎被日本公司兼并，硅谷衰落之说盛行，直达北京。可是，硅谷正转向信息产业的又一个前沿。到1988年已显示出，这一前沿正导致“主剧”的开场，而半导体集成度的提高和大量生产只不过是一个序幕，有如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表达和积累在上面的知识和传播，具有大得多的价值和效益。美国首富和前10名巨富中有7名均出自新闻业，而80年代新起的最著名巨富却是搞计算机软件的30出头的年轻人威廉·盖茨，集中体现了价值转移的层次、速度和规模。现在，日本还得到硅谷去抓住发展的前沿。美国国内发展也不平衡，曾和硅谷齐名的128号公路，已呈转轨乏力的征候。况且，在上述硅谷开创的序幕中（是使前一场主剧黯然失色的序幕），得到价值链条中更大份额的是日本，而在美国的连续，往往中断。这又涉及美国中等和工程教育的缺陷，导致新一代制造业人力资源的不足。日本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并不能保证进一步发展的连续性，那要靠培育首创精神的机制，而这又是美国60年代大学教育改革和高度机动的多元化体制所导致的优势。

不连续得以跨国连续，是由于技术、经济、观念迅速进化和扩散，导致共同基础加强，障碍削弱，并通过冲突和协调，得以实现。连续取决于两个关键：一是善于在停滞和断裂间找到平衡点；一是相应国家内部的更新超过相互间原有矛盾的积累。既非敌对（热战和冷战），也非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碰撞、谋合、交织，促进不连续的连续。

透过美、日间一系列的摩擦和贸易战，可以发现某种相反相成的效果。美国对日本的制裁和干预，从针对日本向美国的出口，转到敦促日本国内进一步自由化，甚至涉及公共设施投资不足，影响国民生活质量之类的问题。而日本也对美国的内政，提出种种要求，从政府宏观决策，如缩小财政赤字，到提高国民储蓄率，到克服企业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美、日双方也都进行自我调整，采取多种方式以缓和、避开或超越突出的矛盾，核心是提高发达程度，向更高层次转移。这体现在双方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高智力含量，高增长潜力的领域转移，体现在双方对流和交织的层次在扩大和提高。可见，美国对日本的制裁产生的效应是日本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对美国的追逼，促使美国加速更新。可以设想，任何一方停滞，冲突就会加剧，导致超越国界发展的连续中断。

有趣的是美、日政府的相互干预并不导致国家权力对国内控制的加强，反倒是削弱。80年代以来，日本通产省干预的范围和强度大幅下降，美国的放松规制(deregulation)解除了大量政府约束，并且都是双方政府首脑的主动决策。政府善于缩小自己的行政权力或转移自己的职能，促进国民的创新活力，无疑是解决发展连续性的重要一环。这一传统，在美国

可追溯到乔治·华盛顿在具有绝对军事统帅权威时坚决拒绝手下将领要求建立军政府的强烈要求（国会曾对华盛顿有过不利牵制），以及在获得压倒多数支持下，拒绝连任总统。在日本则是战败后的彻底反省，通过美国占领下的强制改革，转到了多元化体制。这缓解了日本的政权危机，使腐败的政界和高素质、高效率的文官并存。

这种多元结构也有利于防止巨大发展中的盲目膨胀和逆转。日本经济实力的加强并没有导致国内外担心的军备扩张和军国主义。即使自民党中这种倾向较浓的中曾根当政期，在这方面也并无多大作为。虽然美国促使日本增加军事承担，但日本受到三种牵制：国内民众不支持，邻国反对，政府权力相对削弱，从而在可见的未来，日本难以成为军事大国。这使得根据半个世纪以前的概念，对日本威胁方向的判断，一再失误，显出浓厚的感情色彩。

要保持冲突中的连续性，政府用理性平衡公众的感情冲动，具有重要作用。1989年三菱物产用8（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控股权和索尼公司用56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制片公司和录音公司，为“日本占领美国论”火上浇油。一项民意测验表明，4/5的美国人赞同加强控制。国会通过的1988年贸易法案已授权总统制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收购。据此，总统可以阻止许多交易，但却并没有去做。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最新报告表明：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比英国少一半；外国在美国的公司，不论在增值水平还是研究与发展（R&D）的投入率上，比美国公司还高，并不是把美国的技术挖走，留下成品装配的空壳。结论是一切正常，政府可以无为而治。其实，这是又一轮不连续的连续。美国的投资环境和潜力仍然最优，不仅在开放程度，透明度，在不动产，并且在当代发展的前沿，包括信息产业，投资业，文化、教育产业。美国自身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开发能力，外国，特别是后起的日本才乘，‘虚’而入。这导致索尼硬件，哥伦比亚软件的战略结合（56亿美元相当中国1988年工业基建投资的50%），是日本“占领美国”和买美国“文化入侵”的结合。不仅如此，日本已经吸引了美国10个大学在日本办分校，还有10个继之。这既是美国大学过剩的输出，又是日本发展转轨的需要。

正是这类微观和宏观的不连续性，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导致了各国利益的结合和冲突及其层面的转移，导致了世界市场对各国发展的加速作用和世界的新格局。善于从外部抓住延续内部不连续部分的要素，并更新内部基础，从而能接住技术进步下一轮接力棒的国家，可以取得比从内部按部就班、自成系统、近亲繁殖、进化的方式，快得多的发展速度。当然，如果内部断层的跨度太大，缺损的环节太多，补偿和改善的速度太慢，不能积累临界能量和建立适宜的跳板，就难以在当代错综的不连续轨道上跃迁、转换。

加速度的差异

不同的国际化模式受到的加速作用可能悬殊。有三种方式可以比较。

苏联和东欧计划调节的封闭国家集团（经互会）；正在转型，增强和世界市场交织和参与的程度。

西欧市场调节的开放的松散国家集团（欧共体）；正转向1放的紧密型国家集团，以超级统一市场为后盾，增强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太平洋环域互补性强的、高效竞争的国际市场，正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向多极化。

二种模式都在变化，不同的是，第一种现在才开始；第二种变化缓慢，现在才加快；第三种早已在当代技术进步的浪头上翻滚。人个洋模式不是人们预先设计的固定结构，然而相互吸收、渗透、转换的效率最高，促进区域新陈代谢的能力强，以无形的机制取胜，随技术进步的性质，按各国和地区相对竞争优势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各国间倾斜的方向和对流的层次。由于随动性好，阻滞部分易于代换或绕过，因此，增值水平的提高和发展链条的转动，可以跨越太平洋，在不连续的轨道上跳跃前进。

处于太平洋环域的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发展差距迅速缩小，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借助于这一适应当代技术进步特性的太平洋模式的加速度。这一发达之路，不仅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和二次大战前的特点不同，和苏联、东欧在战后的相似阶段也不同，虽然在50到60年代，苏联、东欧比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水平还高。

苏联、东欧的差距在于，一方面，没有及时从世纪初的工业化模式转入内涵增长轨道，因此，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极低，基建膨胀，短缺加剧，生产的有限增长被中间环节无数的损耗所吞没，品种的贫乏使得“选择的幅度”狭小，以致按消费品的水平，低于中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有形的封闭国际化组织，只适于稳定的产业分工和有形资源的调配，缺乏当代技术进步的不连续性所要求的、在宏观和微观上多层面的转轨和更新机制。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进入80年代，连传统意义上的发展，都陷于停顿。

苏联、东欧过渡过程的长短和起伏固难预料，但趋势已明，对世界经济加速作用的方向和大小会起重大影响。企业界是风向标。美国海外投资1989年比1988年增长20%，其中53%投在西欧：一是为参与统一欧洲市场打基础，二是向东欧进军作准备。通用电器公司在匈牙利投入1.5亿美元收购一灯泡厂的50%股权，是战后西方在匈的最大投资，以扭转和西欧竞争的劣势，西欧1988年向东欧和苏联430亿美元的出口比美国和日本大10倍。虽然目前苏联、东欧投资环境仍欠佳，但至少有三点含义：一是苏联、东欧不再是一个统一体，相互间差距将拉大，和世界经济的结合将交错、加深；二是政治、军事、经济上与之交往的方式必须作出重大调整；三是西方包括“四小龙”向苏联、东欧的进军已开始，目标是争夺下一轮，90年代中期的竞争优势。

有效竞争的层次

当然经互会模式有利于军事联盟和军事及空间技术的发展。不过苏联这方面的成就首先得归功于美苏争霸的高强度竞争。由此可见，有效竞争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苏联其他方面没有开展竞争，技术进步甚微。在哪个层面竞争更有效，哪个层面的进步就更显著。日本着重在公司之间，在制造水平，在经济上；美国侧重在个人间，在首创，在知识产权，在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优势；日、美的发展特点和得失都有所不同。不过，各个层面对国家发展的长期总体效益，作用的程度并不等同。美苏在军事上的竞争，把大量资源投入到效益递减的领域，反而降低了双方在世界的相对优势。这种递减表现在三方面：（1）过剩的核武库，对外干涉、扩张以及军事因素对国家安全的边际效用下降；（2）当代技术进步使发展有充分的余地，对军备刺激的需求减低；（3）军备的研究和发展的投入，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正效应在递减，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就是一例。美国防部SDI局局长技术顾问，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沃尔登（Simon P. Worden）1987年在我美国研究所作报告中就明确答复作者，现在对SDI投入所产生的对高技术产业和国民经济的连带效益，比过去的要少，比直接投入民用的研究和发展更少，或者说机会成本在上升。[10]不过，在另一个层面，SDI是更有效的竞争。针对上述第一方面的递减效应，转向战略防御可能提供更高的国家安全。迫使苏联的战略从进攻转向防御，有一石三鸟之功：（1）减少战略进攻手段的投入；（2）进攻成惧的下降导致防御投入的下降，SDI的部署规模可以大为缩小；（3）使竞争转向对美国更有利的层面，增强相对优势下降的领域。

通过交叉验证从不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发展模式、自然资源占有状况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有效竞争是导致国家相对优势变化的贯穿因素。

美国和菲律宾及某些拉美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相似，但有效竞争水平悬殊，导致发达和不发达之差异。“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表明对违犯竞争规则和滥用权力的有效约

束。美国政府近几年对公司兼并和证券市场“内线交易”的揭露和判决，建立和实施对中介人物关系网证券交易活动的计算机跟踪核查，维护了竞争的公平和效率。

实践表明，投资效率不取决于中国的热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而在于多样化资金管理方式的竞争和促进。美国和英、法、日、西德没有一国政府拥有一个简单和明确的控制系统，都得通过中介进行投资。美国仅金融性中介机构就有2.5万家，还有1.4万家商业银行。美国2万亿美元的退休福利资产中，1/3由独立资金管理公司管理，其余38%由银行、27%由保险公司管理，三者在华尔街股票市场经手80%的交易量，而30年前只占20%，那时80%的交易是通过个人进行的。独立资金管理公司在60年代初才出现，但是发展迅速，以其灵活和独到之处弥补了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之不足。但是大银行、如威尔士法哥银行（Wells Fargo Bank）的投资管理部（管理资金690亿美元），首创指数式管理，减少了股票交易的频率（退休基金持有的股票每年平均交易的比例高达70%），比独立公司管理费低达20倍，仅为所管理资产的0.02%。因此，1981年以来，指数式管理的资产增长了14倍，达2000亿美元。但是，据估计，如股票的60—70%都按指数式管理，市场就不再有效率，1987年股票市场暴跌的原因之一，就是计算机指数式管理的连锁反应。就是说，“主动型”的独立投资管理机构的存 在，是这种“被动型”管理有效的前提。与此类似，国营和民营各类成份在不同层面的比例构成，对有效竞争也具有重大影响。

当代反垄断从广义上可以有三个准则：一是限定政治、经济、学术等不同领域的边界，留有不同步和不连续发展的余地；二是不损害规模经济的形成；三是有利于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南朝鲜和台湾政治上的独裁并不干预经济，使得后者的竞争效率得以大幅提高。而政治上的垄断导致政治效能降低，形成近年的危机，这时取决于转轨的能力。如果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缺乏这种能力，就会陷于混乱。日、韩均着重在全球竞争中的长期效应，抓住了赶超的关键。美国从80年代中期才从世界的角度处理反垄断，延误了竞争效率的改善。日本大公司的“铁饭碗”，终身雇佣制，和公司间争夺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共同促进了企业行为的长期效应和有效竞争的水平。而在60年代甚至70年代美国人还难以相信这种方式可以使日本的竞争力直逼美国。

南朝鲜和南斯拉夫，东亚和拉丁美洲相比，鲜明地显示出，在相似的对美关系、相似的开放程度（都吸引大量外资、技术、借大量外债）和相似的低度民主政治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悬殊。南斯拉夫国内生产总值1960年是南朝鲜的2.5倍，1985年只有南朝鲜的一半，并且陷入外债危机。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在70年代相似，前者为8.1%，后者为8.1%，但1980—1988年，前者为6.1%，后者为1.3%；前者国际收支盈余为“患”，后者债务如山。主要原因就目标和竞争机制大相迥异，以致国内外资源的利用水平，结合优化程度和后劲差距甚远。中国近年的滑坡和正在逼近的滞胀，成因雷同，就不足为奇了。可见，抽掉有效竞争这一核心，不论企业自主，地方自治，吸收外资，还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对改善国家相对优势，都作用甚微。

可见，有效竞争的展开和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经济上，并且在军事、政治上，不仅在单个层面，并且在不同层面的连接上，不仅在执行中，并且在战略的制定和领导能力上。

新格局中的美国

世界格局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各国、各地区对当代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度不同所导致的结果。按本文前面所分析的要素，可以得出以下比较。

发展动力学适应度的要素比较

要素		更新能力 转轨能力	竞争效率	利用世界市场的 加速度
高	+ -	美 日	日、美 四小龙	日 西德、四小龙
中	+ -	四小龙 西欧	西欧、苏 (军工、航天)	美、西欧 苏(军工)
低		苏	苏(经济)	苏(经济)
要素		经济对军事 的优先度	前沿创新机制	跟进效应*
高	+ -	日、港 西德、新加坡	美	日 四小龙
中	+ -	西欧、台、韩 美	日、西欧 四小龙、苏(科学)	西欧
低		苏	苏	苏

*仅对后进国家，故不包括美国。+、-表示同一级中的程度高低。

这样就导致了美国仍然领先，日本后来居。上超过西欧，形成美日主导，西欧奋力赶上，新兴工业化国家环绕跟进，苏联东欧滞后、正进入重大改革，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局面。为了调整适应度，国家和国家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先顺序也正发生重大变化，其幅度和速度都是十年前、甚至二年前所不可思议的，例如华约和北约军事淡化甚至名存实亡的现实前景。欧洲统一市场对美、日、以至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影响有限，因为他们已是“世界公民”；相反，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由于苏联和东欧的参与，这种一体化会更具有全球的色调。

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一旦被人们发掘出来，就不是仅仅被利用，而是要求人们适应它的，也是新的生产力的要求。但是，主观认识落后于这种要求，是常有的事。苏联和东欧的落后和集团的崩溃，正是60年代以来，长期不能按照世界发展的动力学，去调整内部（国内及集团内）和外部关系，从而形成致命后果：停滞导致矛盾激化，稳定旧框架的压制加深了危机，动摇了基础国际竞争能力的丧失，从道义上、政治上，到经济和内政，只剩下军事能力，却难以起作用。由于缺乏渐变酝酿和准备，造成更新换代力量的真空，拖长了过渡过程，加重了混乱，导致了衰落。

然而，苏联、东欧的急剧变化，美国朝野并未料到，而是苏联政策的结果。苏联的军事虽然仍然强大（一定程度上倒是美国政策所导致），但是，美国基于冷战和东西方集团对抗的军事力量的作用反而急剧下降，规模的削减不可避免。但是，为维护新秩序，作为世界军事警察的快速反应部队，会继续增强。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事件不会改变、而只会加速这一进程。但是，美国的警察作用只能在协调和多边的安排下协同进行。这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舆论（美国国内、安理会、OECD及阿拉伯世界）以及财力的制约，而不是军事能力的不足。可见，各方都不能偏离新格局的要求太远：任何试图重现地区或世界军事霸权的行为都会遭到比十年前越侵柬和苏侵阿更强烈、更普遍的抵制，失败得会更快；任何试图推行地区或资源垄断，取代国际经济竞争的政策和战略，都会更快地自食恶果。

在新格局中，美国的政经体制和领导能力仍具有优势。在当令民族矛盾纷起的世界中，美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内聚力却在增强；歧视减少的幅度，不论和美国过去还是和其他国家相比，都属最显著之列。虽然美苏双方政府政策的失误均颇多，可是双方兴衰变化大相迥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领导能力的交流和互补性突出。50、60年代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开仓（的硅谷高技术生产方式，克尔教授（Clark Kerr）主导的美国大学教育改革，都为当今世界新格局奠定了基础，其领导作用

超过同代政府领导人。从政府能力看，与日本相比，美国对外事务比日本强；日本企业界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比政府强，而日本政府中以通产省为代表的协调总体经济战略的能力，又胜过美国政府，包括正在进行中的协调亚洲工业发展的策划。美国的弱点和能力的不足，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更多地体现在对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上。看来，这是对美国在冷战后时代的重大挑战。

启 示

对比中国和日本处理对美关系的方式，可以发现导致不同效果的某些症结。上个世纪，中、日都遭到包括美国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忽而抵抗，忽而割地赔款，虽然也派人去留洋学技术，却抓不住技术进步的根本。日本发现不能硬拼（也是靠了中国付出的代价），作了小的让步，争取到时间，抓住体制改革，从根本着手，缩小了发展差距。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又是大跃进，又搞世界革命，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在战败的废墟和冷战气氛中，制定了从世界经济总体着眼，使日本摆脱“亚洲落后形态”的发展战略，当时曾被美国的某些权威人士认为，既违背经济理论，又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其实，正是日本清醒地抓住了当代发展的关键，各要素的优先顺序，从政治和军事的劣势转向经济的优势；姿态低，战略高，外柔内刚；对内、对外配合紧密，开放有度、有节，伴随不同发展阶段和相应国家的关系，进行调整：往往以小的妥协和让步，借用外国的压力，促进本国的竞争能力和技术进步，攀登上新的台阶，从而在世界舞台上退出旧的角色，摆脱老的矛盾，进入更高的层次，夺取新的优势。这对中国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抓住内外关系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趋势和环节。在对立性上升，外交上争吵不休，指责对方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善内部的机能才是最急需的。中国有过成功的经验，当时和苏联决裂的则·候，把两弹和石油搞上去了，把外部的压力转换成为内部动力。但是由于这一·转换局限在军事战略和重要自然资源的范围，并且是在封闭的圈子中，难以汇入当代技术进步的世界性潮流。看来，进入世界开放的体系，特别是对西方的开放，是一个基本条件。因为在现阶段，那里是技术进步的中心和上流，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美国和日本自己，脱离这一体系都必然落后。美国自己已经在检讨缺乏从世界总体出发的经济观念和政策给美国带来的损害。在当令技术进步一日千里的形势中，落后将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是最大的代价。因此中国必须排除国内外偏见和无知的压力，坚韧不拔，保持和美国的正常关系，这符合中国的总体战略利益，而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得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美、日、西欧已成为经济上不可分的有机体，和任何一方联系的削弱都有损自身的竞争优势；而由于美、日众所周知的不同特点，日本不可能取代美国对中国发展所起的长期效应。中国只有致力于开放中的奋发图强，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才能加重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份量和稳定度，才能摆脱在两个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和半殖民地方式中振荡的陷阱。

第二，提高学习效能，改善经验曲线，使主观更快适应世界发展现律的要求。中国80年代在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可观，中美交流也颇频繁，但和日本60年代相比，在目标的明确，收效积累和扩散作用上，相差悬殊。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开放中见钱，见物，不见人，导致智力资源不足和过剩并存，对智力需求水平低，更新、提高的压力小，适宜的人才难以在提高中国改革、开放水平上发挥作用。

1900年前后到美国考察的一位日本官员说：“是什么使美国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我们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专利制度，因此我们也将建立专利制度。”到1985年，获得美国专利权的外国人中，日本居首位，超过居第二位的西德近一倍[11]。这体现了在学习中抓住根本，从制度和环境的建立和形成，从发挥智力的作用，不仅从国内，并且从世界的全局着

眼、落脚。学习效能对从不发达。“跃迁”到发达，起着举足轻重的跳板作用，已成为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研究的最新课题之一[12]。

当前历史性变化的急剧和幅度，使国际社会各方都措手不及。在此转折关头，按照技术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实际趋势，修正老的生产方式和冷战时期及两次世界大战的观念上留厂的烙印所引起的偏差，对实现各方明智的妥协、建设性合作，十分必要，可以减少向新格局过渡中的障碍和弯路。

注释：

- (1) R. M. 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平新乔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北京。
- (2) 参见李国友：“美国新的产业革命”，《世界经济》，1984年12月。
- (3) 参见Walter B. Wriston，“Technology and Sovereignty”，*Foreign Affairs*，1988/89。
- (4) 参见：Gene Bylinsky，Technology in the Year 2000，*Fortune*，1988/7/18。
- (5)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北京。
- (6) 参见Nathan Rosenberg，*How the West Grew Rich*，Basic Books Inc.，Publishers. New York，1986。
- (7) 同[51]
- (8) 同[5]。
- (9) 参见李国友：“攀登竞争和增值的阶梯”，《科学学研究》，1990年2月。
- (10) 沃尔登的报告刊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7/7。
- (11) 参见吉姆·默克尔：“专利制度与经济繁荣”，《交流》季刊，1989/2。
- (12) 参见Joseph E. Stiglitz，“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5。

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 的一个重要领域

张曙光

一、绪论

兴于二战后期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或称军事战略学，发展至今，已成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然而不久前美国“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召开的专门探讨这一学科发展的讨论会，却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这一学科的研究仍处于“年轻学科”阶段。其根据有二：第一，近40年的发展仍没有使学者们对这一学科的定义，涵盖取得一致的认识。主要分歧仍存在于“冲突、危机、战争渊源”论者与“军事战略决策”论者之间；第二，就

研究方法而言,这一学科对相邻相近的其他学科(诸如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外交史学、军事科学、经济发展学等)的兼容量到底有多大或应该有多大,也未成定论。尽管如此,对“威慑理论”(theory of deterrence)在战略问题研究发展中的显赫地位,争议是不多的。(1)

“威慑”对美国乃至西方的战后战略问题的影响,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作为国际战略实施的战略考虑中心,二是作为国际战略学研究的理论核心。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然而,对后者作深入、展开的探讨,将对更全面地了解前者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威慑理论的最基本点,是所谓“威慑观”或“威慑逻辑”。其一般意义的定义是:威慑的成立,是处于对抗状态中的两方,一方以其实力(capability)及决心(resolve)说服另一方放弃攻击意图的过程与结果。换言之,只有当处于挑战地位一方慑于对方的实力及实施这一实力的决心,认识到“如果其实施攻击,对方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将大于其攻击所期待的政治所得”,因而决定不再或放弃其攻击计划而安于现状时,威慑得以成立。因此,对于面临挑战的一方之战略目标,旨在使对方相信: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大于对方进攻所期待的得益;也就是使对方产生这样一个心理效应: $L(损失) - G(得益) > 0$ 。传统的威慑观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的,不只是近、现代国际关系演变的产物。不难看出,其逻辑意义与国家法律的作用近乎一致。然而,其本身的内涵常常不是被国际关系学者所误解,就是被战略决策者所滥用。一个最易混淆的观念就是“胁迫”观(concept of compellence)。实际上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威慑是迫使对方放弃或不做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而胁迫则是迫使对方停止做或不得不按他人意图去做的过程。如果把国家的严惩犯罪的方法喻为威慑而监禁、改造罪犯则是胁迫。很明显,尽管两者均以“强权”、“实力”为手段,威慑的目标是维持现状,消除对现状挑战的潜在威胁,而胁迫旨在改变现状,以取得新的平衡。本来,任何国家或集团的战略设想常常都包含着威慑与胁迫两方面:当安于现状时,威慑被用来防卫阻止敌对者对现状的挑战与改变;而一旦为了本身的利益而需要改变现状时,胁迫便会被认为是最好的——尽管不是唯一的——选择。

广义上的威慑观通常包含二个要素。第一,军事实力。主要指处于接受挑战一方相对于挑战一方的军事反击实力(counter attack capability),或第二次打击力量(second strike capability)。即指能够承受挑战一方攻击或第一次打击后,再予以有效反击的军事实力。与威慑直接联系的反击实力有两种,一为战略报复(punishment)能力,即能够造成大规模、深程度破坏挑战一方的战略要害乃致于杀伤其非战斗员的军事能力;另指军事否决(denial)实力,即能在军事战场上有效、成功遏制进攻一方以达到其军事行动目的的战斗能力(fighting capability)。第二,政治决心。为了威慑,具备反击实力只是使双方相信你“有能力”反击,而使对方也明确你“一定会”反击的关键是要具备决策的决心及其这一决心的源泉——国内政治力量——的支持。军事行动服务于政治目的,也受制于政治因素,这对于对抗的双方是普遍适用的。构成“政治决心”的因素很多,通常受到考察的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公众舆论影响力、民族对战争的承受力、决策机构的运作效率、过去应付对抗局势的策略等。

上述这些威慑观的基本点显然并不复杂,其意义几乎只需运用常识便可理解。但是,在当代美国战略问题研究中,众多的学者大约用了40年才把这一简单的威慑观不断地发展成一比较完整的威慑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理论系统,它包含三个主要分系统:(1)核威慑或战略威慑(nuclear or strategic deterrence);(2)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及(3)常规威慑(conventional deterrence)。而这一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围绕着传统威慑观的基本点进行的。其形成与发展是在什么样的国际社会环境里进行的?其体系的基本结构与不同层次的观点是怎样形成与展开的?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

二、威慑理论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几乎和当代美国战略研究的其他理论一样,威慑作为战略选择及理论研究,都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即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利益圈已扩张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一国际地位迅速改变了美国从官方到学者乃至一般公众对国际政治与安全的认识: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孤立政策”受到冷落,而强调“强权政治”或“实力政策”的现实主义观得到了几乎一致的推崇,因而强权政治的有力运用及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更具有说服力。(2)对“威慑”的青睐,正是在这个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而导致对“威慑”战略与理论重视的直接因素,则是美国在战后东西方冷战冲突中首当其冲的位置及其核武器、核技术的长足发展。在美、苏分别为首的两大集团的战略对抗中,美国很快形成了所谓对“外来威胁认识”(perception of external threat),即所谓共产主义的必然扩张与渗透,几乎是同时,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凯南的“遏制观”被接受为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遏制”认识上的“扩张”需要有效的军事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非“威慑”莫属了。更重要的是,核武器的出现与发展及其军事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威慑”是现实的、可行的,而且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美国学术界对原子弹的威慑意义的认识,早期是冷静的,人都持观察态度,直到美国成功爆炸了氢弹后,对核武器的战略威慑意义的认识与研究的热情才逐日高涨起来。(3)

在美国战略研究中,“威慑”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当代“威慑”理论的主要批评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指出的,其大致经历了三大波(three waves):50年代早期至60年代早期的兴起,60年代末至70年代早期的衰落,及70年代后期的重新振兴。而这每一波的起伏都是和同一时期国际环境的变化及美国整体战略变化相关联的。(4)

在学术界,起初对威慑理论的研究,是从核威慑起步的,主要创始人有两位,一是威廉·波顿(William Burdon),另一位是B.伯罗迪(Bernard Brodie)(5)。其中伯罗迪被公认为核威慑理论的奠基人。1984年,伯罗迪主编的美国及西方第一本关于核时代军事战略的书《绝对的武器》(*The Absolute-weapon*)问世,他自己撰写了二章来阐述“核威慑”理论。现在的美国威慑理论学者们,一致认为伯罗迪起码在三点上为以后该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核武器的出现及其运用于军事目的,将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意义,原子武器具有爆炸威力,使得为数很少的核武器便具备极大地摧毁、甚至完全地灭绝为数可观的人类社会组织的能力。这样一个事实不仅对传统的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观“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提出了挑战,而且在军事意义上提出,传统的战争组织手段“进攻”与“防守”——特别是后者,变得意义不大了。结论:传统意义的战争性质,目的与手段在核军事时代已不再适用。(2)对战争的威慑是核时代里任何一国的唯一理性的军事战略。两个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抗时,传统的不管是依赖于战术上的“闪电战”,还是依赖于武器装备优势的“消耗战”,而谋求战胜对手的设想已失去意义。因为一旦战争爆发,最终两败俱伤,甚至俱亡的局面不可避免,而理性的战略不允许以暂时的军事胜利去换取最终灭亡。结论:在这种条件下的对抗中,战略设想中心已不再是“如何战胜对方”,而一定是“如何威慑对方不发动战争”。(3)谋求或维持这一战略威慑效应的主要手段,是双方都具有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往一来中能够“确保摧毁”对方的核杀伤力。这里重要的不是第一次核打击力,而是承受对方第一次核打击后给予还击的打击力(retaliatory strike capability)。而这一打击力还必须是造成一个“摧毁性的还击(diminishing return),即还击造成给对方的损失将是对方所无法接受的(unacceptable damage)”。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还击力。(6)结论:“双方的确保摧毁”是核威慑成立的必要条件。

“核威慑”以其一开始就表现出决策上的保守与理性。显然,伯罗迪接受了冯·纽曼(V.

Neumann) 20年代末开创的所谓“游戏理论”(game theory),特别是把“囚犯难题”(prisoner's dilemma)运用于对两个核力量对抗的分析中,提出并强调“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在美苏战略对抗及继而产生的核军备竞赛中的至关重要性:“当面临局势不可推测的紧要关头,决策者不可能完全取得最大限度的所得(maximum gain),因此,理性的选择便要求决策者分析出对对方最有利的策略,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决策,这种选择尽管不能得到最大的所得,却能避免最大所失(maximum lost)的结果。”〔7〕由于伯罗迪对“理性选择”的首次运用,以致所谓“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choice model)直至今天仍然是为大多数威慑理论者们所依赖的一个主要分析逻辑。

伯罗迪的“核威慑”论也为后来的威慑学者们留下了一个大难题:如何使“核威慑”对方产生令其置信的心理效应,即所谓的“威慑可信性”问题(issue of credibility)。这是个逻辑上的大症结:假如,甲对乙的威慑依赖于威胁对乙进行核打击,那么,甲威胁所做的行为对甲来说却是一种疯狂(madness),因此,在“双方确保摧毁”的条件下,任何一方的核打击都将导致其自身被摧毁,所以,任何一方决不可能真正实施核打击行为,除非决策者“疯了”。在这种核威慑下,假如乙方相信甲方说到做到,那么,乙方一定也相信甲方“疯了”,假如乙方认为甲方不可能说到做到,那么,乙方也一定认为甲方的威慑不是“威慑”而是讹诈(bluffing)。因此,问题的中心是如何使乙方相信甲方的威慑既不是由于“疯了”也不是在吓唬人。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伯罗迪以后的“威慑”理论学者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了大量地论证。

首先,核威慑可信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找出潜在地导致核威慑失信或失效的战略薄弱环节,即所谓的薄弱环节问题(issue of vulnerability)。设立这一命题的前提是:挑战的一方不受对方威慑所唬而决定实施攻击,是因为其发现了对方的战略薄弱环节。而影响这一环节的重要因素为所谓的第一次与第二次核打击力量。这里,学者们所争论不休的是:到底是准备第一次核打击的战略地位有利,还是等待而准备第二次核打击有利,换言之,即是加强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还是加强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更能消除威慑的薄弱环节。

强调第一次核打击力量更易于导致威慑失灵的代表人物是荷尔斯得特(Albert J.

Wohlstetter)和爱尔斯贝格(Daniel Elsberg),数学家荷尔斯得特在其发表于1958年初《对外事务》上的署名论文“恐怖的脆弱平衡”(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中首次提出第一次核打击对威慑更具有意义的论断。尽管其数理逻辑式的分析,推理和论证极为复杂,甚至令人费解,他的基本观点却只有两条:(1)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战略价值(strategic value)要大于等待而准备第二次打击,即 $V_1 > V_2$ 。主要理由是,影响战略对抗中的双方决策的主要因素是所谓到底要冒多大风险(risk-taking)。而常理中一个信条则是,先发制人或先声夺人能极大地降低“冒险”度。这样一种算计,将鼓励或驱动一方铤而走险。(2)战略薄弱环节和武器装备优势(superiority)已无必然关系,而只是和核武器的设置目的产生紧密的关系。论证这一观点的简单论据是:尽管一方核力量处于优势地位(譬如核弹头的数量是50比10),然而这一优势无法制止对方发动攻击,因为拥有10个弹头一方的第一次核打击,可能完全摧毁另一方的50个弹头,而使得其第二次打击的力量被消灭。因而第一次核打击力量是威慑的关键。据此,荷尔斯得特提出:威慑平衡的脆弱是由于第一次核打击所造成的作用,因此,要使威慑成功可信,必须降低对方第一次打击的驱动力和吸引力,即要使打击的价值 V_s 小于等待的价值 V_w ($V_w - V_s > 0$)。(8)

爱尔斯贝格则是用统计的方法塑造了一个“初步模型”来描述美苏在核对抗中,第一次核打击对任何一方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在其1968年给兰德公司的报告中,他解释了这一模型:如果美苏双方均等待(wait),双方各有的价值效用(utility)为 V_{11} ,如果一方等待准备第二次核打击,其价值效用为 V_{12} ,而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一方则为 V_{21} 。因此,如

果决定第一次打击为 q ，其主观的概率为 $(V_{12}-V_{21})-q(V_{11}-V_{12})>0$ 。(9)

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第二次打击就威慑而言更具有意义。几乎与荷尔斯得特同时，凯浦兰（Morton Kaplan）在其《有限反击战略》中，对此作出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在核对抗中，特别是在“双方确保摧毁”的情形下，影响威慑的可信性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具备多大的第一次打击力量，而是承受第一次核打击之后对战局控制的第二次打击，也称反击控制（counter force dominance）或升格控制（escalation dominance）。换言之，双方在“确保摧毁”的条件下（ $AD_1=AD_2$ ），战略薄弱环节决定于谁的反击力量（counter force）更大，如果甲方的 CF 大于乙方的 CF ，即 $CF_1>CF_2$ ，那么甲方即拥有反击控制力，而乙方的反击控制力则为薄弱环节。凯浦兰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谁拥有反击控制力，谁对核威慑攻击或挑战更具可能。(10) 他的这种强调“反击控制”的观点，后来也得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及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的赞同(11)。

60年代初期，“威慑”理论权威汤姆士·席令（Thomas Schelling）两本关于威慑理论的论著《武力及其影响》、《冲突的战略》问世。他首先提出关于第一次打击的争论已不具备意义，因为他发现造成威慑无益的薄弱环节或产生刺激一方实施挑战的驱动力，不是决策者认识局势的“冒险性”（risk-taking），也不是谁的“反击力”更大，而是对抗中或危机中双方的“利益冲突”的程度，他认为，任何一方导致其趋于冲突的“利益”越大，对威慑状态进行冲击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危机的过程也就是双方（就各自利益）价还价的过程。”怎样消除这样一个薄弱环节呢？席令提出了“合作观”（idea of cooperation）：为了尽最大可能缩小双方利益的差异或冲突程度，必须尽最大努力寻求冲突双方的共同利益（common-interest）；而“双方确保摧毁”的威慑状态本身则是诱导双方去寻求共同利益——即避免两败俱伤——的源泉。(12)

席令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使得“双方确保摧毁”的核威慑得以有效的关键，不是“如何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使对方相信你将如何使用核武器”而必定造成对方无法接受的损失。(13) 这一提法实际上反映了威慑论者们对核威慑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即所谓“核打击目标问题”（issue of targeting）——的关心和探讨。中心议题是，按照或选择什么样的打击目标作核战略部署，而更能使对手相信核威慑的存在。

起初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的，是对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核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的论证。由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4年1月12日公开阐述的该战略的核心，是宣称美国将予以苏联对西方防线的任何一点、任何一时的军事攻击以大规模的核打击。(14) 很明显，其中心是所谓的“反击破坏”威慑观（counter-damage），而基础则仍是双方确保摧毁，对威胁实施核报复的战略目标是不加区别的，即所谓的“目标无例外”。这样的战略能使威慑有效吗？大约10个月后，普林斯顿国际关系教授威廉·考夫曼（William K. Kaufmann）发表题为《威慑的必要条件》一文，对“大规模报复”的目标无例外提出了异议。他指出，报复打击目标无区别，给威慑的一方只留下两种选择：一是无所作为，二是全体自杀。因此，这种战略不仅不能使对方信服威慑的有效（因为除了“疯”了之外，没有决策者会为了保护局部利益去换取全体灭亡的结果），反而使威慑者本身受到“自我威慑”（self-deterrence）。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考夫曼接受了伯罗迪早些时候提出的控制核武器的使用的设想，并进一步提出，这一控制使用必须体现在对反击目标的选择上。为了增强核威慑的可信度，他认为核报复应基于予以对方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如重要的中心城市）进行有限核反击，即对“战略价值目标反击破坏”（counter-value damage）设想。(15) 对于哪些目标属于这样的价值目标（既要造成对方不可接受的损害，又要使双方均认为对此打击是可能），考夫曼以后的学者不乏深入的研究。例如，荷尔斯得特在其给兰德公司的R-290研究报告中即强调，美国对苏最主要的威慑，必须基于“我们摧

毁他们设置核武器的城市”。〔16〕

对城市或价值目标进行核报复的设想,仍未完全解决核威慑的有效问题:对城市特别是对具有战略价值的城市进行核打击,仍然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口将被毁灭。考夫曼自己也在其作为兰德公司研究员时期,对城市目标选择进行不断修正,以至最后他发现“非城市目标”或“战略力量目标反击破坏”(counter-force damage)更能使核威慑有效。换言之,仅对选择的对方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目标进行反击,能使核威慑更具说服力。在兰德公司的支持下,考夫曼在两名数理经济学家大卫·麦加维(David McGarvey)和弗兰克·特灵柯(Frank Trinkle)的帮助下,于60年代初成功地模拟了苏美核战的几种结果,比较了“价值目标”与“实力目标”不同的威慑意义。他仍发现,如果选择“价值反击”,一旦核战爆发,仅一个回合,对美国就要造成1.5亿人的死亡及60%工业生产力的摧毁;对苏联将造成44万人死亡、40%工业生产力的摧毁。如果选择“实力反击”,假如美国把反击目标限定在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机场、导弹及核潜基地、与核武器相关的指挥控制中心,这样可以避免1亿左右人口的死亡。〔17〕他们的结论是,选择“实力反击”战略的核威慑更令苏联信服。这一研究并没有解决几个显而易见的不稳定因素:假如旨在打击军事实力目标的攻击精确度一旦有误而打击了对方城市怎么办?假如对方并不想按照也限定在只打击军事实力目标的原则行事怎么办?假如双方在第一个回合均能只打击军事目标,而吃亏或失败的一方用剩下的核武器再进行大规模报复又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迄今仍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随着美苏地区性冲突与危机的不断增加,核威慑的理论研究扩大到对“延伸威慑”的研究。凯浦兰在其《有限报复的战略》一书中,对延伸威慑大致作了定义:拥有核武器的一方(或超级核大国),依赖于其核威慑力,给予其友邻或盟国以核保护。简言之,就是把敌对双方以防卫攻击彼此本土为目的的核威慑,延伸到以防卫攻击彼此友邻、盟国的程度。在当时的情况下,属于美国延伸威慑防卫范围的,有西欧的北约组织国家和远东与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而划在苏联范围内的,则有东欧的华约组织国家及亚洲的中国大陆。这一威慑的中心问题仍旧是:当对抗中的核力量一方直接或间接参加对另一核力量所保护下的友邻或盟国准备发动攻击时,怎样才能使其相信,这种攻击的结果将会是予以延伸威慑的一方对其本土的核报复。

对于这个问题,延伸威慑论者有三种答案。第一,“有限常规战争”论。即指当苏联以常规战争方式攻击或支持攻击美国的利益范围时,美国将准备以同样方式、同等规模、在同一地区予以反击。这种观点最早是由杜鲁门时期的政策计划署主任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其主持制定的“NSC-68”号战略计划中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后来又受到艾森豪威尔的智囊们,如邦迪(McGeorge Burdy)、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施莱辛格(Arther Schlesinger)等人的呼应。〔18〕他们的“有限常规战”的目的旨在以实战去实行遏制,而把这一设想放在延伸威慑里去系统考虑的则是凯浦兰。他认为,以常规方式有限地“以牙还牙”只是手段,目的是对以核报复为手段的延伸威慑以补充:对对手的挑战予以“立即的但是有限的”(不至于触发核战争的)常规反应,应旨在向对手证明你应战的决心,从而使核威慑更可信。〔19〕第二,“战争边缘论”。尽管这一战略观的发明权属于杜勒斯,真正对其进行论证的是汤姆斯·席令。他认为,推向战争边缘只是手段,而更重要的是双方对潜在危险的控制,进而以这样一种“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来巩固延伸威慑。也就是说,对抗的核力量是双方当局部利益冲突而处于危机状态时,受到挑战的一方,不仅需要摆出会造成对方不可接受的损失的实战姿态(即推向战争边缘),更需要通过外交谈判及对不断发展的危机状态进行控制,让对方也意识到共同利益(即避免损失过大)的存在。〔20〕第三,“有限核选择论”。此论的主要观点是,当局部利益受到对手(哪怕是常规战争手段)的挑战时,仅以常规力量反击是不够的,必须摆出并准备对对手的战略军

事目标（包括其本土的及利益范围圈内的）实施有限地核报复，非此不足以使延伸威慑有意义。（21）

上述这些观点，基本上体现了威慑理论形成阶段的情况。不难看出，此阶段的理论探讨主要围绕着核武器为威慑手段与内容进行的。尽管就其范围而言，延伸威慑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但“核时代、核武器、核对抗”这一主题没有改变。值得指出的是，核威慑的“威慑可信性问题”一直是研究讨论的中心。其次，几乎所有的威慑理论学者都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没有人对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利益冲突、危机、战争存在的必然性提出质疑。最后，就研究方法而言，当时盛行的“理性选择”逻辑推理，以及相关的数理逻辑和传统的演绎推理占主导地位，从而造成单一的、线性的分析形式。然而成果是显著的：这一阶段，就核威慑理论的基本范围、主要对象、基本议题诸方面，初步形成了威慑理论体系的基本格局。

三、关于威慑理论的批评及最新发展

正如美国战略研究其他理论的经历那样，威慑理论的研究进入60年代中期后便停滞，甚至衰败了。早期的那种活跃的研究气氛与不断创新的理论几乎不见了，有的只是来自于其他领域的批评及其自身的反思。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一变化的客观因素，是这个时期的国际关系，特别是苏美对抗关系的变化。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介入及其后果，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场战争所显示出的悲观前景，导致美国的公众舆论的“厌战反战”情绪，从而使得对军方的指责、批评，直接影响学术界军事战略研究的信誉，进而使这一领域不再时髦和热门了。至于到底威慑理论还适应不适应，连威慑理论学者自己也动摇起来。汤姆士·席令曾沮丧地宣称：他的威慑理论体系“无法解释越南战争”后，继之而来的苏美之间的缓和一般公众的“核战的危险在降低”的认识（22），尽管苏美的核军备竞赛从未“暂停”过。

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则是对核威慑理论的批评。这大致可分作四个层次。第一，威慑的理性逻辑（logic of rationality）根本不考虑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首先提出这一批评的H. 波尔（Hedley Bull）指出：威慑的理性逻辑基础于数理经济学的“游戏”理论，而且是几乎不加修改地套用在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他认为威慑理论提出的“只要一国大力发展实力，全面表现实施这一实力的决定，对手即使是毫无理智、或是缺乏远见、或是才识浅薄，也会放弃对这一威慑挑战的打算”的逻辑推理是不现实的。波尔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威慑理论用静止不动的眼光对待变化的、发展着的国际现实。而影响决策者理性选择的因素，除了看对手的实力、决心外，国际环境的变迁，各种集团、地区利益的变化及各种力量（包括政治影响、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文化覆盖等）的对比与消长等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3）荷尔斯提（Ole Holsti）在其1972年版的《危机、升级与战争》（#FKCrisis, Escalation, War#FS）一书中，把威慑理论放到国际关系中的环境中去检验，发现其缺乏普遍意义，根据是：在某种情况下，非理性（irrationality）——如对战争的过分恐惧，对敌方意图的错误理解等——反而使威慑得以成立；而在另外情况下，理性（rationality）反而使威慑破灭。（24）P. 摩根（Patrick Morgan）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决策者们都是理性的，那么在双方“确保摧毁”的条件下威慑是不可能工作的，因为，要实施威胁，就意味着接受摧毁对方、同时也摧毁自己的后果，这对对方来说，这一决策是不理性的。然而杰维斯则运用“安全难题”（Security Dilemma）模式，提出国际环境与威慑的成立与否则有紧密联系。他认为，对抗中双方的敌对意图（hostile intention）是由于国际环境而产生发展的。具体地说，对抗双方的不信任是占主导地位。因此，对方任何一个具体、局部甚至微不足道的军事部署变动，外交言辞的不一致，政治倾向性的转移等等，均有可能被认为是大的攻击性军事行动的前奏。对这种威胁的夸大了的理解，将导致对方做出过分地反应，这一反应同时也会引起另一方更进一步的反应，结果是，任何一小事件的发生均可导致威慑

的崩溃。(25)

属于这一层次,同时也是这个时期对威慑理论批评最有影响的是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ar George)和理查德·斯摩克(Richard Smoke)合写的《威慑与美国对外政策:理论与实践》。他们首先提出,由于威慑理论的产生基础是“演绎推理”(deduction)的方法,以致同美国的国际战略实践毫不相干。这样的理论根本无法指导政府决策者,在处理二战后大大小小的危机中——特别是在延伸威慑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威慑去影响苏联及其盟国的行为方式和意图。另外,他们发现:威慑最多只能使挑战者退缩回原地,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冲突的问题。因此,他们提出:美国的战略学研究应该向其他方向发展,不要死守在威慑理论上。(26)乔治和斯摩克的思想代表了这个时期盛行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思潮,对“遏制”威慑理论的研究影响甚巨。

第二,威慑理论忽略了或有意不考虑影响决策的国内政治因素。尽管传统的威慑从一开始就强调国内政治势力、公众舆论对威慑战略的支持是表现其威慑决心的一环,批评者们发现,威慑理论学者们大都不考虑这一环的重要性。70年代后期M. 荷维德(Michael Howard)发表在《外交事务》季刊上的“战略中被遗忘的一环”一文,着重地分析了这一不足。他观察到,很多威慑论者都把政府的对外政策与战略的决策与实施能力看成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而把其社会的反应几乎不予考虑在内,“就像是11世纪欧洲的君主们那样对军事战略作毫无后顾之忧的决策与实施。”他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冒险”(risk)有不同的社会承受力,直接影响社会生存、发展利益的威慑状态的成功与否,往往决定于本国政治的支持;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并存,也使得在不同制度下,社会舆论、政治势力对其政府对外政策,特别是军事战略的影响力往往不同。他还提出,作为影响双方“决心平衡”(balance of resolve)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的支持与反对,应该成为威慑理论研究的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27)

围绕着威慑战略决策的内部因素(internal factors)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一决策的组织运行机制没有得到重视。这一机制通常包括:决策参谋机构(如美国的安全委员会),军事指挥控制机构(如美国国防部、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外交执行机构(如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对外信息传播机构,及其他辅导机构(如军事科研机构)等等。对于这一决策的组织系统,各个机构的角色、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反馈作用,对威慑战略成立与否的影响,威慑理论学者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研究。持此批评的代表作,是康乃尔大学教授理查德·勒伯(Richard Net Lebow)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通过对不少实例进行分析,勒伯认为:组织机构的结构繁杂、相互牵制、政治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及信息处理的误差等等,直接影响最高决策者对局势的正确认识,以及作决策的信心与决心。由此而造成的“误识”(misperception)和“误算”(miscalculation)往往是威慑成功与否的关键。(28)有意思的是,他批评威慑理论的“理性”基础的基点仍是“理性的选择是威慑成功的前提”,而他的结论则是:“决策中的理性,由于组织机制的关系而不易达到。”

第三,威慑理论不考虑对外来威胁(external threat)或对方意图(intention)可能出现的“误识”(misconception)。威慑状态成立的一个前提,是有一方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从而造成对维护现状一方的威慑。因此,威慑理论学者们均认为“不断的”、“永恒的”威胁之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点。

杰维斯在其著作《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误识》(Perception & Misperception)及其编著的《心理学与威慑》(Psychology & Deterrence)中,批评威慑理论对威胁认识(perception of threat)的想当然。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去解释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不理性。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特色则是不空谈理论,而把理论的精神放到历史事例(historical case)中去检验说明。他发现,特别是在冲突、危机的紧要关头,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决策者本身的心理因素。譬如,心理学

上的“动机与认识曲解”(motivation & cognitive distortion)理论就很适用:如果决策者——特别是最高决策者——基于某些不准确或并不成立的事实,而相信某国或其经手人有敌对意图,一旦这一心态成立,那么这一决策者便开始对有关认识上的敌对国意图的信息作有选择地接受。这意味着和其认识上一致的信息将受到重视,而不一致、甚至证明其认识是错误的则会受到有意忽视。在这样一个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决策者不可能对“外来威胁”或他国意图作出正确的认识与理解。而基于这一错误认识而作出的有关威慑战略的判断与决策也会有误,从而极大地影响威慑的正确实施与可靠效应。(29)

实际上关于威慑状态中的对威胁的“误识”问题的研究,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方兴未艾。近期比较有影响的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杰克·里维(Jack S. Levy)在1983年《世界政治》十月号发表的论文“误识与战争的起源”。他把寻找“误识”根源的焦点放在决策者到底依据于哪些具体事实来认识外来威胁。他发现,在决策者的眼前,对方的军事实力(capability)和对外政策的意图(intention)之间有必然联系,他认为这是“误识”产生的一大根源。实际上“实力”与“意图”两者间的联系不是永恒的,有些情况下,实力决定意图;有些情况下,意图的变化根本不受实力变化的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意图可以在一夜间发生变化,而其实力往往没有作相应的变动。(30)而决策者仅依据实力与意图之间的必然联系去分析对手,误识往往发生。

第四,威慑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现了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背景的战略观点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ethnocentrism)。主要批评者杰维斯刊登在《世界政治》1979年1月号上的“重新探讨威慑理论”一文里,尖锐地指出:尽管威慑理论学者们在讨论核理论时,都声称在讨论“抽象的”“中性的”“A”国或“B”国,而在论证“A”或“B”国在威慑关系中的行为时,基本上基于西方或美国文化背景的战略文化,他认为,威慑理论有两个错误的前提。(1)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的目标不同,但他们认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一致的;(2)尽管不同国家的军事战略理论可能不同,而相对不完善的一方一定会尽快向相对完善的一方看齐。他认为,这两个前提完全不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及社会价值观念使决策者对威慑有不同的认识与分析,以致双方有可能不按同一个模式、同一套规则去进行有关威慑的决策。(31)

乔治·哥斯特(George Quester)在1966年6月《冲突解决月刊》上发表的题为“如何识别共产党军事战略理论的真伪”一文中,提醒威慑理论学者们,不同的战略利益与传统,将会引导苏联领导人在考虑核战略时,把防卫(defense)而不是威慑作为战略目标。由此而会强调核军备的优势以保证守得住、打得赢,而不是承认核对抗的双方都不应该威胁对方第二次核打击的存在,简言之,苏联的核战略观由于苏联的地理位置及传统影响,而不相信“双方确保摧毁”这一核威慑的核心。(32)这样的观点后来也得到杰维斯在其1970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中形象的逻辑》及肯·布兹(Ken Booth)1978年版的《战略与民族中心主义》两本书的肯定。他们更加明确地指出:那种纯抽象、单一的、浅层次的、完全不考虑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威慑理论研究的方法,应该加以抛弃,而应加深层次,扩大范围,认真考虑文化差异。(33)

以上四个方面的批评,尽管给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威慑理论研究大大地泼了冷水,而使其直至70年代末都一蹶不振。然而,正是这些反对意见使威慑理论学者们反思起来,而且开扩了他们的视野,从而奠定其进入80年代后新发展的基础。当然,促进威慑研究重整旗鼓也有个社会因素:苏美核军备竞赛到70年代末已难分伯仲,苏联强硬政策的固执(特别是在阿富汗问题上),使得美国乃至西方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实力下降,影响减弱,而坚持合作、缓和政策难以奏效。因此美国急需重振国威,而加强威慑则成为一剂补药。正是在这样一片呼声中,威慑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然而从这几年的发展来看,其研究已不是传统理论的再版,而向着一个新的、更趋完整的理论系统方向的发展已初见端倪。

首先,核威慑理论导向运作机制的平衡问题的研究。影响这一发展的客观因素,为美苏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 II)的失败,以及卡特政府宣布的“抵消核战略”(countervailing-strategy)。在仍旧是依赖“确保摧毁”还是加强核实战能力的表现以达到核威慑效应的问题上,一开始分歧就很明显。核优势到底能不能使威慑更有效?杰维斯和理查德·贝兹(Richard Betts)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核军备的均势(balance of nuclear force)已不影响核威慑的效应,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核大国的利益平衡,即在核战生存问题上,维护这一根本利益的决心平衡(balance of resolve)。杰维斯特别指出,威慑的成败不受装备的优劣、多寡影响;常常被误识的是决策者对实施核威慑的决心大小,这一主观因素的平衡之微妙才是决定威慑效应的关键。贝兹则通过把这一问题放在美国过去的延伸威慑的经验中考察,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双方确保摧毁”条件下,核优势已丧失意义,而起作用则是双方利益的均衡。即在危机中,哪方牵涉进的战略利益越大,就会更坚定地实施核威胁。(34)另外一些学者却不这样认为。S. M. 凯利(Spurgeon M. Keeny)和潘劳夫斯基(Walfgang K. H. Panofsky)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强调在核对抗中,传统的“实力均势”仍然适用,而影响这一均势的仍旧是武器的多寡、优劣与战略原则的完善与否。他们认为有限核打击原则及为其准备的核装备是巩固、强化威慑的必要条件。考林·格雷(Collin S. Gray)更进一步提出,要改变决策者们不会相信有限核战争能够打赢的状况,关键在于要准备打,而且一定要准备打赢,这才会使威慑起作用。格雷的依据是,美国在和苏联、中国过去的对抗中,对方最终退却并不是由于决心或利益不大而不愿冒险,而是慑于美国核军事实力的强大优势。(35)

其次,是关于“防卫与进攻”(offense and defense)的战略选择对核威慑影响的讨论。直接引发这一讨论的,是里根政府1983年3月公布“星球大战计划”或“战略防卫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有过定论:核对抗任何一方的战略防卫体系是导致核威慑崩溃的一大不稳定因素。简言之,如果一方的防卫力量能成功地保护或加强其承受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一方对自己实施第一次核打击就毫无顾忌了。这一观点成为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成立的基础。当这一问题再次提出时,虽然讨论正在深入,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仍认为战略防卫的加强对核威慑的效应有害无益。他们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任何一方防卫能力的提高,必定使对方变得易于受攻击(vulnerable),从而破坏了双方均不易受攻击这一核威慑成立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加强了防卫的一方会更“敢于”冒险,而其对方也会因此铤而走险,以求先机。(36)第二,由于现代核技术的发展,很难对哪些属于防卫武器或技术,哪些是用作进攻的武器作出明确的分辨,这一困难必将使双方的“误解”或“误识”加深且循环往复,必定使核威慑局面复杂而脆弱起来。(37)第三,加强防卫战略的选择,在延伸威慑问题上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不少学者以第一次大战爆发的原因为实例,强调指出:(1)防卫军事技术的发展并不影响决策者们受进攻战略有利的诱惑;(2)全局、长期的延伸威慑的成功取决于局部的、短期的进攻战略,而着眼于防卫只能使这一威慑消极而无力。(38)第四,加强战略防卫的最大意义,莫过于胁迫(而不是威慑)对方。例如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就为美在和苏的军备控制的长期扯皮中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讨价还价筹码,其作用在于迫使苏联要么勒紧裤带搞核军备竞赛升级,要么就对美的有利于其本身的核军备控制要求作出让步。(39)

关于核威慑研究的另一发展是对相关的内部组织机制对威慑成立的影响的探讨。首先是对核军事的指挥、控制与联络的深入研究。这一层次的深入恰恰印证了维尔德斯基(Aaron Wildavsky)早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组织机制的研究将开拓核威慑的一个新领域”的预示。(40)有意思的是,目前致力于这一研究的主要学者,都以一战的经验作对比研究的基点。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一战爆发是按所谓“螺旋模式”(spiral model)发展

的。冲突的逐步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主要大国的决策机构对军事部门的失控，导致不同层次的军方指挥系统控制了局势的发展，而使得一国决策指挥、控制与信息传递系统的非理性化。据此，这些学者提出，在苏美的核对抗中，军事战略指挥权的过分集中，控制、联络系统的错综复杂与效率不高，将会导致一战“螺旋模式”的重演。遗憾的是，尽管他们都认为要加强C3的改善，而如何进行，且以什么作检验标准，答案至今仍不尽人意。

在这个层次上，战史、外交史学家也作了相当程度的呼应。通过对美国近来解密的50年代至60年代初政治、军事、外交档案的研究，他们把威慑的“内部组织机制”这一课题的范围扩展到国内政治及国际舆论这一层次。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John Lewis Graddis)在其新作《长期的和平》一书中，用一章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结束朝鲜战争、第一次台海危机及1954年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核武器政策作了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的核威慑实际上是个“自我威慑”(self-deterrence)，而导致其产生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及美国盟国的不支持。他的结论证明，关于核威慑的决策决不只是少数决策者可以左右的，政治与舆论(起码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不容忽视。(41)加迪斯的观点最近先后得到马克·特拉登保(Marc Trachtenberg)和大卫·罗森堡(David Rosenberg)的更进一步论证。(42)

80年代以来威慑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应属“常规威慑”理论(conventional deterrence)的出现。这一领域在早期的研究中几乎被遗忘。主要由于核武器作为终极武器的出现，而使传统的常规力量的作用大大减低。即使常规战争爆发，也会很快升级为核战争。国际对抗局势经过30年的变化，常规力量无作为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在核恐怖、核威慑的平衡条件下，谁也不敢轻易打核战争，常规冲突仍是最现实的威胁。因而如何加强常规威慑仍具有意义。最先对此研究的理查德·贝兹，不仅提出了加强常规威慑的重要性，而且率先对威慑的可行性作了论证。然而，他的结论基本没有脱离以前的“灵活反应”战略观(flexible response)。常规威慑只是也只能是对核威慑、特别是延伸威慑的补充。即以常规力量对抗或抑制局部的常规冲突，以求全局威慑的稳定；而常规威慑的成功与否，则须以核威慑为“后盾”。(43)

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翰·墨什默尔(John J. Mearsheimer)的《常规威慑》一书，是迄今第一本比较系统研究常规威慑的论著。曾在军界供职多年的墨什默尔，着重从军事战略角度提出了常规威慑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发现，在两国以常规力量对抗时，至少有三种因素导致一方冲击威慑：(1)武装力量数量上的优势，即有以多胜少的条件；(2)武器装备的先进、精良，即军事技术装备质量优于对方；(3)军事战略的正确选择与运用。经过对20世纪以来几个典型常规冲突的比较分析，他认为军事战略选择这一变量是导致常规威慑成败的关键。墨什默尔又发现，常规军事战略通常有三种选择：(1)消耗战略(war of attrition strategy)；(2)有限目标战略(limited aim strategy)；(3)“闪电”战略(blitzkrieg strategy)。而三者比较，选择“闪电”战略是影响常规威慑状态的最不稳定因素。他认为，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坦克作为常规力量的主要攻击手段，是这一规律的主要原因。坦克的特点很明显：动作迅速，能攻能守，而且还可以携带补充装备，这样就使得传统的常规有形不变防守及纵深运动防守在坦克的突然冲击、纵深穿插、巩固阵地的优势面前无能为力。他的结论是：当双方常规力量相对抗，如果条件允许一方采取“闪电”战略，常规威慑最易崩溃；而至今能够克制对方“闪电战”运用的主要方法仍然是：(1)加强纵深防守特别是防守力量对突然袭击的承受力；(2)加强对反坦克精确武器的研制与装备。(44)

墨什默尔常规威慑一般理论的提出引起了战略研究学界的很大重视，更有意义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对苏美在欧洲的常规对峙形势的讨论，主要议题有：是“华约”的常规力量处于优势，还是“北约”组织占优势？“北约”的防御系统能否维持欧洲的常规威慑？在

什么情况下，“华约”集团会引起欧洲战场上的常规战争？“北约”的常规力量应如何改善？等等。这一争论刚刚开始，分歧就明显存在。与此同时，关于常规海军力量在常规威慑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也吸引着不少学者的兴趣，主要围绕着常规海军战略地位、武器装备、海上防线的构成、攻击战略的选择，以及与其他常规力量的合成关系等等进行探讨，其含义也极不一致。

如何评价这个批评、反思与发展的阶段呢？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现在为时尚早，但起码有两大特点是明显的。第一，威慑理论的研究已由原来单一的、只求线性关系，且浅层次的探讨，转向多元、多层次的综合考察。这里，不再仅着眼于对抗中威慑成败的机制因素了，视野已扩展到内部组织机制、政治与舆论影响、决策者心理因素等等。从传统的核威慑到现在的常规威慑领域，研究领域拓宽了。第二，传统的理论论证方法也有较大的改进。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开始认真注意史学论证的方法，即越来越细致地考察史例，从大量事例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带规律性的论点。而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也开始强调史论结合。这两方面的合作极大地改善了威慑理论研究的环境。

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对“理性选择是威慑成功的唯一条件”的观点，这么长的时期里，没有一位学者或一篇研究文章对此提出异议。尽管众多的威慑理论批评者指出非理性的因素对威慑的成败有影响，而他们的原意无一例外地要求产生新的理论，以便告诫决策者如何避免、防止非理性因素对威慑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这也是当前所谓“理性”派 (rationality group) 和“非理性”派 (irrationality group) 争论的一个基点。能否抛开理性与非理性这一轨迹而另辟新径，可能将是威慑理论有重大突破的关键。其次，迄今的威慑研究大都致力于客观环境与因素对威慑效应的作用，而对主观因素的综合探讨不多。威慑的运作过程，实际上主要是主观心理变化的过程。主观认识的形成与变化，除了受客观环境影响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决策者自身主观因素的制约，尚无系统的理论分析。最近开始受到重视的“战略文化” (strategy culture) 研究，由于其对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地域与传统造成的认识上的约定与规范，决策者的心理素质及行为方式等作综合考察，可能会对威慑运作的研究有启发意义。

纵观30年来威慑理论在美国学术界的形成与发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威慑作为理论研究与威慑作为战略的设想与决策是紧密相关的。尽管美国的学者们总以能够独立于“政治”进行研究而引以自豪；尽管对决策者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有多少程度受理论研究的影响尚无定论，但学术界紧紧围绕着政策问题 (policy-oriented) 作理论研究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最近的一位威慑理论评论者也毫不讳言。他并且尖锐地指出，这也是造成理论界只能产生只有“短暂上架效用” (a brief shelf-life) 理论的原因之一。(45)

注释：

(1) 这一会议的主要内容已由 Joseph S. Nye Jr. 和 Sean M. Lynn-Jones 总结成文。Se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8 (Vol. 12 No. 4), pp. 5-27.

(2) Ibid., pp. 8-10.

(3) See K.T. Holsti, *The Dividing Disciplines: Hegemony &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Winchester, Mass.: Allen & Unwin, 1985).

(4) See 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 1979, pp. 289-324.

(5) See William Borden, *There Will Be No Time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y* (New York, Macmillan, 1946); Bernard Brodie (ed.), *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 World*

Order(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6) See Brodie, *The Absolute Weapon*, pp. 48-77.

(7) 美国著名军事战略评论家 Fred Kaplan 在其名著 *The Wizards of Armagedoom: This is Their Untold Storie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3)中对 50、60 年代的美国军事战略研究作了很细致的描述。关于“理性选择”观点,参看第三章。

(8) Albert Wohlstetter 是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的兰德公司主要战略经济分析家。他尽管没有取得数学博士学位,但他的数理经济方面的硕士论文在当时很有影响。关于他的威慑观,参看其文“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Jan. 1959 (Vol. 37, No. 2), pp. 209-234.

(9) Daniel Ellsberg 50 年代末进入兰德公司。主要做核军事战略方面的研究。关于他的初步模型理论,参看他 1968 年提出的兰德公司报告,第 P-3883 号“The Theory & Practice of Blackmail”。

(10) Morton Kaplan, *The Strategy of Limited Retaliation* 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cy Memorandum, No.19,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9, 1959).

(11) Robert McNamara, “The ‘No-Cities’ Doctrine”; and James Schlesinger, “Limited Nuclear Option”, From Robert Art & Kenneth Waltz (e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nal Relations & Foreign Policy* (Lanham: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3).

(12) Thomas Schelling 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然而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则是关于战略问题的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及 *Arms and Influe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主要参考第一本的 1-3、8-9 章,及第二本的 1-3 章。

(13) 同上。主要看 *Arms and Influence* 1-3 章。

(14) 关于美国战略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变化,参看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 1、2、3 章。

(15) William Kaufmann, *The Requirements of Deterrence*, (Center of Internatinal Studies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4)。这一观点后来又被比较系统地阐述,看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概论”及 1、4 两章。

(16)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oom*, pp. 208-209.

(17) 同上。参看第 5 章,第 232-247 页。

(18) 关于 NSC-68 号报告,主要看 Gaddis, *The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第 2 章。另外,早在 1950 年,包括提及的几位在内的 11 名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曾联名写了一封长信,投寄在《纽约时报》上,公开批评完全依赖于核威慑来解决局部冲突。

(19) Morton Kaplan, *The Strategy of Limited Retaliation*.

(20)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Chapter 3-4.

(21) William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Chapter 4;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22)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oon*, pp. 334-335.

(23) Hedley Bull,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4 (July, 1968), p. 600.

(24) Ole Holsti, *Crisis, Escalation, War* (Montreal: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7-25.

(25)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2 (Jan. 1978), pp.167-214;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pp. 289-299.

(26) 参考 Alexander George &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他们的“多例实证”法(multi-case study)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法。

(27) Michael Howard,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57, No.5 (Summer, 1979), p.982.

(28) Richard Net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29)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主要看“概论”与“结论”两章。

(30) Jack S. Levy, "Misperception and the Cause of War",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1 (Oct. 1983), pp.76-99. Levy 的另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是 *War in Morde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这是迄今运用系统论方法探讨国际关系变化规律的最成功的成果之一。

(31) 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pp.299-301.

(32) George Quarter,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al & Pretended Communist Military Doctrin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X, (June, 1976), pp.173-179.

(33)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32-236.

(34) Robert Jervis, "Why Nuclear Superiority Doesrit Matt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4, No.4 (Winter, 1979/80), pp.617-633; Richard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1987).

(35)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是: Spurgeon M. Keeny Jr. & Wolfgang K.H. Panofsky, "MAD Versus Nuts", *Foreign Affairs*, Vol.60, No.2 (Winter, 1981/82), pp.287-304; Colin S. Gray, "Nuclear Strategy: The Case for a Theory of Vic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 No.1 (Summer, 1979), pp.54-87. 这两篇论文基本上反映了美国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潮的影响。

(36) See Michael Intriligator & Dafobert Brito, "Non-Armageddon Solution to the Arms Race", *UCL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Affairs Reprints*, No.1, 1985, p.9.

(37) Charles L. Glaser, "Do We Want the Missile Defense We Can Bui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0, No.1 (Summer, 1985), pp.25-57.

(38) 持这一观点的有: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 Strategy: When Is Offense Best" 哈佛大学1985年未出版论文; Jack S. 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2 (June, 1984), pp.219-239; John J. Mearsheimer, "Offense and Defense", 芝加哥大学1987年未出版论文; Scott Sagan, "1914 Revisited: Allies, Offense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1, No.2 (Fall, 1987), pp.151-175.

(39) See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Jack L.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octrine Making & The Decision of 1914*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40) 摘自 Aaron Wildavsky, “Prac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Defense Polic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25, No. 1 (Mar. 1965), p. 100.

(41)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2) Marc Trachtenberg, “A Wasting Asset American strategy & the Shifting Nuclear Balance, 1949-54”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IT, 1988 年未出版论文); David A. Rosenberg, “A Smoking Radiating Ruin at the End of Two Hours, 1954-55”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3 Winter, 1981/82), pp. 3-39, Rosenberg 现为美国战争学院的外交史学家, 专门从事核战略发展的研究。

(43) Richard Betts,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Predictive Uncertainty & Policy Confidence*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0).

(44) 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1-3.

(45) See Joseph S. Nye, Jr. &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pring, 1988), Vol. 12, No. 4, p. 12.

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透视

黄椿、胡阳

西太平洋地区(包括夏威夷以西太平洋海区及海上和沿海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是认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随着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更为重要。因此,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一个较全面和透彻的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战后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历史、冷战结束的影响和 90 年代可能出现的趋势三个方面作些探讨,有遗漏之处,请予指正。

一、战后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历史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有过三个阶段性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和它的霸权主义政策。这是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始终不变的因素。

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新中国的成立。在此大约 5 年期间,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目标是维护和加强美国在该地区取得的有利地位,保证西太平洋地区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为达到此目标,美国采取了四项重大措施:其一,扶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力图通过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稳定东亚局势,保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其二,压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1)当时,美日之间三年残酷战争的影响尚在,美国压制日本的措施是十分严厉的;其三,排斥英、

法、荷等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和整个亚洲大陆扩展其经济与战略利益扫清障碍；其四，阻止苏联影响向亚太地区扩张。不过，由于战后初期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战争的破坏也使苏联暂时无暇东顾，因此在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中，针对苏联的成分还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上述四项措施中，扶持国民党政府最为重要。美国认为，“一个稳定、统一、亲美的中国，会是整个亚洲的关键”。⁽²⁾它必定会成为抑制日本、排斥老殖民主义势力和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有力因素。还在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1月，美国国务院在为罗斯福总统出席雅尔塔会议所准备的文件中就说：“我们建议由我国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的、稳固的和统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³⁾为此目的，美国不惜支出几十亿美元和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打乱了美国的计划，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它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

第二阶段，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这个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即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在欧洲，遏制的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在亚洲，则把中国作为重点。当时，“美国在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建立一支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平衡新中国”。⁽⁴⁾特别是朝鲜战争后，美国不甘心失败，处心积虑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力图封锁、孤立和搞垮新中国。为此，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作了如下调整：⁽¹⁾放弃压制日本军事力量的政策，转而扶持日本恢复和发展武装力量，帮助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建陆海空三军。这是美国在中国大陆建立亲美政权打算落空后而采取的最重要补救措施。美国认为它在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的一个重大威胁来自中国，想借助扶持日本抵销中国影响的扩大，使日本成为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前沿基地；⁽²⁾通过双边和多边军事协定，建立范围广泛的联盟体系，力图构筑一条包围和封锁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长链。从1950年到1954年，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签订双边军事协定，并积极策划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³⁾将核武器引入西太平洋地区，向该地区派驻重兵，并直接参加对该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依仗此时在核武器上占有的巨大优势，制定了“两个半战争战略”，把中国列为主要打击对象之一，还威胁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报复”。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第7舰队的实力得到加强，第7舰队成为美国海军中实力最强的舰队。美国还直接卷入西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武装冲突甚至对该地区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如发动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到1968年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集结的总兵力达86万余人（越南53.4万，泰国4.8万，日本7.9万，南朝鲜6.7万，菲律宾2.8万，台湾0.9万，海上9.4万），占同期美军总兵力的1/3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却在西太平洋投入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战略重点与兵力部署的不平衡状况，显然有利于真正能够威胁美国霸权地位其实力日益增强的竞争对手苏联。苏联正是利用美国陷在越南泥潭里的有利时机，悄悄地追了上来。待美国有所清醒时，苏联已是可与美国并肩齐坐的有力挑战者了。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对此曾十分痛心地说道：“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有许多事情都是由于战争而被耽误或推迟了”。⁽⁵⁾到60年代末，美国面对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和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不得不再次对西太平洋战略作重大调整。其标志就是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发表的关岛讲话——即尼克松主义的出笼。美国西太平洋战略进入第三个阶段。

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美国谋求从印支半岛的战争泥潭里脱身，集中力量，加强与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争夺。此时，美苏力量对比已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而中美双方又都共同面临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拥有了可观的实力，成为亚太地区不可轻视的力量。这些情况，促使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改变朝鲜战争以来的敌对状态。1970年3月，尼克松在致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就正式提出：“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⁶⁾尼克松政府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进行调整的关键。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1978年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中美关

系的正常化。这也标志着美国大体上完成了它对西太平洋战略的调整。此后，里根政府虽又作了一些微调，如加强前沿部署等，但基本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不仅为美国赢得了一段宝贵的时间和相当的回旋余地去恢复越战创伤，重整国力和全球部署，而且还由于它们得以同其他有关国家一道对当时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侵略行径所起的有力遏制作用，而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7〕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意义重大，所以，美国甚至不惜断绝与“老朋友”台湾的外交关系。1972年以后，美国第7舰队基本上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印支战争结束后，美国把部署在西太平洋中国当面的军事力量大部撤走。到1974年6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就从86万多人骤减为16.1万人（日本5.8万，南朝鲜3.8万，泰国3.1万，菲律宾1.7万，台湾0.5万，海上2万）。进入80年代以后，其兵力又有所削减。1989年底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约12万人（日本5万余，南朝鲜4.3万，菲律宾1.7万，关岛0.8万）。〔8〕美国除大量减少军事力量外，还将军事部署的重点北移，放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把该地区作为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军事上实行前沿部署的关键。很显然，这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向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军事力量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即大幅度减少地面部队，加强海上与空中力量的实力。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针对苏联太平洋舰队实力迅速增长，美国也着手加强它在太平洋的海上实力。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7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第7舰队2个，第3舰队5个），107艘主要水面舰艇和51艘潜艇。〔9〕其实力超过苏联太平洋舰队。若再加上日本海军，则占有明显的优势。

美国调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大力推动日本加强军事力量。日本隔海与苏联相望，日本控制的对马、津轻和宗谷海峡，是苏联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深海的必经重要战略通道。苏联向亚太地区进军的第一道冲击波，可能要由日本承担。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无力派出更多的部队到东北亚地区。因此，美国力促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实力，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作为美国对抗苏联实力不足缺陷的补充。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的军事实力迅速增长。1989年，日本的军费开支达297.4亿美元，仅次于美苏，占世界第三位。日本三军总兵力虽只有24.7万人，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实力不可低估。尤其是日本海上实力的增长令人瞩目，以63艘主要水面战舰为核心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力在太平洋地区仅次于美苏海军。此外，美国还大力扶持南朝鲜扩充军事力量，减少南朝鲜军队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到1989年，南朝鲜拥有65万人的军队，包括1500辆坦克，31艘主要战舰和潜艇以及300多架作战飞机。〔10〕美国扶持南朝鲜扩大军事力量，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抗北方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腾出驻南朝鲜美军用于对抗苏联。

美国通过推动日本和南朝鲜增强军事实力，弥补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而在亚太地区兵力不足的缺陷，使美国得以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对苏实行前沿部署军事战略。美国同日本、南朝鲜以及菲律宾的联盟关系，则是美国实行前沿部署和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础。支撑这一联盟关系的，是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前沿部署、联盟关系和核威慑三者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军事部分的基本内容。

60年代以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支援第7舰队派驻在印度洋的分舰队。这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向中东和南亚地区扩张和保障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而采取的重要战略性措施。美国驻印度洋分舰队主要由第7舰队派出（也有一部分第6舰队的舰只），它与部署在地中海的第6舰队遥相呼应，对中东构成南北夹击之势，大大缩减了美国对中东及南亚地区危机反应的时间，成为美国保持在中东和南亚、特别是在波斯湾影响存在的有力支柱，同时也是阻止苏联南下暖洋和保证海湾石油基地及印度洋航线安全的主要力量。在今年8月的海湾危机中，美国所以能够迅速部署军事力量，就是依靠了印度洋分舰队的大力支援。在印度洋，美国不享有基地网的优势（迪戈加西亚基地规模太小）。中东和南

亚地区一旦有变,印度洋分舰队就必须侧重依靠部署在西太平洋美军及在该地区基地网的支援。

综上所述,自70年代以后,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主要内容有三:(1)与中国建立联合抗苏的战略关系,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的部分力量,特别是苏联强大的地面部队,减少美国所受到的压力。(2)在军事上以核威慑为后盾,依靠与日、韩、菲之间的军事同盟,充分发挥美国在海、空军上占有的优势及日本和南朝鲜的军事力量,针对苏联实行前沿部署军事战略,把苏联的军事力量封锁在日本海内。(3)支援部署在印度洋的分舰队。在这三项主要内容中,美、日、韩、菲军事联盟是基础(美日联盟又是轴心),与中国建立联合抗苏的战略关系是关键。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云谲波诡。就在人类社会即将迈入20世纪90年代之际,国际关系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对它的全球及地区战略进行重大调整。

二、冷战结束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去年底以来,东欧诸国及苏联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目前,这一变革仍在继续,重点已从东欧转移到苏联。东欧和苏联发生的急剧变革,结束了持续45年之久的、以雅尔塔体制为中心的冷战格局。美苏关系全面缓和,并向合作方向发展。

冷战结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西太平洋地区,它的影响虽不似在欧洲那么强烈,但足以使该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其影响的核心内容就是长期以来形成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最重大因素之一的苏联威胁的大大减小。随着苏联因素的变化,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自会发生重大改变。它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 中美联合抗苏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被大为削弱。共同抗御苏联的军事威胁,是促成中美两国建立战略关系的主要原因。建立和维持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关系曾使中美两国受益匪浅。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处理国际关系上采取“新思维”的态度,美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从那时起,就已有有人认为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关系还是存在的。因为当时美国还是把苏联看成是与它争夺霸权的有力对手,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然而,在冷战结束的今天,美苏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已不再是相互敌对的手。这次海湾危机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这不仅仅是苏联为维持同美国缓和的关系而采取的姿态,更重要的是苏联与美国维护世界稳定的共同利益所驱使。从长远来看,如果苏联经济能够按照苏共28大上的决定成功地转向市场经济,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上全面合作的障碍将被搬除,从而有可能使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实现大规模的相互渗透,形成苏联与西方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并最终决定苏联必须走与西方国家合作发展的道路。对于苏联出现的从经济制度上根本变化的可能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已看到,并从外部给予积极的推动。今年6月底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和7月份召开的北约国家首脑会议均决定向苏联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就是例证。

中苏关系也取得重大进展。去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贸易额达到31亿美元。今年4月,中国总理访苏,中苏双方达成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中苏两国军队间的交往也已恢复。甚至有消息说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某些军事装备和技术。中苏之间60年代以来的敌对气氛已基本消失。

中美两国都是因为面临共同的苏联威胁而形成相互支援的战略关系。今天,当这一共同面临的威胁大为削弱之时,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降低是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应当怎样应付这一变化。是仅仅把对方当作一张价值下降的“牌”抛出去,还是着眼于中美两国和亚太地区的长远利益,共同努力寻找新的合作领域?这就要看两国领导人能否

以远见卓识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和恢宏的气度来规划未来的战略设想了。

2. 动摇了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前提。70年代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对抗苏联的攻势。美国的核武器大部分瞄准了苏联。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实行前沿部署和得以保持与日本等国家的密切的联盟关系，都是为了同苏联威胁相对抗。冷战的结束，苏联军事威胁大为减小。苏联的军事战略已从进攻型转为防御型。据报道，苏联部署在远东地区军事力量的结构已开始发生变化，即从注重进攻变为注重防御。可以确认，在90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很小。今年7月召开的北约国家首脑会议，已宣布不再把苏联看成敌人。《洛杉矶时报》7月31日报道美国国务卿贝克出访新加坡时说：“根据贝克的观点，苏联被视为潜在的朋友和伙伴，而不是美国在亚洲的头号敌人”。在最近处理柬埔寨问题和海湾危机上，美苏已表现出积极合作的倾向。

苏联威胁的减小和美苏关系性质的变化，使美国以对抗苏联为主要内容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前提发生了动摇。美国的战略成了失去对手的战略。甚至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集结一支针对苏联的庞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都成了问题。今年4月发表的美军国防部报告《亚太地区战略原则：展望21世纪》中就承认：“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目前苏联国内和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前景发生了变化，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现在被看得不那么重要了。”美国国内要求减少美国驻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这类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国会中形成决议，并在政府外交政策中反映出来。因此政府是不能让这种失去对手的战略长期继续下去的。

3. 日本未来地位的前景复杂化，所谓“力量真空”的出现，有可能引发填补“真空”的斗争，并使该地区已存在的各种矛盾趋于激化。

美日军事同盟是美国维持西太平洋地区联盟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环。60年代末以后，美日军事同盟的主要任务是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的扩张。苏联威胁的大为减小，将使以抗御苏联扩张为前提的美日同盟关系趋于松散。战后，美国虽然促使日本重建军事力量，80年代以后，还积极支持日本军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度。但美国始终没有忘记要将日本军事力量的规模和目标纳入到美国的战略轨道中。因此，日本军事力量的装备来源、力量结构、情报系统等许多关键方面都严重依赖美国。美国部署在日本和西太平洋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对日本来讲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日本的军事保护伞，也是制约日本无限扩大其军事力量的紧箍咒。美国人很清楚，把日本军队这只虎放出笼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需要对它有所限制。对日本来讲，它之所以接受美国“紧箍咒”的限制，主要是因为它面对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而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的保护（特别是核保护伞）。但在苏联已不构成多么严重威胁的今天，美国“保护伞”对日本安全的意义自然要大大降低。美国“紧箍咒”能否长期念下去也就令人怀疑了。对日本可能会独立发展军事力量和建立自己的战略目标的担心，恐怕已不是杞人忧天了。

苏联威胁减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苏联大幅度裁减其军事力量。据今年日本《产经新闻》7月16日的一篇报道，苏联外贝加尔、西伯利亚和远东3个军区的4个师已被取消，另有10多个师也准备取消。师的装备也发生很大变化，以前一个师配属220至230辆坦克，现在已减少为60辆。这就使部队的进攻能力大为降低。反映了苏联军事战略从进攻型向防御型的转变。今年8月12日莫斯科电台也说，“苏联在明年4月以前将把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减少20万人。……在过去5年中，苏联已从太平洋撤出57艘军舰，在1990年底以前还要撤出16艘军舰”。（11）苏联裁减它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也促使美国削减它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就曾表示，今后3年内，美国将从西太平洋地区撤出1.2万人，占美国目前在该地区总兵力的10%。苏联若继续裁减其军事力量，美国的削减幅度还会再大些。

西太平洋地区虽不像欧洲那样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但美苏在该地区的对立，仍然是该地

区战略格局的基本内容之一。美苏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是长期以来保持该地区战略均势和制约其他各种力量变化的一个重大因素。美苏既是对立面,也是统一体。它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中纵横捭阖,同时也压制了其他一些力量成为影响该地区的战略性因素。然而,美苏在该地区军事力量削减和退出的趋向,有可能诱使长期被美苏争夺的斗争所压制的一些力量发展成为能够或者力图填补美苏遗留下“真空”的角色。其中拥有强大经济力量和相当军事实力的日本最为引人注目。事实上,日本已经出现与美国的战略轨道拉开些距离的倾向。日本国内也不乏要求做军事大国的舆论。日本一名右翼团体的头目就曾叫嚷,“现在是美国把军队撤回的时候了。日本能够保卫自己”。有报道说,在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公开讨论派军队去维护日本领水以外的防务利益的可能性”。日本防卫厅长官松本十郎就提出:“在海外使用日本军队对劫持日本国民的恐怖主义分子进行‘闪电式军事打击’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次海湾危机发生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一些首脑人物和防卫厅某些官员都表示可以考虑向中东派遣日本自卫队。这一情况在日本战后史上还是首次出现,人们似乎已经可以听到日本向军事大国迈进的咚咚脚步声了。

诚然,日本军事力量的规模还较小。且不说与美苏相比,就是与南朝鲜和越南比也强不了多少。但是,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超级大国,1988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就达2842.7亿美元。日本拥有的强大工业力量和先进科学技术,完全可以保证日本在短时期内成为世界性的军事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从希特勒上台到发动战争,也只经历了7年的时间。当今的日本可比昔日的德国要强大得多。日本还可以利用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扩大其政治影响,和某些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主要靠经济力量维系的势力范围。就如同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今年3月2日的施政演说所说,“要发挥日本具有的经济、技术力量和经验,积极参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那样一个日本就会成为真正敢说“不”的日本了,并且会具有相当强烈的对外部势力的排他性。而头一批受到挑战的国家中很可能包括美国。尤其是美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很难断言它们不会因此闹翻。美国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势已感到某些不安。在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就有所反映,并明确表示要阻止日本军事力量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的倾向。

除日本的崛起有可能使西太平洋地区目前的战略格局失去平衡外,美苏在该地区力量的削弱,还有可能诱使其他一些国家窥测地区性军事大国的宝座,以填补力量“真空”。这就有可能使地区性的矛盾激化,给该地区造成更多的动荡。在这方面,东南亚地区似乎比较危险。

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使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再次处于各种力量重新排列组合时期。这一局面将促使美国对它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又一次进行重大调整。

三、90年代的可能趋势

西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日本已是占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四小龙”都位于西太平洋地区。近几年新崛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国家,也都属于该地区。11亿人口的中国也是西太平洋国家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美国在经济上与西太平洋地区联系十分密切,这一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对美国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西太平洋是美国在太平洋实行前沿部署的最前线,是控制整个太平洋和支援美国印度洋分舰队的关键之地。因此可以确认,本世纪结束之前,美国不会把军事力量全部或大部从西太平洋地区撤走,它也不会轻易改变目前在这一地区实行的联盟政策和前沿部署。美国需要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它在西太平洋地区日益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利益。这是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不变因素。

然而,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各种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又迫使美国不能不对它的西太

太平洋地区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局势。在90年代,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调整可能会出现下述几种情况:

1. 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调整的重点,将是改变长期以来侧重在军事上联合抗苏的方针,转而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利益为主的方针,即整个战略的重点将从军事转为经济。

长期以来,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基本前提是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其战略的目标就是遏制苏联势力东出亚太地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和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都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今,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合理足够的防御程度为目标”(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语),军事战略由进攻型转为防御型,对美国的威胁已大为减小。美国自70年代以来在西太平洋地区实行的侧重在军事上联合抗苏的战略方针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行。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增长。与欧洲相比,西太平洋地区诸国资源丰富,市场广大,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加上该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技术相对落后(日本除外),集团化组织程度不强,有利于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在该地区的竞争。1980年至1986年,美国同欧共体的贸易额下降了7%,而与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则上升了21%。自1981年起,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西太平洋占大部分)就超过了与大西洋地区的贸易额。1989年,美国对大西洋方向的贸易额为1700亿美元,而对太平洋方向为2600亿美元。1988年,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贸易额,占美国全球贸易总额的36%。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已超过300亿美元。美苏关系的缓和,美国还有可能加入到大规模联合开发苏联远东地区的宏伟工程中来。这对美国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和减少对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能源的依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之,在90年代,美国与以西太平洋地区为中心的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联系会更为密切,这一地区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

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军事力量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利益。正如布什总统今年3月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说,美国安全战略一向追求的目标就是“以增进我们人民的福利”和“致力于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在冷战时期,苏联军事威胁的严峻现实,使安全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因素。那时,经济利益需要服从军事战略。冷战结束,长期由安全因素掩盖着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便突出起来。如近几年美日经济矛盾的尖锐,一方面是因美日间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使美国不堪忍受;一方面也是由于苏联威胁的减小,对美日双方讲,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正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的缘故。

为维护和扩大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将充分利用它部署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影响。美国会竭力保持该地区盟国在军事上对它的依赖,使盟国在安全问题上有所求于美国,从而迫使它们在经济上对美国让步。为维护和扩大美国的经济利益,对经济制度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降低双边贸易中美国逆差的状况(西太平洋地区诸国及地区几乎均对美国出超),如压日本签订“消除结构性障碍协定”等。美国的高技术,将作为美国改变贸易逆差状况的有力武器。对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美国除保持与它们的正常经济交往外,还将努力从外部创造环境,促使其经济向市场化转变。美国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货币和金融体系上占有的优势,这将成为促进这种转变的主要手段。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今后世界上各种势力的较量将更多地依靠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与科技实力。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中,军事部分的重要性也就会有所降低,而经济与科技部分的地位则会大幅度提高。因此,各国今后将把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争夺作为战略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战略正处在向一个完全新的阶段转变时期,即以侧重军事争夺为主转变为侧重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竞争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仍然不可低估,但将逐渐退居辅佐力量的地位。

2. 与战略重点的调整相适应,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也将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首先, 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的性质将由敌对转变为防范; 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也会作适当削减。到目前为止, 苏联仍是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主要目标, 因为只有苏联才拥有能够在该地区对美国提出挑战的实力。但美国已经不是把苏联看成是危险的敌人, 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的性质正由敌对向防范转变。敌对与防范有很大差别。敌对是对危及自己生存的挑战的反应, 而防范则是对潜在威胁的可能性的反应。事实上, 美国就是对它的盟国也是有所防范的。美国对苏军事部署由敌对转为防范, 就使它削减驻西太平洋地区兵力成为必然。这已在前面有所叙述, 不再重复。但美军减少的幅度和速度不会太大, 在90年代逐渐减少1/3大概是极限。因为在该地区的美军并不仅仅对付苏联, 还担负有其他战略任务。

其次, 美国军事部署中防范中国的意图将会有所加强。70年代以后, 中美之间形成共同对苏的战略关系。但是, 美国始终是把中国列为防范对象的。所谓“中国威胁”也时常出现在一些美国人的言论中。只是由于苏联威胁的紧迫性, “中国威胁”的论调才没有多大市场。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小, 中美战略关系重要性的下降, 特别是由于去年中国政治风波中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导致中美意识形态上矛盾的激化, 美国又有一些人把“中国威胁”的陈货搬了出来, 并且在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也有某些反映。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心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担心中国国防现代化, 会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构成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及其盟国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2) 担心中美之间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会激化到压倒国家利益的地步, 从而导致敌对; (3) 怀疑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会停滞不前,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受阻或被打折扣, 使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 不能参加解决世界与地区性冲突以及防止核扩散、减少军售、环境保护、反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行列, 从而使中国成为“难以预测”和“不稳定”的因素。美国的这些担心所依靠的根据当然是错误的。中国一贯坚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改革开放政策也不会变。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是荒谬的。不过, 目前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仍然是要维护和发展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最近布什政府维持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不反对日本恢复向中国贷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美国国务卿贝克曾说过,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确有它的安全利益, 中国是这个方程式的一部分”。美国要维护和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利益, 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没有中国的积极合作是十分困难的。

美国加强防范中国的具体措施, 可能会包括增加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军事装备的出口, 制订针对中国的应付所谓“突然事变”的军事行动计划等。但军事部署上不会有较大变动。

再次, 对付“低烈度”冲突的力量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战后, 西太平洋地区就一直是世界上冲突和动乱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美国战后打的两场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是在这一地区(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这一地区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差别、贫富悬殊的巨大、民族矛盾的尖锐等诸多问题, 预示着在90年代, 这里仍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区。美苏在该地区军事影响的减弱, 也会使一些长期被美苏争夺所压抑的矛盾重新活跃起来。美国国防部今年4月的报告中就担忧地谈到, “政治上的不稳定和动乱将成为该地区主要国家的特征”。由于大国直接介入该地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较小, 而且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愿意轻易打一场代价高昂的大规模战争, 西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冲突将更多地以“低烈度”的形式出现。如颠覆与叛乱活动、游击战、武装快速突袭、恐怖主义行动、劫持交通工具和人质等。“低烈度”冲突虽不会对美国的生存安全构成挑战, 但它会严重破坏正常经济活动的运行, 因此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却是个重大威胁。所以在90年代, 美国将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对付“低烈度”冲突的能力, 如配署快速反应部队、增加用于对付此类冲突的专用装备、加强美军本身及与盟国联合对付“低烈度”冲突的训练等。有报道说, 美国已着手在冲绳建立“城

市战”训练中心，为对付“低烈度”冲突作准备。

最后，美国将加强对印度洋分舰队的支援力量。90年代，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第7舰队将继续担负对印度洋分舰队的支援任务。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如果说以前印度洋对美国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诸如维护海上航线安全、阻止苏联势力南下暖洋以及可以在那里部署弹道导弹潜艇并对苏联中亚地区构成核威慑等军事方面的话，那么今后将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方面。印度洋地区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这一地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十分巨大。美国、西欧、日本等国所需相当一部分石油来自于印度洋的波斯湾地区。环印度洋周边的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泰国、印尼、新加坡、埃及、伊朗、伊拉克等国都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未来这一地区也将会出现同西太平洋地区一样旺盛的经济活力。这一趋势已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而日本已经捷足先登了。今年5月日本首相出访南亚诸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日本与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美国当然也是不甘落后的。美国需要继续在印度洋保持一支军事力量，以维持和扩大美国影响的存在。为加强对印度洋分舰队的支援，美国目前还不会轻易放弃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国失去克拉克和苏比克基地，它支援印度洋分舰队的基地就得后移2780公里到关岛和加罗林群岛一线。这就意味着军舰即使以30节的高速连续行驶，也要多走48个小时。在现代战争中，迟早48个小时，可能正是胜败的关键。美国还将为第7舰队增加核动力舰艇，以延长舰队的持续巡航时间。目前，第7舰队已经是美国海军中拥有核动力舰艇较多的舰队了。此外，美国在关岛和加罗林群岛上的基地也将得到加强，以便为可能失去的菲律宾的基地作准备。

3. 维持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均势，阻止打破这一均势的其他势力的出现，将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自60年代末以来，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苏三足鼎立，在力量对比上各有所长，基本上保持着力量均衡的态势。这种局面有利于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对中美两国都有有利的一面。因此对美国来讲，当然不希望这一均势局面被打破。在今年4月的美国国防部报告中就指出，美国要在西太平洋地区“维护均势，以防止任何地区性霸权主义的出现”。表达了美国力图维持该地区均势局面的愿望。这里的“任何”二字意味深长。显然，它包括了美国的长期盟友日本，反映了美国对日本军事力量发展前景的某种防范意图。因为事实上只有日本才有实力打破西太平洋地区目前的均势局面。日本《读卖新闻》对此曾分析道，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表明了美国政府要阻止日本军事大国道路的态度”。时事社认为，“驻日美军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即由过去保卫日本以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转变为监视日本”。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本基地司令亨利·斯塔克波尔少将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日本的邻国都不希望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因此，如果我们退出美日安全条约，这肯定会成为亚洲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对日本军事力量防范意图的画外音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强烈要求日本进一步承担大部分驻日美军的费用，就是限制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一项具体措施。如果美国的要求被日本所接受，日本将被迫供养一支不是服从于日本政府而是听命于美国的军队。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也将因为缺少财政保障而难以大幅度扩大，日本也就很难成为军事大国。总之，日本要做经济与政治大国，美国是不会有疑虑的。但要做军事大国，美国是要反对的。

美国还会竭力阻止其他试图打破西太平洋地区均势的因素发展壮大，反对企图建立地区性霸权的国家扩张其势力和影响。因为任何试图打破西太平洋地区均势的行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从而威胁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战略利益。

当然，上述几种情况是否会出现，还要看西太平洋地区各种力量的消长以及整个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美国必定会对它的西太平洋地区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因为这一地区的战略格局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注释：

- (1) F. C. 琼斯、休·博顿、B. R. 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43页。
- (2) 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96页。
- (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354.
- (4) Kalicki, J. H.,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5, pp. 17-18.
- (5)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册，第495页。
- (6) 《尼克松1970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页。
- (7) 张静怡：“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因素：回顾与展望”，中华美国学会等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8页。
- (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 London, 1989, p. 26.
- (9) Ibid., p. 26.
- (10) Ibid., pp. 165-166.
- (11) 《北京日报》，1990年8月17日。

论九十年代美国对外 经济关系的新战略

肖 炼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美国经济和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引起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在战略上的调整。本文致力于探讨新形势下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战略，这正是世界经济界十分关心的问题。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长达40年之久的美苏军备竞赛，由于苏联经济的衰落而暂告结束；从全球范围讲，军事的因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正在下降，经济的因素正在上升。

“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早已为人们所忘却，并在经济实践中被人们所抛弃。以闭关自守和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经济模式，正在受到改革浪潮的冲击。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经济细胞——企业——的能量加强，使国家的力量下降或受到制约，使过去受政治制度和地理位置束缚的市场瞬间连成一个整体。那种凭借“应得的权力”和“制约的权力”〔1〕划分世界经济的做法，已不适应于世界潮流。

在整个世界重新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超越国家的障碍,正在走向集团化。面向21世纪,北美、欧洲和日本将形成自由贸易的“黄金三角形”。(2)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欧洲共同体为核心的欧洲统一市场,以及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将构成世界经济的新的三元框架。

在上述三元框架为主体的基础上,世界经济将形成多重立体结构的格局,详见下图。(图略)

从地区划分上看,北美、欧洲和亚太三足鼎立;从单国经济实力看,美、日、德可以抗衡;从三元经济结构的圆心看,各自都在巩固和扩充其势力范围和影响。譬如,在最近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欧洲想帮助东欧国家和苏联以扩大欧洲市场;日本打算首先援助中国以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美国则提出援助中南美洲国家的政策,把容易流向东欧国家和苏联的资金拉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上来,以谋求美国后院的政治稳定与市场重建。(3)另外,三元多重经济结构之间,时有交叉和耦合,当德国和法国打算援助苏联的时候,美国、英国和日本却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达成默契。随着三元经济结构重心的偏移,可能会产生新的组合。当重心倒向欧洲这一极时,美国可能会联合日本与欧洲抗衡;当重心倒向日本和亚太地区时,美国则可能利用欧洲来钳制日本;畏于美国的强大,日本和西德也可能携手与美分庭抗礼。

总而言之,这种三元多重立体结构从宏观上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笔者认为,起码在21世纪之前,这个格局不会有重大的变动。

二、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原因

1. 苏联经济的衰落。近年来,苏联经济的绝对实力和相对实力都在下降,从世界第二位下降到第七位,从而使它不再具有与美国争霸的物质基础。东欧变革步履艰难,体制转轨引起的经济混乱状况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组织正在解体,苏联的经济由自封闭的内向型逐步开放,在投资、货币、生产和流通等各个领域向国际化方向靠拢。不论苏联经济的发展前景如何,在21世纪之前,它都难以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

2. 对美国经济构成主要威胁之一,是以日本为轴心的、迅速崛起的亚太经济。美国的各主要企业都已相继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以日本企业为首的亚洲竞争者强有力的挑战,它们在钢铁、造船、机床、汽车、半导体和电视等传统工业方面领先于美国。为了赶超美国,日本正在制订新的工业发展战略,谋求通过发明而不是模仿来加速做好准备,它在微电子、光技术、超导和信息系统等6个“关键领域”保持和分享了世界领先地位,(4)这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89年,获得美国专利前四名的是4家日本公司。日本在美国专利中所占的比重从1975年的9%上升到1989年的21%,而同期内,美国的相应比重却从65%下降到47.5%。(5)亚洲四小龙采取雁阵式的发展战略,以“亚洲般的奇迹”打入美国市场。以日本为首的亚太地区正在变成一个广阔的市场,面对亚洲的挑战,美国的一些商业活动正在从东海岸转向西海岸。纽约在1990年失去了美国第一大港的地位,被洛杉矶取而代之。在美国5个重要的港口中,有4个位于太平洋海岸。上述经济态势不仅使美国人而且使欧洲人感到震惊。法国《费加罗杂志》载文道:美国现在已背向欧洲而面向亚洲,对欧洲来说只有也去占领亚洲市场同美国进行竞争而别无他途。它认为,不仅美国的未来在于亚洲,欧洲和全球的未来也在于亚洲。

3. 对美国经济的另一个主要威胁,是以欧洲共同体和两德统一为基石的新欧洲。随着美苏在欧洲的军事对抗逐步削弱,双方在欧洲的影响也大为减少。两德统一不仅影响欧洲大

陆内部的力量对比,而且产生了一个能与美国抗争的世界级经济强国。统一后的新欧洲将有力地在经济和政治上同美国竞争。它对美国的经济挑战可能超过日本。欧共体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合计共近5万亿美元,逼近美国的5.2万亿美元,仅此就使日本的2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形见绌。(6)欧共体国家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2.2%,与美国所占的26%相差不大,日本所占的比重则不到10%。据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汤姆·雷德本分析,80年代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日本和亚太四小龙不断增长的出口实力上。目前,美国同日本及亚太国家的贸易难题正在退居次要地位,华盛顿同它的一些欧洲盟国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欧洲对美更具有挑战性。由于欧洲人口和经济潜力都超过美国,统一后的新欧洲可能成为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同西欧在诸如对苏经济政策和农产品补贴等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已存在多年,这些分歧大都没有爆发,是因为西欧需要美国保护,免遭苏联的威胁。今后这些分歧可能突出。(7)

4. 美国和加拿大已经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将在1999年之前建立起一个共同市场。美加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度超过其他西方国家,两国75%以上的商品是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进行。此外,美国还同墨西哥加速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可以预言,美加墨共同市场的建成必将有利于美国应付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挑战。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也为美加墨共同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首先,苏联迫于国内经济问题对拉美地区的援助日趋减少,这就有利于恢复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其次,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冲突趋于缓解,一些拉美国家开始推行开放型市场经济政策,同美国进行贸易合作已成为可能;再次,日本和欧洲对美洲的渗透不如美国。美国联合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共同市场的经济实力,各项指标都超过日本和欧洲,见下表。

美加墨共同市场、欧洲共同市场和日本亚太市场实力对比*

	人口(亿)	国民生产总值(万亿美元)
美加墨共同市场	3.5	5.8
欧洲共同市场	3.2	4.8
日本亚太市场	1.8	4.0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推算。亚太市场主要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

由以上四点分析可以看出,以美国为轴心的北美自由经济区,以日本为轴心的亚太自由经济区和以共同市场为核心的欧洲自由经济区构成了90年代乃至21世纪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和态势。这种“金三角”之间以及“金三角”之外的运作、矛盾和协调,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在“金三角”中,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体都在不断调节它们各自与经济区内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美加经济协定和美墨自由贸易谈判在诸如投资环境、关税和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存在一些障碍,但它们在许多方面都达成谅解,有利于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岛国日本很难建立起像北美大陆那种面上的合作关系,它只能与其他国家建立起点线关系。面临增强的北美和欧洲,日本必须加深同亚洲四小龙的关系,强化亚太的雁阵式发展并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不断拓宽亚太各国的国内市场。欧洲在两德统一和共同市场、农产品补贴等问题上尽管意见分歧,但是,欧共体12国如果不通过相互取长补短,哪怕是与自己不喜欢的对手结为集团,单凭一国的实力不要说与美日抗争就是本国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然而,联合起来的欧洲,是世界上任何对手都不敢忽视的力量。经过多年协调,在金融、货币、关税、工农业产品销售等方面逐步走向统一的欧洲市场,将使美日望而生畏。从“金三角”的组织结构看,除欧共体外,北美共同市场和亚太市场比较松散,没有像欧共体那种正式的组织机构和章程。北美共同市场有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作基石,亚太市场中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协定,只是某些国家有这方面的意向。因此,在市场组织的约束力上欧共体优于北美市场,而北美市场则优于亚太市场。从对“金三角”的制约力来看,北美市场属于强弱组合型,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具有很强的制

约力。亚太市场属于强弱搭配不均型,在这个市场中既有实力很强的日本,又有实力居中上层的“四小龙”,既有中等水平的东盟,又有欠发达的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中许多对日本仍抱戒心。尽管日本增加了对亚洲市场的投资,由于该市场组织的松散性和经济实力的梯度层次,因而日本很难对亚太市场产生较强的制约力。欧洲市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在一个层次上,属于一种“诸侯称雄型”,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很难对其他国家产生制约作用,即使德国实力居上,也还不具有像美国那种在北美市场中的绝对优势。与前两个市场不同,欧共体的制约力主要来自欧共体组织机构本身的协调。从“金三角”的经济实力上看,尽管北美市场略占优势,但基本上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在“金三角”中,任何两个市场的组合都将对第三个市场构成致命的威胁,而且,每个市场都希望渗透到对方以增强自己的优势,避免被孤立。在对苏经济关系上,西德和法国占优势,在对中国的经济关系上日本和美国占优势。随着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削弱,美、日、中关系的作用在加强。此外,美国除了和日本在南美市场上进行争斗,还在非洲市场上与欧共体进行角逐。从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乃至宇宙太空都进行着一场激烈竞争。

三、美国经济是否正在衰落

目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90年代美国经济的兴衰不仅对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身,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对未来21世纪前的美国经济到底是兴还是衰的争论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衰落,它将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1.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0年代的50%下降到90年代的25%左右,这种下降趋势将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头号强国的地位被其他国家所取代。2.“孪生赤字”加快美国经济衰落的步伐,美国由债权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巨额赤字使美国丧失帮助解决世界问题的能力。3.支撑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高科技和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正在消失,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4.日本经济和西欧经济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衰落。日本声称,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日本将取代美国的地位。(8)两德统一后的德国经济使美国尤为担心,“在新的历史时代,美国的领导作用将会结束”。(9)与第一种观点针锋相对,第二种观点认为,90年代的美国经济不是衰落而是复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1.50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5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暂时产物”,这种不平衡状态是不正常的,消灭这种不平衡状态正是美国政策的目标之一,现在成功了,不应视为衰落。(10)2.“孪生赤字”是里根经济政策的暂时副作用,而不是美国经济的衰落造成的,另一方面应看到里根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即它将实现美国经济无通货膨胀的长期增长,因而这不仅不能说明美国经济的衰落,相反证明它的复兴。3.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高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创造了1/4以上的世界财富,尽管美国面临的实际挑战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沦为二流经济大国。(11)笔者以为,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世界经济的三元多重立体结构来观察美国经济,它们都有一定的偏颇。从“衰落论”的观点出发,它低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潜力,夸大了日本和欧共体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潜力。如果“衰落论”能成立,要么“金三角”的关系难以确立,要么“金三角”的重心向日或向欧偏移。从“复兴论”的观点出发,它夸大了美国经济的实力和经济潜力,低估了日本和欧共体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潜力,对美国经济存在的困难和缺陷估计不足,因而在处理与日本和欧共体两角的关系上可能处于被动地位。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影响90年代美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因素进行客观的分析。

高技术水平是直接影响美国经济实力和潜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许多高技术产品是美国

国首先开发的,但由于随着技术转移的扩大和加速,美国已在许多高技术产品方面不能长期保持领先地位。80年代日本在电子技术、机床、汽车、钢铁等产品市场中战胜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美国企业不灵活,不能很好地吸收和利用国外的成功生产经验和工艺,因而导致技术“单向转移”,有去无回。日本和欧洲通过购买美国的技术并加以吸收和消化,反过头来成为美国的强劲竞争者。过去美国人一直嘲笑日本人是模仿者,现在不同了,日本正在制订新的工业发展战略,变模仿为发明,它试图在从化学材料到超导等新技术领域中都取得突破,向美国提出挑战。据美国国防部研究报告透露,日本在微电子、光技术、超导和信息系统技术等6个“关键领域”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尽管欧洲在高技术领域与美日尚有一定差距,但目前欧洲的高技术正在突破国界的限制,发展成与美日竞争的集团一体化结构。上述情况是否能说明美国高科技的衰落呢?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美国仅在传统的高技术部门失去了优势,而在开发和掌握最新一代先进高技术方面的潜力的绝对指标几乎等于日本和西欧的总和。美国在诸如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激光技术、宇航技术、复合材料等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美国在科学家、设计师和基金装备率等方面超过日本;美国的纤维复合材料生产占世界的2/3,日本和欧洲仅占1/3;美国的纤维光学制品产量占资本主义国家产量的一半;美国在宇航技术和卫星设备的交易中90年代都将保持顺差,美国在世界计算机软件市场上的份额占3/5,欧共体占1/3,日本占1/5;美国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比工业实用开发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有利于美国在90年代保持科技的领先地位。(12)虽然日本和欧洲在高科技的某些部门已经超过或正在逼近美国,但是,它们要在决定科技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赶超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美国在吸引世界最优秀的科技人才方面也较日欧拥有很大优势,世界科技人才的流向是美国,而不是日本和欧洲。

联邦财政收支状况是反映美国经济的一项重要指标。80年代美国财政始终处于赤字状态,截止1989年底,财政赤字累计达2.8万多亿美元。(13)这使人们对美国经济的期望值降低。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其宏观经济政策有所改变,他一反总统竞选时的承诺,提出增税计划,通过征收各种销售税使1991年度的预算赤字达到格拉姆平衡预算法规定的1000亿美元的水平。从1990年的情况看,预算赤字为183.4亿美元,实际财政赤字测算为123.8亿美元,比预算数少59.7亿美元。最近,布什提出,在今后五年内把美国武装力量减少50%。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国防预算费用将削减20%(1990年为303.0亿美元)。如果上述数字能落实,美国财政赤字将减少60.0亿美元,大大超过格拉姆平衡预算法规定的指标。与美国的情况相反,日本和西德却提高了国防预算的支出,这是在分析美日德经济实力时不可忽略的问题。

国际收支差额反映美国对外经济实力,包括进出口贸易、劳务和转移;资本项目;特别提款权和官方储备。1982年以前美国的经常项目多为顺差,从1982年到1989年,美国经常项目连年逆差,累计达77.70亿美元。主要是外贸逆差引起的,尽管经常项目的其他项目有盈余,但抵补不了巨额外贸逆差。在美国外贸逆差中,对日本贸易逆差占40%左右,对欧洲贸易逆差占15%左右。布什政府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就消除美日贸易结构性障碍等问题与日方进行谈判。从1989年的贸易状况看,贸易赤字下降到1985年以来的最好水平(114.9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降为105.9亿美元,对日贸易也比前三年要低(49.3亿美元),对欧共体贸易第一次出现顺差(1.5亿美元)。总的来看,美国外贸赤字仍很沉重,但已呈现转机。

与经常项目不同,资本项目反映以货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在国际间的变动。70年代美国是资本净输出国,80年代后,这种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增长大大超过美国在国外投资的增长,累计外债近5000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外国在美投资占美国资产的5%,占美国政府债券的13%,占美国股票的7%,占美国土地的1%(1

4)。在美国投资最多的是英国和日本,其次是荷兰、加拿大和西德。美国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对美国作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无疑是一个挑战,但是否会引起美国的衰落?这要做具体分析,首先,虽然美国对外投资的增量部分少于外国,但是其存量部分仍遥遥领先,它在全球仍拥有几万亿美元的财产。相对存量部分而言,增量部分的减少还没有达到引起衰落的程度。其次,美国在资本输出方面的守势既反映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扩张力,也反映了美国投资环境优于其他地区,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再次,多吸引外资有利于吸收日本和西欧的先进管理经验,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利用外资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日本和欧洲的两倍。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外国投资者每年为大约300万人支付900亿美元的工资,而且比美国雇主支付给雇员的工资高20%左右。第四,虽然外债要付息而影响收益,但是较多的资本输入会相对压低利率,促进国内投资,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例如,洛克菲勒公司用日本三菱不动产公司的8.46亿美元更新陈旧的房产,换上电脑化的现代化设施。可见,美国对外国投资采取开放的政策,并没有危及其主权和实力,反而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如果拒外国投资于门外,倒可能引起停滞和衰退。

特别提款权和官方储备是衡量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重要内容。据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包括黄金,特别提款权、外汇在内的国际储备总额方面,美国比日本和西德有较大优势。美国的国际储备总额为1399亿美元,而日本和西德则分别有517亿美元和889亿美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虽有经常项目的逆差,但已存在转机;外债虽有弊有利,但总体上讲利大于弊;雄厚的国际储备有利于缓解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赤字。

总之,美国在90年代乃至21世纪仍将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在诸如总体经济实力、人口规模和质量、科技和教育水平、军事实力、与同盟国的协同机制、凝聚和感召力、地缘政治等方面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基础。美国经济由于绝对数值高、规模庞大而且多样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部门或地区走向衰退时,另一些新兴的部门却在增长,不能根据某些部门或某些因素的停滞或后退而断言美国整个经济的衰落。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日本、西欧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不过,美国虽然不可能像50年代那样主宰世界,但它在90年代的状况要好于70年代和80年代,因为冷战的结束将使美国能够腾出更多的财力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并且在世界经济的三元多重立体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新战略

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战略始终是为其谋求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服务的,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三元多重立体结构的形成,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战略必将做出新的调整。

鉴于“金三角”关系的形成,为了对付以日本为轴心的亚太市场和以欧共体为轴心的欧洲市场,美国必将加速美加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加快北美共同市场的形成。美国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第三产业等领域以跨国公司的方式加紧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渗透,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也不排除美国与加墨两国成立类似于欧共体那样的北美市场的正式组织机构,以加强本元(指美、加、墨共同市场)经济结构的凝聚力和北美市场的向心力,完善协同竞争机制、调节各国之间的矛盾,提高整体竞争力。

在加强本元经济结构的同时,美国将采取各种方式对“金三角”中的另外两角采取制衡措施。

针对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经济扩张,美国将采取如下对策:1.在贸易上采取较强硬的措施。布什政府已按照所谓超级301条款把日本列入不公平贸易伙伴的名单,要求日本取

消贸易保护主义,取消日本在对美国商品和劳务设置的重大结构性障碍;日本如若不消除这些障碍,不扩大进口,美将对日采取“管制性贸易”。2.防止军事上的依赖性。由于五角大楼从日购货,“挖空”了美国高技术基础,使日本在6个关键技术领先于美国。对此,美国可能采取一项双向技术转让政策,以减少对日本产品的依赖性。在某些影响未来科技发展的决定性高技术领域,限制对日技术转让。3.适当均摊责任。由于日本过去40年来一直在美国的防卫伞下免费搭车,以集中一切力量去占领世界市场。为制约日本的扩张,美国一方面要求日本扩大防务费用(从占国民收入比重的1%提高到3%),另一方面鼓励日本在解决第三世界债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4.对日本的直接对美投资,美国原则上表示欢迎,但美国密切注视这些投资的去向,尤其对高技术投资保持警惕。(15)协调国内各项政策,美国可能会修改税法、投资法和反托拉斯法,提高美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尤其是与日本公司竞争的能力。布什政府提出的削减资本所得税和制订“家庭储蓄计划”的建议,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步骤。例如,放宽现行的反托拉斯法,就是使美国公司在市场竞争的同时,能够在研究和开发领域合作,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从而有利于和日本的争夺。6.在日本炮制的亚太市场内部打入楔子,说服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说服亚洲四小龙,使它们了解日本的市场壁垒和结构性障碍对它们的危害与对美的危害同样多,以便共同协作,对日采取一致防范措施。(16)例如,美国正在与四小龙和东盟探讨实行自由贸易区的可能途径。

针对东欧变革、两德统一和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所引起的整个欧洲大陆的变化,美国政府提出所谓“新大西洋主义”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1.降低北约的军事机能,提高其政治机能。美国将从欧洲撤走全部军队,但并不退却到“美国堡垒”中去,美国控制欧洲的形式将有所改变。2.随着北约作用的下降,美国更加重视欧安会作为维持其在欧洲势力的一个工具。3.美国支持欧共体加速实现更加广泛的一体化,但反对欧共体对外设置堡垒和操纵贸易,排斥或限制美国的商品、劳务和投资。4.美国建议成立一个包括北美和欧洲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大西洋经济合作组织,以解决该地区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争端问题。美国对欧政策的目的在于,协调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变动所引起的美欧之间的矛盾,既要使新欧洲发挥重要作用,又要促进美国在新欧洲的经济利益;既要适应两德统一,又要使这种统一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最小;既要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继续实行“和平演变”,又要防止它们完全纳入欧洲势力范围,从而构成对美的战略威胁。

在“金三角”关系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日本还是在欧洲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美国经济构成最大的潜在威胁在哪里。如果从国家的角度看,重点在日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从地区的角度看,重点在欧洲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从三元多重立体结构看,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似乎是在充当该结构的“协调人”,它具有任何其他“角”所不具有的功能和作用。首先,美加墨共同市场是为对付日本和欧洲而建立的。其次,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凝聚力大于日本对亚太地区 and 德国对欧共体的凝聚力,北美共同市场也大于亚太和欧洲市场。再次,美国渗透其他两元经济结构的能力明显强于他国。譬如,美国可以挖日本的墙脚而在亚太市场联合四小龙或东盟,也可以同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来对付两德统一所构成的威胁。相反,日本和欧共体在拉加拿大和墨西哥来拆美国的台方面的能量却显得不足。第四,不论欧洲采取何种方式重新组合,谋求统一,除美国有可能参与外,日本和亚太国家都不可能在其重新组合范围之内;同样,不论亚太地区按哪种方式组成经济合作区,除美国有可能参加外,欧洲也不可能在该区发挥很大作用。第五,美国参与“金三角”之内竞争和参加“金三角”之外竞争的自由度也高于他国。在“金三角”关系之外,美国还有南美洲、非洲、苏联和中国等几张牌可打,(17)日本由于日苏关系的“冷战”状态,欧洲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它们都还缺乏美国那种左右世界经济的能力。举世关注的海湾危机就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日本和西欧对海湾石油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但美

国处理海湾伊科危机的能力和影响却大大超过日本和西欧。

单个日本和欧洲并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然而,日欧的联合对美国来说却是真正致命的。据日本《宝石》杂志报道,日本三菱集团与西德奔驰集团就业务进行经济合作的消息,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美国担心“日德同盟再度出现”将对美构成致命威胁。日德两大集团合作的目的,一是双方都想提高现有技术水平,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尤其是对美国处于优势地位;二是,德方想借此进入亚太市场,日方则借此进入欧共体及苏联东欧市场,双方均有利可图。三菱和奔驰集团的合作表明世界垄断强者联合的开始,由于日德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接近,如果这种合作扩大到各个领域,并构成战略威胁,那么,美国的优势将不复存在。面对这种态势,美国将采取何种对策,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1) 借用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语。

(2) 约翰·内斯比茨:《对九十年代的展望》,载《日本经济新闻》,1989年12月6日。

(3) 山田:《各国关注新势力圈,在经济援助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载《朝日新闻》,1990年7月12日。

(4) 特德·阿格雷:《军事实验室的“长期问题”影响美国技术领先》,载美国《研究与发展》月刊,1989年7月号。

(5) 《洛杉矶时报》,1990年6月10日。

(6) 道格拉斯·西伊:“重新塑造欧洲”,据新华社华盛顿1990年6月21日英文电。

(7) 同上。

(8) 日本《东洋经济》,1987年新年号。

(9)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0年7月15日。

(10) 周建平等主编:《调整与改革浪潮中的世界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11) 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7月20日英文电。

(12) P·丹尼叶罗夫:“美国在高技术领域拥有雄厚潜力”,苏联《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1990年第3期。

(13) U. S. Congress, *Economic Indicators*, May, 1990.

(14) 吉姆·鲍威尔:“谁拥有美国?这有什么关系”,载美国《世界箴言》,1990年6月号。

(15) 比尔·鲍威尔:“反击的五种办法——美国如何才能制止对日本的失败”,载美国《新闻周刊》,1989年10月9日。

(16) 新华社1990年4月13日英文电。

(17) 当然,中国不会同意作为美国“金三角”关系之外的“牌”来打。

论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王春法

美国一百余年的西部开发,是在一种比较“纯粹”的状态下进行的。它既不同于以能源开发为基础的苏联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开发,更有别于以国土整治和国土规划为目标的日本小区域综合开发,而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和国力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研究这个模式,对于丰富区域经济学和开发经济学理论,为中国西部的开发提供经验,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何谓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所谓模式,就是事物发展的典型形态。而区域经济开发模式,则是指在经济开发系统中,自然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物质技术系统的特定结合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待开发地区经济发展道路。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其一,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是通过物质技术系统而结合起来的,物质技术水平决定着二者的结合方式以及区域经济开发程度;其二,区域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是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区域开发的层次必须同发达地区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手段相适应。相对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同丰富的自然资源、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落后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发

展道路。美国的西部开发,有着同一般区域开发颇为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它具有十分可观的潜在开发效益以及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为它提供一定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外,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下进行的。随着印第安人的被驱逐和被消灭,西部成为一片真正的蛮荒之地。要开发这块经济荒地,不仅需要从东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需要引进大批具有拓荒精神的劳动者。因此,移民成为美国西部开发的决定性因素。大量的人口西移与西部开发相结合,成为美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有学者认为:“向西扩张既是土地的扩张也是人口的扩张。”(1)

不仅如此,美国西部开发的独特之处还在于: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的扩张。”(2)是一种初级开发。美国学者帕克逊也认为:“农村经济在整个西部都占优势,这甚至较合众国的其他地方更为显著。”(3)一般说来,近现代的大规模区域开发,必定要建立起包括农、工、商、金融、服务业等在内的综合性经济区。但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步较晚,初期发展又十分缓慢,工业化的东部不仅难以为西部开发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物质技术装备,甚至还出现了同西部待开发地区争劳力、争资金的特殊情况。因此,西部开发所建立的是一种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单一农业经济区,那里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农业为中心的。“是农民占领了整个大陆并将其投入生产;他们的需要产生了对工业、小镇、城市、金融和运输网的需求;他们的产品养活了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到1850年时,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85%”(4)。单一农业资源开发是美国西部开发的主导形式。

物质技术系统决定着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特殊结合方式,而资本主义工业化

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开发中的物质技术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部开发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着西部经济发展的道路。反过来，美国西部开发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也通过各种途径对后者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大规模区域开发同时进行，这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有人说：“导致美国农业生产和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开辟新的土地和广泛利用越来越复杂、有效的工具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5〕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美国西部开发模式，就是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促进美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这样一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意义就在于：（1）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开发；（2）它是一种初级开发，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单一农业资源的开发；（3）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完成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4）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起飞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特点

1. 以大规模人口迁移为基础

为了适应西部开发的需要，联邦政府实行了自由移民政策，鼓励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移居美国。从1820年到1890年，移居美国的外国移民总数达1500万以上。然而，美国之所以享有“移民之国”的美誉，不仅仅因为其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外国移民或移民后裔，而且还由于其人口的区际流动也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向西流动是早期定居以来美国成长的特征。”〔6〕据统计，1820年时美国全国人口总数为9638453人，到1840年增加到17069453人。“在这将近750万的人口增量中，有400万以上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州和领地上。”〔7〕20年中，西部人口增加了200%，而同期美国人口总数只增加80%，东部各州增加了60%。显然，人口的区际流动是西部地区人口迅速增加的直接原因。弗吉尼亚、南北卡罗莱纳等州的人口迁移率高达30%以上。

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使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迅速增加。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时，只有二三百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进入西部。但到该世纪末叶，西部地区人口已经达到222000人，约占全国总数的4%；1820年这比重上升到27%，1850年为45%，到1870年时增加为53%，首次超过东部；1910年更增加为59%。全国人口的这种重新分布，促使美国的人口中心由1790年时的巴尔的摩向西移动到1860年时的奇利科思南部，1880年移到辛辛那提，1910年时到达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从1790年到1910年，美国的人口中心总共向西移动了557英里，“大约每年向西移动4英里。”〔8〕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为社会基本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体，人口发展在受到经济发展制约的同时，也会促进或延缓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就美国西部开发而言，由于大量驱逐和消灭印第安人，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变成一块真正的经济荒地，人口迁移的基础作用尤为明显。千百万移民涌入西部，既为西部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者，促成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又为东部工业化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给全国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19世纪美国经济中心不断西移，就是这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

我们知道，现代美国是从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在很长时期内，美国的经济都局限于东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独立以后，美国政府废除了英王颁布的1763年条例，实行了一系列鼓励西部开发的特殊政策，促进了美国人口的区际流动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不断西移。由于迁居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

所以,经济中心的移动首先表现为美国农业生产中心不断西移。殖民地时期,大西洋沿岸地区农业生产力比较发达,中部殖民地素有“面包殖民地”之称。独立以后,东部的农业生产虽然仍有很大优势,但随着西部的迅速移民开发,东部的这种优势很快就被打破了。到19世纪头10年,从俄亥俄州到内布拉斯加州和衣阿华州东部地区已经成为美国著名的“粮猪地带”。匹兹堡、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和堪萨斯城等一批农牧产品贸易中心迅速兴起。以玉米生产为例,1839年时,美国两个最主要的玉米州是田纳西和肯塔基;1849年,俄亥俄的玉米产量跃居美国首位;到1860年时,伊利诺斯取代俄亥俄州成为主要玉米州。到1910年,仅衣阿华和伊利诺斯两州的玉米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1/4以上。如同玉米生产中心一样,小麦生产中心也有逐步西移的趋势。1834年,纽约、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是三个主要小麦州;到20世纪初年,小麦生产中心已经移动到南北达科塔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南部棉花生产中心向西移动的规模甚至更大。结果,到本世纪初年,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落基山区以东地区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玉米、小麦和棉花生产三大王国。同时,广阔的草原和大量玉米生产,也刺激了畜牧业的繁荣,从肯塔基、俄亥俄到密西西比草原、大草原,形成了“一个长达1000英里的牲畜牧养之弧。”(9)随着人口和农业生产中心的不断西移,制造业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而向西移动,以接近西部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在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1850年时,美国工业产品的80%以上是在大西洋沿岸各州生产的;到1890年,这个比重就下降到58%。1904年,西部各州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6.9%,基本上同东部平分秋色。从1850年到1890年,按产值计算的美国工业中心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向西移动到俄亥俄州的坎顿附近。短短40年中,向西移动了225英里。这是早期工业化各国中所仅见的。由于西部工业的巨大发展,到19世纪末叶,从密执安湖到密苏里一带“几乎不为人注意地从边疆地区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之一”。(10)

美国经济中心不断西移这一事实说明: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美国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步转到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西部经济活动的加强,又为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奠定了基础。大规模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的主旋律。同时,勿庸讳言,大规模人口迁移也是同美国政府掠夺、屠杀印第安人的殖民扩张政策紧密相连的。

2. 以交通运输业为先导

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交通运输业应该是二次产业巨大发展的产物。但是,由于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在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独立伊始,美国政府和人民就致力于交通运输事业的改良与发展,把西部开发置于一个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之上。从18世纪末叶兰卡斯特大道建筑开始,到19世纪末叶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止,美国的交通运输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铁路对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有人称“19世纪的美国内陆运输史基本上是一部铁路成功史。”(11)具体情况见下表:

美国铁路里程表(英里)

年代	里程	年代	里程
1830	23	1880	93300
1835	1098	1885	128300
1845	4633	1890	166700
1855	18374	1895	180000
1860	30626	1900	206700
1865	35100	1905	237900
1870	52900	1910	266200
1875	74100	1915	290300

资料来源:参见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第101页;Johathan Hughes:《美国经济史》,第284页。

应该承认,美国早期的铁路建筑基本上局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尤其是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各州,西部地区几乎没有铁路。但到19世纪60年代末叶,仅旧西北部拥有铁路里程就达到9514英里,“在80年代前半期,美国西部的复杂铁路网大体上完成了。”

(12) 据统计,1860年时,美国每万人拥有铁路里程为985英里;1870年则为1380英里;1880年增加到1858英里;1890年更达到2625英里的高峰。在许多地区,铁路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居民的实际需要。交通运输业的优先发展,对美国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影响:

首先,交通运输业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区域经济专业化必须以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为基础,这是一条普遍规律。美国西部开发初期,由于交通运输业不甚发达,地区专业化发展极为缓慢,农牧产品的商品化水平极为低下。美国学者菲特认为:“只要运输笨重的农产品是昂贵的,农业就得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状况。”(13) 西进移民为了适应运费结构,不得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畜牧业,把小麦酿成威士忌酒。因为牲畜可以赶到市场,而酒的附加价值比较高。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西部经济地区专业化的过程大大加速。有人认为,“大草原是在铁路相对运河已经取得明显技术优势时被占据的”(14)。到19世纪末叶时,美国西部生产的地区专业化格局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小麦、棉花、畜牧三大王国再加上落基山区的矿业帝国和大湖地区制造业带就构成了西部地区专业化的基本轮廓。所有这一切,没有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次,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以利于国内各地区之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1918年时,每桶面粉在辛辛那提只卖3.5美元,而在纽约则卖到8美元,其中运费占到4.5美元。高昂的运输费用,使“大片地区如同太阳和月亮那样处于隔绝状态”(15),从而限制了各地区之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性变化,其根本之点就在于大大降低了运输费用,把全国各地都置于商品经济网的笼罩之下。它既能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迅速运到东部和世界市场,又使东部工业化地区和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品迅速流入西部地区,从而扩大了国内各地区之间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联系。19世纪初期东部各州热衷于国内改良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掌握由于大量移民而在俄亥俄谷地产生的巨大市场。”(16) 据托马斯·贝里估计,1860年时,“农场主用与1820年时同样多的农产品可以换到两倍的制造业产品,这是运输费用降低的结果。”(17) 内战以后,随着全国性铁路网的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日趋完善。1890年,美国在166703英里营运铁路上运输了792亿吨/英里货物和120亿人/英里旅客。从1860年到1890年,“美国的铁路营运里程增加6倍,客运量增加8倍,货运量增加13倍以上。”(18) 有人估计,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美国的内部贸易量大约为对外贸易的20倍,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最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其他产业部门和社会提供廉价、迅速、可靠的运输服务;其二,自身消费其他产业部门的产品,从而刺激了它们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运河和铁路上的附加投资,即新的投资会成倍增值。”(19) 尤其是铁路,既需要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又需要消费铁、机械、木材和煤等其他工业产品,因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更大。以钢铁工业为例,1871年,美国钢产量的58%用于钢轨生产,1881年时高达87%。有人认为:“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铁路消费占钢产量份额在50—87%之间波动的事实说明:铁路市场对美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成长是必要的。”(20) 不仅如此,铁路事业的迅速发展还刺激了沿线地区的投资热。因为靠近铁路,不仅可以利用方便的运输设施得到原材料,而且可以迅速达到遥远的市场,节省巨额运费开支。所以,“连结东西部的每一条新运输线路都鼓舞了邻近地区的投资。”(21) 据估计,1876年时铁路投资将近

40亿美元,1920年则达到200亿美元以上。如果再加上邻近地区的投资,其总额想必更为可观。按照投资乘数原理,一美元的投资可以创造数美元的国民收入和产值,那么,这笔巨大投资对美国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不难看出了。

3. 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指向

鉴于铁路对19世纪下半期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把它称为美国19世纪下半期的主导产业。但是,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并不必然就是西部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产业指向。既然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的扩张,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牧业在西部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西部开发的主要产业指向显然应该是农牧业。

第一,就业结构。独立战争以后,成千上万的人不畏艰难、千里迢迢移入西部,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农场。美国政府宽大的土地政策以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进步等,又为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机会。因此,“一旦通往西部的道路打开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就变成了中西部和平原地区殖民农场主的主要来源。”(22)据统计,1850—1860年,美国人口总数增加了825.2万人,同期西部各州增加512.3万人,西部人口增加占美国人口增加数的62%以上。大量人口迁入西部,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吸引和原有习惯以及个人技能的限制,大多数从事农牧业。虽然南北战争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山区从事采矿业、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活动,但总的看来,所占比重不大。1847年,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79%,三年之后降到55%,1880年为51%,直到1910年仍占31%。这个比重,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可能更大。即使在以采矿业为主的落基山区和太平洋沿岸,也有大量人口由于采矿失败,转而从事农牧业。所以,无论从西部开发过程来说,还是从各地区的情况来看,农牧业都是西部地区提供就业机会最大的产业部门。

第二,投资水平。美国农民不仅是拓荒者,而且也是投资者。他们西进的目就是通过迁移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投资。据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本《移民指南》介绍,在伊利诺斯大草原的边缘建立一个稍为改进的农场,需要1000美元以上的费用。这还假定拓荒者是直接从政府手中购买土地。实际上,由于西部土地投机盛行,更多的拓荒者是从投机商或铁路公司手中购买土地的。有资料表明:在衣阿华中部,“单个农民以每英亩7美元的价格从铁路公司手中购买未经清理的土地。”(23)因此,“无论如何,获得土地将花去他们已有的大部或全部现金。”(24)并且,随着农业机械使用的日益普及以及距东部市场愈来愈远,建立农场所需费用也在不断增加,投资额也会越来越大。有学者认为:“在边疆地区,花费五到十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农场,其投资率必然非常高。”(25)这样,一方面是建立农场的费用不断上涨;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人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从事农牧业,人口西移的洪流同时也就是资本西移的洪流。同时,许多外国资本家垂涎于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额的利润率,也直接投资西部的畜牧业。“在80年代初期,牧牛人的利润率约为20—30%,结果是大量资本从东部和英格兰及苏格兰流入大平原,……在采金热中积累起财富的人们也往往转到畜牧王国来。”(26)到1882年,投资于畜牧业的美国资本高达3000万美元。装在移民口袋里带到西部的资本同东部工业化地区及外国的投资相结合,使农牧业成为西部地区投资水平最高的产业部门。民谚所谓“山姆大叔提供土地,西部居民提供养牛经验,东部人士供应资金”,(27)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第三,国民收入水平。美国是以农立国的现代国家,直到19世纪中叶,农业始终占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即使在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美国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后,农业在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仍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资金流动和人口流动结合在一起,使西部地区潜在的巨大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农牧产品的大量生产,

不仅可以为东部工业化地区提供充裕的原材料和食品,而且可以出口换取美国发展工业所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装备,平衡国际贸易逆差。1820年时,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出口总数的83%,半个世纪后仍然占到81%。据估计,“在内战以前,原棉收入直接占国家购买外国商品所需购买力的一半还多。”〔28〕如果再加上其他农产品,如食品、粮食、肉类等,其数字必定更为可观。这还是从全国国民收入的角度来讲的。若单从西部地区来看,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农牧业是西部地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见,无论从西部地区的人口就业构成来说,还是就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而言,农牧业都是西部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产业指向。它决定了西部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方向,从而最终决定了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基本特征。农牧业的这种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还可以在美国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看到它的影子。

4. 以增长焦点带动区域开发

所谓增长焦点,是国外经济学家在综合克里斯蒂勒的“中心位置”假说、佩洛克斯的“增长极”假说和弗里德曼恩的“空间发展阶段”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区位经济学概念,意指能促进相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心地区。其基本要点有二:增长焦点是一个分层结构。不同层次的增长焦点在产业构成、作用区域等方面迥异。最高层增长焦点称为增长极,中层增长焦点称为经济中心;其二,区域增长焦点的数目和位置取决于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条件,而其大小和功能则由区域需求和区域规模决定。〔29〕由于城市始终表现为区域的核心,主宰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所谓增长焦点就是规模不同、大小各异的大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

以增长焦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在长达100余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兴起了一大批层次不同的增长焦点。它们或者是由原来的边防要塞发展而来,如辛辛那提、文森斯等;或者是由原来的河港城市发展而来,如路易斯维尔、新奥尔良等;或者干脆由东部的投资者创建而成,新阿瑟恩、盐湖城等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作为增长焦点的中心城市中,既有像芝加哥那样的全国性中心城市,也有像堪萨斯、丹佛、圣路易斯、圣弗兰西斯科这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中心城市组成为不同层次区域服务的增长焦点分层结构,几乎覆盖了整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迁移、商品流动等都是通过这些城市进行的。鉴于此,美国学者韦德认为:“城镇是美国边疆的先锋。”〔30〕

增长焦点对美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既表现在增长焦点通过商品流、移民流、文化流、信息流的扩散对区域经济施加影响的扩散效应上,也表现在该区域通过与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经济活动趋向增长焦点的集聚效应上。一方面,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为增长焦点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大批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工业城市应运而生。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农牧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西部开发提供先进技术手段的农机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把地区专业化与城市专业化结合起来。例如,双生城和堪萨斯以面粉工业为中心;芝加哥和奥马哈以肉类包装工业为中心;克利夫兰、托莱多和底特律则是大湖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而作为俄亥俄河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的路易斯维尔,早在1821年时就由“大部分的印第安纳人、全部肯塔基人以及部分田纳西人、亚拉巴马人、伊利诺斯人和密苏里人向它供应干燥商品、杂货、五金器、大宗商品等。”〔31〕至于辛辛那提和芝加哥两城市,其机械制造业全国闻名。有人认为:“如果有一个大城市能最好地体现工业时代特点,那就是飞速发展的芝加哥。”〔32〕1860年时,芝加哥只是美国第八大城市,人口不过30万;到1900年则一跃而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人口逾200万。

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刺激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开发以新的方向和力量。早在19世纪30年代,辛辛那提已经是一个为100万以上人口服务的巨大中心

市场了。圣路易斯的服务范围则南到圣塔菲，北到加拿大，西到太平洋，号称“圣路易斯帝国”。芝加哥贸易局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中西部商品市场的组织起了很大作用。增长焦点和周围地区互相作用，彼此促进，给美国西部开发以深刻影响。用美国学者卡特·古德里奇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相互影响的累积过程在起作用——一种成倍加速的连锁反应提高了两个地区的经济活动水平。”〔33〕结果，到内战前夕，美国西部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全新的城乡经济关系出现了：“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和包装场供应原料并为它们的车间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中心城市则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以及为雄心勃勃的农场青年提供新机会来服务于周围地区。”〔34〕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既是西部开发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点。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是循着拓荒——农业发展——中心城市出现——工农业齐头并进——工业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进行的。

总之，以大规模移民为基础，以交通运输业为先导，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指向，以增长焦点带动区域开发，既适合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适合当时美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因而促成了西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到1910年时，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农场数目为459.6万个，占全国总数的72.2%；农场人口为2296.4万，占全国农场人口的66%；农场土地71471.3万英亩，占全国农场土地总面积的81.1%。

〔35〕西部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三、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综合性评价

1. 一个成功的开发模式

评价一个区域经济开发模式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准就是：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地区和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从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来看，它基本上达到了这些目的。在100余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不仅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美国的国民经济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以农立国的美国迅速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强国，究其根源，西部开发的巨大影响决不容忽视。西部开发“给经济以新的方向，赋予它以非同寻常的活力；有助于产生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兴旺的社会环境。没有边疆，国家经济进化的阶段将会不同。”〔36〕无疑，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西部开发完成了美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

19世纪前半期，美国领土扩张异常迅速。从1803年路易斯安娜购买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领土增加了2719987平方英里，达到3608672平方英里。美国政府开发西部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对这片土地的控制，使之同东部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上联为一体，即迅速地美国化。早在1785年土地条例中，联邦政府就规定了对西部土地矩形测量的方法；1787年，联邦政府又通过了“西北准州条例”，规定了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成立准州的程序。这两个条例，勾划出了西部地区美国化进程的概貌，“规定了母国同附属殖民地的关系。”〔37〕1803年俄亥俄授权法，接受俄亥俄为联邦的第一个新州，为西部地区成立新州树立了一个榜样。继俄亥俄之后加入合众国的31个新州中，有18个是在授权法的指导下进行的。1785和1787年法令，是指导西部地区政治制度美国化的基本原则，而西部开发则一步步地把这一原则予以实施。

政治制度一体化必须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西部开发伊始，东部沿海地区各州就十分注意加强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力促进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的迅速开发，也有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促进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表现为19世纪前半期美国国际贸易的巨大进步。由于运河的修筑和汽船的应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量迅速增加。据估计，19世纪30年代时，由内地进入费城的商品，

其价值总额达到4000万美元，包括粮食、棉花、食品等。同时，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制成品也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地区经济专业化的雏形开始形成。而铁路的发展和全国铁路网的完成，更使美国国内贸易格局根本改观，东西部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到19世纪末叶，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上形成了，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格局：东北部——大湖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带；南部成为最重要的产棉区；中西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帝国；而远西部的矿业则在美国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表明东西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总起来看，美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政治问题；后一个阶段是经济问题。”〔38〕这两个阶段互相影响、彼此促进，对美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可以说：“美国独立以来的第一个世纪是在边疆影响的支配下度过的。”〔39〕

（2）西部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既需要充裕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的供应，又需要有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由于美国是一个独立未久的新国家，尚无余力控制和掠夺现成的殖民地，因此，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料和市场等问题基本上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而自行解决的。西部开发，使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据统计，1853年时美国西部出口的99%的小麦、62%的面粉、63%的小麦都运到了东北部工业区。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使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进行工业生产。不仅如此，西部开发在某些方面甚至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以棉花为例，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先锋——棉纺织业——就是以棉花为直接原料的。19世纪中叶时，按产值排列居美国工业部门前五名的部门都是以农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如面粉、木材加工、屠宰和肉类罐头工业、棉纺织业等。它们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西部开发也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独立之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极其匮乏，使早期工业化进程显得缓慢而又艰难。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密西西比河两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地区。美国农产品不仅自给有余，而且可以大量出口换回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急需的先进机器设备。据统计，1853—1863年间，美国谷物年均出口总值高达51200万美元。与此同时，落基山区金银矿业的发展，也给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有力的资金支援。大量贵金属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加强了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使之有能力在1900年通过金本位条例，改金银复本位制为金本位制，把美国工业化置于坚实的金融制度基础之上。

西部开发对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最大作用，还表现在它为工业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美国西部开发，既是开发西部资源、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广度进军、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准备和开拓市场的过程。在交通运输革命的刺激下，西部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拓荒者穿着东部地区提供的服装，使着他们提供的生产工具，进行艰苦的拓荒活动。有学者说：“随着19世纪的进展，东部制造家的商品生产不断增加以适应西部和南部的需求。”〔40〕市场的扩大，对美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3）西部开发促成了美国近代农业革命。

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既包括打破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变革，也包括以农业技术革命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力变革。在这几方面，西部开发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给北美殖民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残余以毁灭性打击，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远未建立起来并得到充分发展。正是由于农民争取西部土地的斗争，才迫使联邦政府逐步放弃靠出售土地弥补财政收入的政策，转而扶植小农经济的发展，加速西部的移民垦殖，使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

条独特的“美国式道路”。也正是由于在西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刺激了农业科研工作的深入，促使美国农业科学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不仅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居世界前列，而且其农业科学化水平也是举世无双的。从木犁到拖拉机，从镰刀到收割机，从单纯利用土壤自然肥力到施用化学肥料……大量新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到农业中去。有人认为：“农业机械化进程，始于19世纪30年代，在50年代大量传播，在1860—1897年间持续并加速进行。”〔41〕

农业生产关系的革命，农业机械化与科学化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按1910—1914年美元计算，每个农场工人产值在1870年时只有326美元，1880年为439美元，1900年为526美元。从1866年到1900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4倍，玉米增加3.5倍，大麦增加6.5倍，棉花增产将近5倍，农场牲畜数目在1867—1900年间翻了一番，生猪数目增加50%。半个世纪中，中北部和中南部的农业用地扩大了4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应用新式农业机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促成美国近代农业革命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没有西部开发，就没有美国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从而也就无所谓美国近代农业革命。

（4）西部开发培育了美国人民的拓荒精神。

毫无疑问，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是块宝地，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潜在开发价值十分可观；同时那里也是一块十分荒凉、尚未接触现代文明的经济荒地。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不但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而且也缺乏正常的社交生活和文化生活。所以，西部开发既充满着艰难困苦，又枯燥乏味。在这种情况下，要在“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听不到任何声音”的西部荒野上生存并发展，没有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持是不可能的。长期而艰苦的拓荒生活，磨炼了人们的意志，养成了人们乐观进取，勇于创新、讲求实际的精神。这就是“拓荒精神”。“拓荒精神”是在长达100多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创业精神”。是西部开发培育了美国人民的“拓荒精神”。

必须注意，“拓荒精神”的形成，与美国西部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民族构成关系十分密切。据统计，1870年时，美国中北部共有12981000人，其中男性人数为6705000人，15—44岁者5872000人，占人口总数的45%以上。〔42〕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进取，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掌握新技能，迅速投入到开发的洪流中去。同时，西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能够把各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和智慧集中到一起，在新的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美利坚民族独有的民族心理，从而孕育了“拓荒精神”的最初胚芽。可以说，“拓荒精神”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体现，它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拓荒精神”，西部开发就有可能被大大延缓。

2. 事物的另一方面

历史事物向来都是利弊同在，得失并存的。美国西部开发模式也不例外。我们称它为成功的开发模式，并不否认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在事件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国西部开发时，它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消极影响正在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

（1）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看，区域开发具有两重性：一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另一重是适应和打破原有生态平衡，建立新的生态平衡的生态改造过程。这两方面又通过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统一于区域经济开发过程。生态环境破坏是区域开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采取措施把这种生态破坏降低到最小程度，并在尽可能快的情况下重建新的生态平衡。然而，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和联邦政府的漠不关心，生态环境破坏不仅规模大，持续时间也长，使森林资源、土壤资源、生物资源等遭到空前的浩劫。以森林为例：欧洲殖民者刚到美洲时，在20亿英亩的土地中，有将近一半地面上覆盖着森林，38%是高草草原，11%是灌木和旱地

植物，只有2.5%是沙漠。从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河，森林是主要植被。但到本世纪前半叶，美国森林总面积只有4.3亿英亩了。除人工林外，“保留下来的原始森林不到原有面积的1/10。”〔43〕在威斯康星州，森林曾覆盖了该州2/3的地区。1899年时该州有1033家锯木场，年伐木量3.4亿英尺；到1932年时只剩下113家伐木场，年伐木量为1420万英尺，不到1899年的1%，清理农业用地和木材工业是森林毁灭的两个主要因素。据估计，1910—1920年，棉花带的25000万英亩松柏以每年500万—1000万英亩的速度被毁灭着。〔44〕森林的毁灭，对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森林毁灭同时发生的是土壤的破坏和动物的消失。由于西进移民购买土地的资金大部分是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向银行借贷的，高额利息率迫使他们采取掠夺式经营方式，以便尽快取得收益，还本付息。“从迅速盈利的观点看，竭尽地力是最便宜和最快的农业方式。”〔45〕这样，土壤肥力就成了银行高额利息率的牺牲品。在许多地方，土地往往连续耕种20年而不施加任何有机肥料，并且只种植一种农作物。F·D·罗斯福总统时进行的全国土壤调查表明，全国7亿余公顷耕地中，60%的土地丧失了1/4以上的土被。在棉花带，甚至“在1850年以前，一些县已经有2/3的土地肥力耗竭了”。〔46〕就动物而言，曾经广泛分布在美国2/3以上地区的野牛也在19世纪80年代灭绝了。当时美国有一首民谣，生动地描绘了西进移民的生态破坏过程：

这是一种最好的动物，
让我们杀了它；
这是一棵巨大的树木，
让我们砍倒它；
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
让我们耕种它。〔47〕

严重的生态破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1934年春天，从包括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西部、科罗拉多东部的盆地吹起一阵尘暴，席卷美国2/3的地区，一直刮到大西洋。一天之内，3亿多吨肥沃的表土离开了大平原，900万英亩良田完全破坏，受害严重的土地将近8000万英亩。自此以后，尘暴频仍，给美国经济、尤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可以说：“从广义的美学和生态学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对环境的巨大的、对有些地方来说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代价而取得的。”〔48〕有学者甚至认为：“人们带给美洲的决不是绿叶和清水，而是恶臭的河流、烧焦的森林、无比肮脏的城市。”〔49〕对此，美国资产阶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大量的土地投机。

土地投机始终是19世纪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人称之为“一个国家的耻辱”，“是一种国家病”。究其原因，土地政策的不尽完善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其一，某些土地法令的自身不完善。例如在1785年第一个土地法令中，规定最小购买单位为640英亩，按每英亩一美元的价格以现金支付，多购不限。由于进入边疆的拓荒者大都十分贫困，无力支付640美元的高额地价。同时按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农民每年至多只能耕种40英亩，这就给某些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他们组织合伙公司，大量购买土地，然后分成小块出售给拓荒者，从中赚取大量利润。该法令通过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购买，是在联邦政府与由新英格兰退伍军人组成的俄亥俄同僚公司之间进行的。1787年，该公司以贬值的政府纸币作为支付手段，从莫斯金贡河一带购买了150余万英亩的土地。同年西奥托公司购买了500余万英亩的土地；西姆斯公司购买了大小迈阿密河之间的土地。在他们的刺激下，“上至国父华盛顿，下至最小的拓荒者，每个人都投身于土地的狂热之中。”〔50〕

其二，土地法令不能保证前后衔接一致。由于土地法令前后衔接不紧密，大批土地投机家趁机抢占肥沃土地，然后转手倒卖，获取巨利。在一个时期内，宅地者甚至可以根据各种土地法令取得1120英亩土地。其中，按宅地法取得160英亩；按优先购买法取得160英亩；按木材与砾石法取得160英亩；按荒芜土地法取得640英亩。1120英亩土地显然大大超过家庭垦殖能力，成为滋生土地投机的肥沃土壤。

土地政策不尽完善，再加上某些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使美国西部公共土地上的投机活动达到空前的规模。在1854—1857年时，用于土地投 亾 渌 本达到8亿美元之多。仅在1849—1857年，伊利诺斯州转入投机者手中的土地即达1000万英亩。南北战争后，土地投机活动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联邦政府土地管理处的官员在谈到内布拉斯加西部执行植树法令的情况时说：“土地登记的绝大多数是用于投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植树。……在登记了无数植树地的广大地区看不见一棵树。登记的植树地中，恐怕只有1%老老实实种上了树。”〔51〕

大量的土地投机，给美国西部的开发以深刻影响。“没有土地投机者，美国的边疆是难以想像的。”〔52〕土地投机给美国领土扩张以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又大大歪曲了土地政策的本意，延缓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的开发。由于土地投机猖獗，有人甚至认为：“美国没有真正的土地政策……土地之易于获得不仅导致了投机和垄断，而且导致了彻头彻尾的诈骗。在那里，苦难的拓荒者仅仅是个木偶，由于商业利润为了获得公共土地而树在那里。”〔53〕土地投机是美国西部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3）对少数民族经济的摧残。

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的真正主人。他们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和独特的宗教文化与民族习惯。他们最早培育的玉米和烟草对人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美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残酷屠杀印第安人并毁灭其民族经济的政策。在“印第安人必须滚蛋”、“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的口号下，以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无数次讨伐，印第安人人数迅速减少。据1837年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报告，当时美国只剩下332498名印第安人，其中成为各州公民的有12415人；按条约西迁的有36950人；居住在西部的印第安移民有31327人；西部土著部落有231806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上进行的。

然而，屠杀印第安人不过是手段，而掠夺其土地才是真正的目的。据统计，从1784年到1890年，印第安人割让土地的事件约有720起，总数达300多万平方英里。其中仅杰克逊总统任期内，就签订印第安条约94项，割让土地数百万英亩。到1871年，联邦政府宣布不再把印第安人视作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不再同它签订条约。其时，印第安人只剩下20余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即使这一点土地，也屡遭殖民者蚕食。1881年时为155632312英亩；1900年为78372185英亩；1911年为71646796英亩；到1933年只剩下52651393英亩，不到1881年数目的33.8%〔54〕。1887年，联邦政府通过道斯法令，规定废除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每户家长可得到160英亩土地；单身成年人或孤儿40英亩；儿童20英亩，由联邦政府托管25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夺。因为这种土地所有权“不是一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55〕托管期满后，若某印第安人被视为不能合格地取得最终权限，托管期可以延长。即使印第安人取得了所有权，也会很快丧失。1933年时，全国32.5万名印第安人中，有10万人完全没有土地，另外10万只有小块贫瘠土地。至此，印第安人的民族经济被彻底摧毁了。

尽管美国西部开发有种种弊端，但是，瑕不掩瑜。它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区域初级开发的典范，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其他国家落后地区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这里，文过饰非和将功折过的评价方法都是简单粗暴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注释：

(1) (4) (17) (22) (25) (28) Johathan Hughes,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斯科特·格莱武出版社, 1983年版, 第105、194、206、195、207、202页。

(2) 福克纳:《美国经济史》, 卷上,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第255页。

(3) (6) (7) (12) (16) (37) (38) (39) Frederic L. Paxson, *History of American Frontier*, 麻萨诸塞, 1924年版, 第113、186、287、548、259、564、367、573页。

(5) (24) (41) (50) (52) Willard W. Cochrane,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明尼苏达, 1979年版, 第11、51、89、54、183页。

(8) (27) (51) 拉尔夫·亨·布朗:《美国历史地理》, 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第275、286、331页。

(9) (43) (49) (53) Stuart Chase, *Kich Land, poor land*, 纽约, 1936年版, 第102、40、47、231页。

(10) (26) (45) (55) Frederick Merk, *History of Westward Movement*, 纽约, 1978年版, 第447、463、549、425页。

(11) (18) Glenn Porter,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纽约, 1980年版, 第316、314页。

(13) (19) (33) (48) 吉尔伯特·C·菲特等:《美国经济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231、285、279、584页。

(14) (15) (20) (21) (36) Jack Blicksilver, *Views on U. S.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亚特兰大, 1985年版, 第195、192、200、37、35页。

(23) (44) (46) (47) Smith J. Russell, *North America: The People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the continent as an agricultur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rea*, 纽约, 1985年版, 第307、267、253、26页。

(20) 余永定:“地区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学”, 载《改革与战略》, 1985年第6期。

(30) (31) (32) (34) Alexander B. Callow, *American urban History*, 纽约, 1982年版, 第68、71、104、80页。

(35) (42) United States of the Bureau Census, *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 1976年版, 第458—460、22—23页。

(40) Gavy M. Walto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纽约, 1983年版, 第237页。

(54) J. T.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 农业出版社, 1981年版, 第230页。

1945 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

——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陶文钊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和以此为蓝本于8月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它们是在大战末期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达成的。研究这两个文件，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至为重要。

协定后来在美国受到许多亲蒋反共人士的严厉批评。曾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Patrick Hurley）1951年在国会作证时说：协定“绘出了共产党征服中国的蓝图”，曾任驻苏、驻法大使的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称：“这是一位美国总统所签署的最无必要、最丢人和最具潜在灾难的文件”，是罗斯福在“病魔缠身，心力交瘁”，以致“常常难于形成自己思想”时犯的错误的。（1）国民党人后来也指责协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性的错误”。（2）有的历史学家也说，协定是“罗斯福在雅尔塔犯的最大的错误”，（3）要不是罗斯福“累得要命，而且急于要避免更多的争辩，他不致于同意作出那个最后的坚定的许诺”。（4）事过45年之后我们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便会看到事情并不如这些批评家说的那样。与斯大林达成这个协定是罗斯福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协定的酝酿由来已久。

1941年4月，苏联为了在一旦遭到德国入侵时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避免腹背受敌，与日本签订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彼此承诺互不侵犯对方领土，在对方陷入战争时保持中立。但斯大林却在1941年12月对蒋介石、1942年8月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12月对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1943年10月对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一再表示，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5）在1943年12月举行的美、苏、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罗斯福当面表示，一旦德国打败，他就准备把他在西伯利亚的兵力增加两倍，并在最后打败日本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6）1944年10月，斯大林更明确地向哈里曼保证，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二三个月后对日本发起进攻。（7）而且实际上，从1944年初起，苏联已经开始秘密地把租借物资运送到远东，部署在中苏边境。

斯大林的上述提议自然受到美国欢迎。1944年7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进攻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的计划。在9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两国参谋长的估计，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欧战结束后的18个月。参谋长们还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可能使美军遭到100万人的伤亡。（8）美国军方对关东军特别担心。他们认为这是一支独立的、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再加上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在日本本土被盟军占领以后，关东军仍可以负隅顽抗一段时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西太平洋战场美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都希望苏联尽早参战，在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预定1945年11月1日在九州登陆）至少三个月之前参战，把日本陆军的主力钳制、

消灭在亚洲大陆，以大大减少美军伤亡。就在雅尔塔会议前夕，1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向总统表示，“俄国尽早参战并根据其能力发起进攻性战役，对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9〕由此可见，在军事方面，美国有求于苏联。

在政治方面，情况也是这样。

第一，罗斯福认为，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10〕既然如此，美国的目标便是力求缩小别国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长期以来是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经过战争，别国的势力不是被摧毁了就是削弱了，而美国则通过提供财政、物资、军事援助同国民党政权建立了特殊关系。美国认为，国民政府也这样表示，中国战后的重建离不开美国，因此美国既需要、也可能把中国保持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在这方面，美国担心的正是苏联。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苏军不但要在东北，而且要在关内作战，“要取得真正的成果，还必须有侧翼包围——进攻张家口和北京，否则只在满洲进攻就不能产生重要成果。”〔11〕当哈里曼把斯大林的上述打算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担心地问：“如果俄国人进去了，他们还肯出来吗？”〔12〕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告诉他的亲信，除非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范围广泛的协议，否则苏联会在欧洲和中国的若干部分横行，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13〕美国要把苏军的军事行动，把苏联的势力限制在关外。

第二，大战末期，罗斯福固然考虑到战后可能与战争中的盟国发生麻烦，产生争端，但他基本上是以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设想来勾画战后世界蓝图的。苏联和中国是在亚洲起重要作用的两个大国，美国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远东和平的基石”。〔14〕但抗战后期的中苏关系却使罗斯福感到不安。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新疆地方当局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利用新疆人民对盛世才恐怖统治的强烈不满，从各方面支持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甚至直接出兵参战。国民党对此极为恼火。1944年3月17日，蒋介石向罗斯福告状，认为这种事态“严重影响远东作战”。罗斯福4月8日复信说：“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联合作战之行动或态度，均非所宜，凭善意与自制，则联合国分子中发生之误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他要求蒋介石“表现现实政治风范……冻结最近事件，直至战争结束”。〔15〕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访华。他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中苏关系，并称：“任何可能导致中苏两国冲突的问题都不应悬而未决”，美国“十分愿意”在两国间“进行斡旋”。〔16〕总之，罗斯福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而不给美国战后亚洲蓝图的实现造成妨碍。

第三，美国一直关注着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担心战后中国爆发内战。罗斯福希望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使战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亲美的国家，并于1944年9月派了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冲突。美国的这一政策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美国密切注视着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早在1944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John Davis）就估计，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华北和东北“有可能变成俄国的卫星国”。〔17〕哈里曼在12月警告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前中苏两国政府间没有达成一种安排，“苏联将支持北方的共产党人，并把红军解放的中国领土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他们”。〔18〕9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访问美国时，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也对顾强调了苏联充当中共后盾、并支持他们深入东北的可能。〔19〕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对华政策就难以实行。雅尔塔会议前夕，国务院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要争取苏联对中国最大限度的联合的支持”，“应当敦促苏联运用其对中共的影响促使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定。”〔20〕

总之，美国既需要苏联军事上的支持，又要限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战后亚洲既需要苏联的合作，又要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美苏之间和中苏之间达成事先的安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求于苏联，苏联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早在1943年12月，斯大林就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向罗斯福表示，他对远东有一些要求。他含混

地说,大连应当成为国际自由港,苏联西伯利亚的输出入贸易应能通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由大连港进行。(21) 1944年12月,斯大林则更明确地向哈里曼提出,要求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还苏联,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同时,他保证苏联不干涉中国对东北的主权。(22) 正因为罗斯福早已知道苏联的条件,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当2月8日斯大林在与罗斯福的单独秘密会谈中提出这些要求时,双方很快就协定大致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罗斯福并没有要求斯大林就在中国内争中支持国民党作出明确保证,但斯大林显然已经猜透了对方的心思,主动表示,为了建设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当担任领导”。(23) 此后两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哈里曼进行磋商,拟订了协定草案。文本再经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并征得丘吉尔同意,遂于2月11日由三巨头签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三国领导人同意,苏联在欧战结束二至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

1. 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 恢复1904年日本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

(1) 库页岛南部及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2) 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3) 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管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苏联在该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帮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下解放出来。(24)

协定还规定,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苏联的条件。罗斯福之所以敢承担这一义务,是因为他早已了解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担心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意图,担心苏联支持中共。当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要求蒋介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时,蒋表示,只要苏联同意尊重东北的边界,他就接受罗斯福的建议。(25) 为了防范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国民政府早在1944年春就着手拟订计划,以便在苏军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作战时,切断苏军与中共武装之间的联系。(26) 尽管1944年6月斯大林在同哈里曼的谈话中、9月莫洛托夫在同赫尔利的谈话中都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称蒋介石是中国最佳的领导人选,蒋也从华莱士和赫尔利那里获悉了这一表态,他仍然“急于证实”苏联领导人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这是苏联确定无疑的对华政策,为此,他不惜作出外交上的让步。正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赫尔利于2月4日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考虑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谈。(27)

协定签订后,苏联大大加强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在苏军发起对日进攻前,已经在远东集结了150万人的军队,2.9万门大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28)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协定对于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美、苏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把中国利益私相授受,这就足以证明,名义上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在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往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协定既是美苏两国在远东实现了某种均势的表现,又是为了维护这种均势而缔结的,是两国在划分势力范围上的一次妥协与合作。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恢复了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建立起了沿蒙古到我国东北、直至远东海上的安全带,得以有效阻止美国向临近苏联边境的远东地区的渗透;美国通过确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同时,换取苏联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并实际上承诺苏联势力不向

关内扩张,也就是承认中国的绝大部分为美国势力范围。协定就是这样一个美苏在远东互相争夺和互相限制的产物。

二

国民政府对三大国的雅尔塔会晤自然是十分关心的。但罗斯福与斯大林约定,协定暂向中国保密,因此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得不到关于协定的准确消息。当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讨论情况时,罗斯福只是说,斯大林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作了更明确的表示,并提了三点。但他没有原原本本端出斯大林的要求,而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说,维持外蒙现状,主权仍属中国;南满铁路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只要求业务管理权;苏联希望得到一不冻港,但这是将来的事,无须太急。对于协定罗斯福更是讳莫如深。(29)

罗斯福去世后,赫尔利曾经催促美国政府及早把协定正式通知国民政府。(30)但杜鲁门和国务院都认为时机未到。他们认为会议以后苏联对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政策违反了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因此对苏联的远东政策也产生了怀疑。

5月下旬,杜鲁门派先总统的亲信顾问、病体未愈的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一则是为了表示,他继续奉行罗斯福的政策,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就广泛的国际问题摸苏联的底。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表示,苏联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它对中国(包括东北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一旦红军开进东北,他将主动请中国政府指派代表,组织地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还说,他对中国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在中国领导人中是最好的,并将承当起统一中国的责任,他不认为中共领导人有蒋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他进而表示,国共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与苏联无关。他还提到,战后苏联将自顾不暇,英国亦将忙于别处的事情,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资本和人才、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斯大林希望宋子文7月1日前往苏联谈判,并称,如果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条件,红军将于8月参加对日作战。(31)

斯大林所重申的苏联对华政策使杜鲁门感到放心和满意。6月9日,他指示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Grew)致电赫尔利;电文前半部分转述了斯大林与霍普金斯的会谈情况,后半部分是协定条款;他要赫尔利在6月15日正式将协定与苏联承担的义务作为他建议的中苏条约纲要通知蒋介石,并竭力取得后者的同意。他强调说,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并支持苏联的要求,他本人支持这个协定。(32)

这样,美苏两国就把协定这个既成事实强加给了中国。对于两大国的联合意旨国民政府是不可能违抗的,但蒋介石希望增强他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地位,竭力想拉美国参加中苏谈判,并以一项多边条约来代替中苏双边条约。他提出,美国如有共同使用旅顺口的意向,中国可以使之成为四强共用的军港。这一建议显然不符合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谅解,并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化,于是美国表示无意共用旅顺港,不便参与中苏条约谈判。(33)美国这时只想让中国去落实协定,而不愿再生枝节。

6月30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苏大使傅秉常抵达莫斯科,中苏条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自6月30日至7月12日,会谈6次;第二段,8月7日至14日,会谈4次。苏方参加谈判的有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等。

在头两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确认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在与霍普金斯谈话中所表示的对华政策立场,并说,中国应当容纳自由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但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宋子文说,如果搞联合政府,一党退出,政府便将倾倒,因此国民党不愿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说:“此为国民党正当之愿

望”。(34)

在讨论苏联的具体要求时,双方在外蒙问题上相持不下。中方认为,允许外蒙独立,则有损中国领土完整。苏方坚持说,从战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对苏联远东领土的安全至为重要,如果有一个军事力量(斯大林承认他指的是美国)从外蒙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苏联就完了。(35)显然,苏联是要把外蒙作为保卫西伯利亚的屏障。

美国政府虽没有介入谈判,但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宋子文每天都向哈里曼通报谈判情况,哈里曼又及时向总统和国务院报告。当谈判在外蒙问题上出现僵局后,宋子文于3日会晤哈里曼,询问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维持外蒙现状这一条作何解释,美国政府如今又作何解释。次日,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回电说,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这一条没有进行讨论,这一条的字面意思是:外蒙古现在的实际状况和法律状况应予维持。他特别指出,美国政府不能对协定文本进行解释,哈里曼可能向宋子文提供的情况是非正式的,不能用于同斯大林的讨论。(36)哈里曼随即把国务卿的回电通知宋子文,并敦促他与苏联达成协定。

贝尔纳斯在这里对“维持外蒙现状”的解释仍然是笼统的、含混的,而不是具体的、明确的。他电报中一段哈里曼不得外传的说明倒是道出了个中道理。他说:“据我们理解,现状是指,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但实际上这一主权没有实施。依据1922年的《九国公约》,美国政府审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表示,即认为如同外蒙古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1)外蒙古的法律状况和实际状况是矛盾的,可见贝尔纳斯自己说的两种状况都要维持只是搪塞中国的遁词;(2)既然雅尔塔协定上白纸黑字写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字样,这就表明美国实际已经承认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3)美国明知这样做是违背《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规定的,因此总感到心虚,为了保全面子,不愿把事情点破说穿,因此总是含糊其词,使人不得要领;(4)美国还担心,外蒙古的事情可能在别的边远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可能影响当时正在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疆。贝尔纳斯的这段话确也道出了美国的苦衷。

整个谈判期间,蒋介石对宋子文进行遥控。接到宋子文7月3日关于如何打开外蒙古问题僵局的请示电后,蒋介石及其阁僚绞尽脑汁,然后于6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可以承认外蒙古在战后独立,条件是:(1)苏联完全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即旅顺军港由中苏共用,但行政管理权归中国;大连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属中国;中东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但属中国所有、归中国管理;(2)苏联承诺不给中共以任何支持;(3)恢复中国对新疆各地的主权,苏联不再支持新疆的革命活动。(37)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宋子文立即找哈里曼征询意见。哈里曼说,蒋的有些要求是不现实的,如果蒋真愿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则该港应由苏联管理和防卫;对于大连,中国只宜争行政权,码头仓库可由中苏共同管理;对于铁路,中国宜争所有权,而应准苏联参加管理。哈里曼分析谈判成败的利弊得失说,如果中苏现在不达成协议,则苏联进兵东北,将无所约束,对中国更加不利;如果两国达成协议,则苏联“将帮助国府,统一中国”。(38)但哈里曼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当他向国务院汇报这次谈话后,国务院没有给予纠正或作出新的指示,可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

7月9日的会谈打破了外蒙问题上的僵局。斯大林同意了蒋介石上述6日电报中提出的后两条要求,也原则同意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但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上仍然基本坚持原先要求:铁路归苏联所有,两国共管,苏联经营;大连应划入旅顺租借地(但不用租借名义)军事区域之内,由中苏共同控制。他只是答应把原先要求的关于铁路和港口的协定期限从40年减为30年,并作了其他一些小的让步。7月11、13日的会谈也未能根本消除双方的分歧。(39)由于斯大林、莫洛托夫要在14日启程去参加波茨坦会议,谈判告一段落。

宋子文一行于14日回重庆。

国民政府在中苏第一阶段谈判中虽未能得到美国支持,但它在大战中已经习惯于依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而且认定美国不会作壁上观,因此仍然指望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取得美国的同情和支持。7月19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说,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已经超过了协定的要求,也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舆论能够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迄今所采取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现实的要求。(40)

关于美国应当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也来自美国政府内部。哈里曼虽曾不断劝宋子文作出让步,但他认为斯大林的要求也确实过分了。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到达巴贝尔斯贝格(柏林郊区,美国代表团驻地)后,于7月18、28、31日三次给国务卿写备忘录,详细介绍中苏谈判的情况,指出,中方在谈判中的让步已经完全履行了协定的要求,苏方的条件超过了协定的规定,而中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是无法抵制苏联的过分要求的。他认为,既然协定已经使美国介入了中苏谈判,美国理应就双方仍有分歧意见的协定条款作出解释,不然,“宋子文将被迫作出违反我们基本的对华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让步”。他要求苏联保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为此草拟了《议定书》。(41) 国务院官员杜曼(Eugene Dooman)和中国科科长范宣德(John Vincent)在7月17、19、23日四次给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写备忘录,表达了与哈里曼相同的意见,建议总统和国务卿借波茨坦会议的机会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面谈中苏谈判之事,必要时把宋子文请来一起参加讨论。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于15、16日分别敦促总统和国务卿说,一定要确信,不能因为苏联控制了铁路而使美国在东北的贸易受到障碍。(42)

波茨坦会议前夕,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得知这个消息后,杜鲁门询问马歇尔,在太平洋战场是否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马歇尔没有正面作答。他的意见是,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不再需要依仗苏联帮助来征服日本,但有这种帮助将使胜利来得快些,美军伤亡少些;再说,反正苏联会取得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因此请苏联参战仍是可取的。(43) 这就是说,苏联的参战对美国来说不再像5个多月前那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如此,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而斯大林则首先说起此事。在三国首脑7月17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首先重申了他在雅尔塔作出的对日作战的保证,并说,苏联将在8月中旬作好准备。接着,他介绍了中苏谈判的情况,并且抱怨说,中国人的毛病在于“不懂得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的诀窍”,他们在每一个小问题上斤斤计较,而看不到全局。当时,杜鲁门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欧洲的那些麻烦事占据了,对于中苏谈判他分不出多少精力。他只是简单地谈到大连问题,说,美国希望确信,大连将成为一个开放港。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苏联取得对该港的控制,它将是一个开放港。贝尔纳斯接着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大连港的控制权仍归中国。(44) 除了第一次会上这样简短的意见交换外,会议期间再未提到中苏谈判问题。

23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19日的电报说:“我曾要求你履行雅尔塔协定,但不曾要求你作出超过协定的让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帅在对协定的正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将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谅解。”(45) 这个答复暗示,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过分要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予以抵制,但它没有说明,哪些要求是过分的,而只是要求中苏两国自己去谈。因此这个答复仍然是含混其词的。

7月26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苏联正忙于调兵遣将,紧张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贝尔纳斯感到,在苏联参战之前,中苏必须谈成条约。28日,他致电赫尔利,要他催促宋子文尽早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

8月8日,宋子文与新任外长王世杰继续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当时,战争形势在迅速发展。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10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国民政府也在忙着组织军事和民政人员,以

便在苏军解放东北时进入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苏都希望尽快达成中苏条约。当中苏双方在10日谈判中仍为条款争持不下时，斯大林威胁说，中方最好还是尽快达成协定，不然，“共产党人就要进入满洲了”。（46）这个威胁正中国国民党人的要害。8月9日，毛泽东已经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47）蒋介石担心中共得到苏联支持后迅速扩大势力，占据东北、内蒙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唯有再作让步。8月11、13日，他两次致电宋子文等，准予他们“权宜处置”“未决事项”。（48）

在第二阶段，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苏谈判。贝尔纳斯于8月5、9、11日三次指示哈里曼说，宋子文已经履行了协定的规定，斯大林不应再迫使他作更多的让步；大连不能包括在旅顺的军事区域之内成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与中国订约的同时，应作出在东北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该保证书应与中苏条约同时公布。哈里曼于8月8、14日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并于8月12日致函莫洛托夫进行交涉。（49）在美国的干预下，苏方也不得不再作些妥协。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4项附加协定（以下总称中苏条约）签订。（50）中国方面作出的主要承诺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战后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这种愿望；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平均所有，由两国合办公司共同经营，铁路理事会、监事会中苏成员各半，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人员任监事长和路局局长，其他重要职员由双方平均充任；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仅供两国使用，具体事项由中苏合组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担任）处理，海军基地由苏方防护，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大连战时划入旅顺军事区，平时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中国允将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方面在条约中作出的主要保证是：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对东三省之充分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关于新疆事变，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苏条约有效期为30年。

三

简单回顾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条约的中美苏三国关系，我们不难得出下面一些看法。

大战末期，美、苏两国都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虽然英国是大战中的主要盟国之一，中国也号称是“四强”之一，但美、苏两国主要还是从两国主宰世界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两国的利益无疑是有矛盾的，争夺自始至终存在着，但当时，两国合作的设想无疑是首要的和主要的。正如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当包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内的美国代表离开雅尔塔时，他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兴高采烈的。他们确信……这是一次最令人鼓舞的会议”。（51）霍普金斯自己也这样说到雅尔塔会议：“我们确实在我们的思想中相信，这是我们大家多年来祈求和谈论的新的—日的曙光。……俄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是通情达理和有远见的，总统的或我们任何人的脑子里都完全没有疑问，……我们是能够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且和平共处的。”（52）在波茨坦，尽管使战时盟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已经越来越少，但会议的主调仍然是妥协和合作，而不是争夺和对抗，因为当时美苏双方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认只有它们的继续合作才能达到这些目的。这是美苏确定对华政策和美国确定对中苏谈判立场的大背景。在中苏谈判的两个阶段中，美国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它的主要注意力由压中方作出让步转为帮中方抵制苏联的某些要求，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关闭。美国后期对谈判的干涉，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的利益。

处在美苏合作安排世界事务的大气候下，国民政府面临着两国的联合压力。对于协定，国民政府不论理解与否、愿意与否，都是要执行的。因为在大战中，美国通过财政、物资和军事援助，已经同国民政府建立了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已经离不开美国，不能没有它的支持，而只能听从它的安排。国民政府尤其不能既违背美国的意旨，又对抗苏联的要求。这几个月的中美苏交涉证明，号称“四强”之一的中国，其实只不过是美苏两国布下的“国际象棋”中的一枚棋子，这枚棋子是不自由的，它只能听从棋手的摆布。中国作为二次大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在按照庄严的《开罗宣言》的规定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之前，却已经有一部分主权被让出去了。就在中国经过八年浴血苦斗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苏两国联合起来，把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平等条约强加给了中国，中国的无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政府签订中苏条约完全是出于被迫的。

实际上，条约谈判是两方一桩讨价还价的买卖。在这场美苏之间、中美之间的交涉中，苏联手中的筹码显然比它的对手多些，它看准了国民党担心苏联支持中共这个致命伤，乘人之危，损人利己，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国民党为了战后孤立中共、消灭中共的需要，不惜出让民族利益。交涉的结果，美、苏、中三方居然都对中苏条约表示满意。贝尔纳斯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欢迎这一条约，把它看作是“继续和睦和互助的一个实例”，是“今后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后来责难这个条约的赫尔利也曾在9月6日致电国务院说：“这些文件（指中苏条约）的公布确凿无疑地表明，苏联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两国政府对满洲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官员和报纸把中苏条约看作是苏联希望和平、友谊和正义的又一证明。宋子文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表现的诚意鼓励了我对巩固中苏关系的信心”。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总的说来是满意的”。（53）美苏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实现了雅尔塔协定的规定，把战后远东的雅尔塔格局落实了下来，国民政府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描绘的不是“共产党征服中国的蓝图”，而恰恰是国民党统一中国的蓝图。

自然，后来中美苏三国关系并没有按照当时各方所预期的那样发展，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愿任随大国的摆布，要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也是因为苏联执行两面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援助中国革命，但那是后话了，已经不属于协定和条约本身的范围。

注释：

（1）理查德·芬诺编：《雅尔塔会议》（Richard F. Fenno, Jr., ed. *The Yalta Conference*），第56、51页，波士顿1955年版；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Edward R. Stettin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第15页，伦敦，1950年版。

（2）安东尼·库贝克：《远东是怎样丢失的》（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第112页，芝加哥1963年版。

（3）威廉·纽曼：《胜利之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与和平的缔造》（William L. Neumann, *After Victory: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Peace*），第154页，纽约1967年版。

（4）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2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5）罗曼纳斯、桑德兰：《史迪威使华》（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第51页，华盛顿1953年版；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第241页，芝加哥1963年版。布海特认为斯大林在1942年11月对赫尔利的谈话是

苏联可能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表示,这一说法不确。见布海特:《雅尔塔的决定》(Russell D. Buhite, *Decisions at Yalta, An Appraisal of Summit Diplomacy*),第87页,威尔明顿1986年版。

(6) 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以下简称《特使》)(W. Averel Harriman and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第266页,纽约1975年版。

(7)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1945)》(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以下简称《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369页。

(8) 史汀生、邦迪:《在平时与战时积极效力》(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第618—619页,纽约1948年版。

(9) 《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396页。

(10)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721页,北京1984年版。

(11) 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258页,北京1953年版。

(12) 《特使》,第370页。

(13) 吉姆·比休普:《罗斯福的最后一年(1944年4月—1945年4月)》(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April 1944-April 1945*),第267页,纽约1974年版。

(14) 《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356—357页。

(15) 郭荣赵编:《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206—208页,台北1978年版。

(16) 美国国务院编:《美中关系白皮书》(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第550页,华盛顿1949年版。

(17) 同上,第564页。

(18)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37—738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43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0) 《罗斯福的最后一年》,第274页。

(21) 《美国外交文件:开罗与德黑兰会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第567、869页。

(22) 《特使》,第397页。

(23) 《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984页。

(24) 《美中关系白皮书》,第113—114页。

(25) 埃利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第164页,纽约1946年版。

(26) 《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351页。

(27)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851页。

(28)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合著,肖东川等译:《苏中关系》,第11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9)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第542页,台北1981年版。

(30)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867—868页。3月24日,罗斯福把

锁在总统保险柜里的协定文本给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看了。

(31)《战时外交》(二),第565页;《特使》,第472—473页。

(32)《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897—898页;《战时外交》(二),第568页。

(33)《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03—904页,906—907页。

(34)《战时外交》(二),第577—588页;梁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第7页。

(35)《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第7页;蒋经国:《负重致远》,第67页,台北幼狮书店印行。

(36)《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12—915页。

(37)《美国外交文件》,第918页;《战时外交》(二),第594页。

(38)《战时外交》(二),第608—609页;《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24—925页;《传记文学》,第24卷第4期,第8页。

(3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12—913、927—928、932—934页。

(40)《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48—949页。

(41)同上,第944—948、950—952、953—954页。

(42)《中国的纠葛》,第362、367页。

(43)菲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波茨坦会议》(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第180页,普林斯顿1960年版。

(44)小查尔斯·米:《波茨坦会议》(Charles L. Mee, Jr., *Meeting at Potsdam*),第74页,纽约1975年版;贝尔纳斯:《坦率直言》(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第205页,纽约1947年版。

(45)《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50页。

(46)同上,第968页。

(4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1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48)《战时外交》(二),第646、649页。

(4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955—956,960—966,969—974页。

(50)条约全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327—1338页。

(51)《雅尔塔会议》,第39页。

(52)《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530页。

(53)《雅尔塔会议》,第68—69页;《中国的纠葛》,第382页。

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

——回顾与思考

杨玉圣

美国学的勃兴和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学术界熠熠生辉的崭新篇章。其来势之盛、成果之多，已引起中外学人的广泛关注。

美国学是伴随着中美邦交和中国的改革潮而步入泱泱学坛的。在1980—1989年的短短10年间，从无到有，渐臻繁荣昌盛。凡研究机构、学术组织、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莫不如斯。

应运而生于1981年5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家综合性美国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美国研究系，即以该所为基础而设立。该所1987年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的关于美国学的专门杂志——《美国研究》。自1989年第1期起，改由该所与中华美国学会联合主办，其方向是争取“成为中国所有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共同的园地，成为大家交流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的一个中心”。此外，该所还从1981年起创办了内部发行的综合性月刊——《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该刊自1984年7月起改为正式出版的月刊，在此之前为不定期出版的内部交流资料。）迄今已出348期，影响日巨。坐落于南京大学、由南京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6年9月，开中美两国大学文化交流中联合办学的先河。该中心已设立了美国学研究室，从1989年5月起，又创办了以“南京大学学报专刊”形式出版的《中美文化研究》半年刊，其“发刊词”称：它将“坚持严格的学术立场，恪守公正的客观精神，为使世界上这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伟大民族能够真正地彼此相识和相处而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1986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是全国同类机构中绝无仅有的跨学科、实体性研究机构，该中心编辑文集、丛书，召集学术会议，活跃异常。郑州黄河大学的美国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的中美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亦属教学、科研的实体性机构。另外，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在该校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已扩建而成美国研究所，这是中国在80年代诞生的最后一家综合性美国学机构。

除上述实体性机构外，10年来，有关高等院校还陆续成立了一批联络校内外美国研究人员的学术活动中心。据笔者所知，已有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燕京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主办有《美国研究丛刊》）、山东大学美国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洛阳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学文献室等。

就具体的美国学分支学科而言，10年来的收获也是相当大的。美国史研究方面，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皆创立于60年代初）不断充实和提高，前者在1987年被国家教委评为该领域第一个重点学科，后者主办内部交流刊物《美国历史研

究资料》，历十数年至今。近年来设有美国史研究室的单位，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1989年，南昌师范专科学校设立了江西省美国史研究中心。美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机构，主要有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该所现主办内部交流刊物——《美加经济研究》，设有美国经济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美国经济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美国经济研究室（该室曾主办过《美国问题参考资料》，现已停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等。研究美国外交的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拉美研究室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1980年由美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扩建而成的山东大学美国文化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以美国文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该所主办有内部刊物——《现代美国文学研究》。《美国文学丛刊》系会址设于该所的全美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公开发行的学术季刊。

会员遍布全国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主要是70年代末成立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1978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79年）以及中国“三S”研究会（1984年）、中华美国学会（1988年）。这些学会广泛吸收和团结会员，定期召开学术年会或不定期举办专题讨论会，组织重大问题的攻关研究，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对于沟通、促进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对于活跃、深化中国的美国研究，皆贡献良多，为学界所瞩目。

人才培养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并初见成效。从1981年起，我国首次培养出了自己的美国问题研究方面的硕士，迄今已有400余人；从1986年起，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研究美国经济、美国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美现代关系史和美国教育的美国学博士。目前，从事美国问题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有1100人左右，一支老、中、青学者相结合的中国美国学队伍已告形成，其结构亦渐趋合理。前辈学者，壮心不已；中年专家，承上启下；青年学子，锐意进取。这是中国美国学的希望。

与此同时，对外联系日益加强。相当多的学者赴美进修、讲学，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者正在大洋彼岸攻读硕、博士学位，他们还先后组织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美政治学会、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学术活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亦召开了几次，而且相当成功。如1986年10月由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发起、在北京召开的中美学者共同参加的“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1988年3月底至4月初，复旦大学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学术讨论会；中国国家教委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组织的首届、第二届中美美国学研讨会，先后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1988年11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此外，中华美国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于1988年12月联合举办了“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当然极有助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

二

80年代的中国美国学，著译累累，成果丰硕。大量的译著，自不待言。一批批学术著作和论文的被推出，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大型美国研究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是象征中国美国学10年来长足进步的重大收获。商务印书馆的《美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译丛》、三联书店的《美国文化丛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丁名楠主

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杨生茂和刘绪贻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刘绪贻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董乐山主编的《美国与美国人丛书》，都已经陆续和读者见面。这标志着中国美国学水平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吴纪先主编的《美国五十州》(1989年),是我国学者第一门全面介绍美国各州情况的通俗读物。美国史的研究,基础较好,成果亦较多。就著作而言,主要有黄绍湘据其《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改写而成的《美国史纲》(1987年)、陆镜生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1986年)、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1987年)、刘绪贻与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89年)和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1989年)以及邓蜀生著《美国和移民》(1989年)。美国总统传记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如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1982年)和《罗斯福》(1985年)、张海涛著《吉米·卡特在白宫》(1982年)、万松玉等主编《美国历任总统传》(1989年)、刘祚昌著《杰斐逊——近代民主的先驱》、余志森著《华盛顿评传》,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印行,不久即与读者见面。美国史工具书的编纂引起了有关人士的重视,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历史辞典》、李世洞主持编译的《美国历史词典》已经完稿,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分别出版。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0年)和《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1983年),收集了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代表性论文,不失为重要成果的结晶。美国经济研究方面的成果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如徐玮著《美国近代经济史》(1988年)、张友伦著《美国农业革命》(1983年)及其与人合著《美国工业革命》(1981年)。不过,该领域的主要成果尚不在于此,而是集中于现当代美国经济,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1981年)、褚葆一主编《当代美国经济》(1981年)、洪君彦主编《当代美国经济》(1985年)、薛伯英主编《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1986年)、龚维敬著《美国垄断资本集中》(1986年)、章嘉琳主编《变化中的美国经济》(1987年)、龚维敬和甘当善著《美国垄断财团》(1987年)以及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1988年)等。美国政治研究方面的专著,主要是曹绍濂著《美国政治制度史》(1982年)和《论美国民主制度》(1989年)、沈宗灵著《美国政治制度》、陈其人等著《美国两党制剖析》(1984年)、李昌道著《美国宪法史稿》(1986年)和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1989年)。对美国外交的研究,成果尚不显著,但中美关系史方面却呈一花独秀之势,如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1986年)、李强著《美国与台湾关系史》(1984年)、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1985年)、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1—2辑)》(1985、1988年)、汪熙等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1989年)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编《中美关系十年》(1989年)。还应提到,汪熙主编的囊括中、英、日等文字的大型索引类工具书——《中美关系史研究百年书目(1889—1989)》,亦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董衡巽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下)》(1987年)、朱虹编《当代美国小说家论》以及毛信德著《美国小说史纲》等,是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文学的代表作。朱传一主编《美国社会保障制度》(1986年)、陈尧光著《大洋东岸——美国社会文化初探》(1986年)和董乐山著《美国的罪与罚》,表明中国学者在过去较为薄弱的美国社会的研究方面也开始有所收获。涂纪亮著《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下)》(1987年)及其主编《当代美国哲学》(1987年),是探讨美国哲学的集大成者。此外,还应提到滕大春著《今日美国高等教育》一书,在国人为数甚少的同类著作中,该书仍不乏其拓荒的意义。

与上述著作相比,大量的论文、译文和资料之纷纷发表,也许更能形象地展现80年代中国美国学的发展势头;为数不能算少、质量已达到相当程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从某一

个侧面映衬了中国美国学的前景。表1按时间、表2按主题作了形象的说明，(1)请参见：

表1 80年代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统计(按时间)

年度	类别 篇数	论文	译文	资料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合计
		1980	205	123	255	0	0
1981	182	145	412	31	0	770	
1982	249	153	457	38	0	897	
1983	285	250	543	12	0	1090	
1984	306	344	655	48	0	1353	
1985	320	246	599	75	0	1240	
1986	452	305	776	42	1	1576	
1987	482	271	759	72	1	1585	
1988	565	289	635	77	5	1571	
1989	340	116	356	26	1	836	
合计	3386	2242	5444	421	8	11501	

表2 80年代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统计(按主题)

主题	类别 篇数	论文	译文	资料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合计
		综合类	4	16	31	0	0
美国历史	590	426	678	93	1	1788	
美国政治	213	200	450	39	0	902	
美国经济	828	390	1045	72	2	2337	
美国社会	139	307	475	8	0	929	
美国科技与教育	101	136	477	5	1	720	
美国文学	437	261	831	70	0	1599	
美国哲学社会科学	379	281	696	35	0	1391	
美国军事	106	27	313	7	0	453	
美国外交	269	124	245	46	0	684	
中美关系	320	74	203	46	4	647	
合计	3386	2242	5444	421	8	11501	

三

中美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美国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学术宽容精神不断得到提倡、光大。与过去水波不兴的沉闷局面迥然有异，80年代的中国学者解放思想，围绕着美国问题研究开展了热烈、深入的学术讨论与争鸣。以美国史为例，从美国殖民地时期史迄战后美国史，几乎各个不同时期的重大问题都存在不同的学术论点。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是不是美国古代史、如何分析门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怎样分析美国内战前南部妥协问题、林肯对奴隶制态度如何、南部重建的结果怎样、如何评价罗斯福新政、怎样看待战后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内政措施，等等，都是

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围绕美国经济研究而展开的争论，亦不在少数。举其要者，如关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特点、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性质、战后美国物价上涨的原因、80年代初美国是否爆发经济危机、里根经济学的成败、美日贸易摩擦的根源、美国垄断财团的变化，等等，都是中国学者在80年代不断讨论的热门话题。美国外交、美国政治、美国文学等方面，亦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论。概言之，这些争论基本上是健康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具体问题作出的独立判断。这些争论也是很正常的。真理愈辩愈明。至于在有的讨论中一度出现挖苦对方的不文明现象，是让人不愉快的，但这只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当然，我们更欢迎以理服人的平等讨论、更期望宽松融洽的学术氛围。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汪熙教授等的中肯之见，即：“任何学术的发展，都必须在讨论与争鸣中前进，……。通过争鸣，可能使一个研究工作者获得一个长期搜求不到的资料；或打开一条苦苦思索的思路；或补充一个片面的片断；等等。这些收获常常会使一个研究工作者更接近真理一步，其乐无穷。健康的讨论与争鸣总是促进学科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希望有影响的学术机构和有影响的学者在树立良好的学风方面起一个带头作用”。（2）

对敏感度强、但又有现实意义的“禁区”问题，努力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从一个重要层面一展中国学术界思想解放的新姿。问题不仅在于中国学者的大量著译成果表明这一研究被大大地向前掘进了一步，而且在于中国学者已摆脱过去戴有色镜、用一只眼看美国的积习。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战略需要，不能不使中国学者首先面向严峻的现实。如实地研究美国，已逐渐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其实，10年来的巨大成就舍此是无从谈起的。不是说这些成果皆已尽善尽美，但这种探索所凝聚的理论勇气本身，正是一种非常难得、十分可贵的学术风尚。否则，固步自封，陈陈相因，何从谈起学术进步与繁荣？又何从谈起中国美国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四

中国美国学，归根结蒂，即中国学者从严格的学术视角对美国的过去与现在所作的系统阐释。这是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

“过去很长时期里，我国的美国研究……没有被摆在恰当的位置，要么没人重视，似乎取消了也没关系；要么要求它对政府领导随时想到的问题总能拿出现成答案来，这是违反科学工作规律的，因为一个长期研究的课题不可能围着一时的需要转”。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1988年岁末接受新华社记者袁专访时所说的。她还谈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过去我们国内研究〔美国〕外交问题总是针对具体外交政策以研究中国的对策，很少从多方面的联系来研究，例如外交思想、决策过程、与内政的关系等。过去研究经济，总是认为美国年年有危机，现在改变了片面看法，但对美国经济体制的系统研究还有待开展”，“我国一直很少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一般人想到美国政治就局限于谁可能当总统，具体政纲是什么，而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政策（治）制度，三权分立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都没有专门研究”，（3）等等。为什么要研究美国？怎样研究美国？资中筠的见解是很值得深思的。

中国美国学是诞生、成长于中国的学问。它关注过去、现在与未来，理应融以时代气息、中国特色和东方风格。中国美国学究竟如何充分体现中国人缜密、科学的美国观？这是一个亟待探讨的学术命题。（4）

中国美国学已经实现了零的突破。对中国人晚清迄今介绍、研究和认识美国的惨淡历程，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这是中国美国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5）

中国美国学建设与发展的全面规划，甚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基本上孤军奋战、一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于中国美国学新局面的开创。应该有计划地协调全国的力量，有组织

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美国。我们吁请创建全国性的中国美国学信息中心；待条件成熟时，建议促成出版《中国美国学年鉴》。

美国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中国美国学应当 在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流年似水，世事沧桑。辞别风云激荡的80年代，我们已经拥抱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第一春。一切尚待艰苦研究与探索，尤赖求实精神的张扬。

我们期待着90年代中国美国学的更大进步。

注释：

(1) 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

(2) 《中美关系史论丛》，第8、9、5页。

(3) 《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2期，第44、43页。

(4) 笔者在《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一文中，曾从一个侧面初步谈到这一问题。该文将刊于近期《世界历史》杂志。

(5) 参见拙文：《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几点初步想法》，《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总第46期（1990年2月）。